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香港流水革命的大氣/氛圍政治：

從「運動」及「風化」兩個理論視角切入

Atmospheric Politics of Hong Kong's Be-water Revolu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Movement and Weathering

梁皓晴

Ho-Ching Leung

指導教授：簡旭伸 博士

Advisor: Shih-Shen Chien,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May 202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香港流水革命的大氣/氛圍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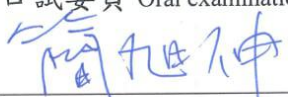
從「運動」及「風化」兩個理論視角切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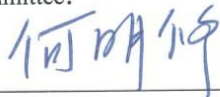
**Atmospheric Politics of Hong Kong's Be-water Revolu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Movement and Weathering**

本論文係 梁皓晴 (R10228024) 在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4 年 01 月 1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
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n 17/01/2025 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Leung Ho Ching (R10228024) 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指導教授 Advisor)





系主任/所長 Director:



謝 誌



一本碩士論文總是由各式各樣的異質元素拼裝而成，在不同時空節奏與機緣的交織下，緩慢地（特別是在台灣研究所的學習歷程中）凝結成形。借用後殖民學者周蕾「以食運思」的隱喻，這個過程就像作者對各種理論和經驗材料進行烹調、釀製、熟成、吞嚥、咀嚼、消化、代謝，逐漸生成骨肉，最終在綿延的呼吸間注入靈魂。

我的研究主要透過現象學視角，重新描述香港流水革命參與者在都市大氣/氛圍擾動中，進行持續抵抗、運動及情動轉化的生命經驗。在這樣的脈絡下，歷時四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也可說是記錄了我從香港來台求學過程中的「運動」與「風化」痕跡。根據哲學家德希達的說法，痕跡具有鬼魅般的存在狀態，與純然在場之物產生乖離。作為事物曾經存在、卻已經風化並轉換形式的證據，痕跡提醒我們所有文字皆有其「將臨」的維度，其意義在開放的世界中不斷被洗刷、替換與延異。

另一方面，這些生命運動與遷移留下的線索，也提醒我們需要適時回望，傾聽過去的回聲。我想起對我思考歷程影響深遠的女性主義學者 Sara Ahmed。在《酷兒現象學》中，Ahmed 回顧自己遷移他方的抵達歷史，問道：「是什麼讓我離開當下，來到另一個地方和另一個時間？我是如何到達這裡或那裡的？」（Ahmed 2006: 10）過去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政治學期間，幸得李家翹博士的引介與悉心指導，帶領我跨越傳統政治學的邊界，進入政治地理學的領域。從空間—社會理論的角度學習反思和剖析政治現象，這些經驗和訓練讓我更有信心來台進行跨學科研究。

如同社會上眾多營生方式，我在台灣的研究生活亦深植於多重關係和網絡之中，依賴許多人事物、制度與環境支持：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簡旭伸教授。回想當年於新冠疫情期間匆匆入學，在防疫旅館遠距選修《量體地理學》，除了獲得廣泛的文獻閱讀與豐富的智識回報外，也讓我從自身跨境穿越台港兩地（防疫）體制的過程中發想研究主題。在碩士論文計劃書和定稿的口試與修改階段，我要感謝口試委員何明修老師、陳重仁老師和王驥懋老師，在百忙之中撥冗閱讀拙作，給予深刻透徹，切中肯綮的回饋。

站在論文完成的此刻回首，不難發現研究題目與方向歷經了不少改變，這歸功於多年來在臺大不同系所參與課堂和讀書會，與學友不斷交流與互相砥礪的成果。感謝 201 研究室及歷年量體讀書會的同伴，特別是怡婷、承恩、中彥、彥維、豐誠和俊沅，無論是在學術上的啟發，或是課業與情誼上的支持，都為我帶來了充實和珍貴的時光。

碩士論文的章節架構大致反映了我在臺大的修課歷程。比如，在社會系何明修老師開設的《佔領運動專題》課堂上，受到他對社會運動文獻的扎實研讀所激勵，我嘗試以人文地理學的量體轉向與移動性研究進行回應，拓展社會科學的運動想像。在生傳系王驥懋老師的《海洋環境政治、科技與生物保育》、地理系洪廣冀老師的《環境史導論》及洪伯邑老師的《邊境、領域與邊界》等課中，幾位學者的淵博知識和對學科前沿發展的純熟掌握，鼓勵了我對空氣這一介質開展理論化的人地關係分析。從這些課堂中獲得的學術思維、品味與素養，也驅使我於 2022 年秋以助教身份參與《空氣與政治》研討課，進一步從「大氣/氛圍」、「天氣」等核心概念出發，收穫更多切入當代環境政治議題的理論視野。

人類所呂欣怡老師的《都市民族誌選讀》與黃郁茜老師的《人類學的情感與情緒研究》，是我每周早起上課、深入閱讀和參與討論的精神動力來源。兩位人類學家對生命的細膩洞察與慷慨的田野經驗分享，讓我見識到質性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而本文有關新冠疫情與風化的部分，主要構想於外文系陳重仁老師的《感染研究：暴力、政治與文化》研討課，感謝重仁老師從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角度提供的許多建議與鼓勵。三位老師的智慧與人格魅力，常令我深感欽佩，受益良多。

此外，我衷心感謝在研究過程中，曾提供協助、指導與啟發的師長、同儕和朋友，包括地理系《專題討論一》的徐進鈺老師、系上一同為畢業奮鬥的聖昌、雨潔、力豪、博翔、景仁、珮岑、季寬、怡君；《專題討論二》的周素卿老師、玫宜助教、凱蘭、子昕、立學和文龍；城鄉所的世浩、威丞、麒愷；政治系的浩彰、子維；社工系的趙芸；社會系的 Jessie；人類系的若慈、于珂、敬謙；輔大宗教學系的怡君學姊；多多少少生活空間的 Sandra、Kuma、Daydo 讀書會的朋友們；以及在遠方一直給予支持與陪伴的 Alexis、Alpha、Bernard、Billy、Darryl、Sherman、Steph、Titus 這幾位我在中大政政系時便認識的香港朋友。你們不吝給予的耐心、回饋和建議，均幫助了我持續凝練思考，修正研究方向和充實論文內容。

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實在仰賴於我在田野調查中遇見的眾多受訪者、對話者的支持與信任。感謝你們的參與，願意分享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與生命故事。雖然在此刻我無法逐一具名致謝，但祈願未來有一天，當我們在故土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氣時，我能夠再次向你們每一位表達最誠摯的感激與敬意。

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 — 外婆、母親、父親與姐姐 Jasmine。你們無私的支持與陪伴，讓我得以暫時忘卻香港充滿競爭意識的社會壓力，心無旁騖地專注於研究，開創屬於自己的一條道路。

最後，我想感謝一路努力走來的自己。在無數次挫折與灰心中選擇堅持，重新振作。儘管這四年仍有遺憾與未竟之事，但碩士畢業終究標誌著一段旅程的落幕，也是下一段人生的啟程。當你在探索知識的旅途中感到迷惘、焦慮和不安時，請記得：

「魔法は探し求めている時が一番楽しいんだよ。」

摘要



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面對反全球化、反種族歧視、以及反威權擴張等社會運動，出現了許多採取使用催淚瓦斯等警治手段的案例。在這些都市抗議場域，抗議者沉浸於一種特殊毒性大氣環境，以及高亢警民衝突政治氛圍。本論文以香港流水革命(2019-2020)為例，主張激進社會運動爆發過程會產生身體動作和都市移動的政治性，並對都市氛圍及抗議者產生持續的共同風化效應。內容將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會考慮口述歷史、媒體和筆者的訪談資料，從特定事件與場所重構流水革命參與者與國家大氣暴力相遇的過程，從三個角度理解「運動」的政治意涵：（一）抗議者身體緊密地與都市環境和元素糾纏起來。當身體遭遇國家化學暴力，群眾會逃逸、聚散和抵抗，溢出警戒框定的空間界線與交通模式。（二）面對化學暴力，示威者發展出多樣化的活動方式進行抵抗。隨著流水革命展開，日常移動載具、用品和運動商品被參與者挪用和轉化為充滿政治意涵的抵抗物質。（三）在都市衝突下遊走的身體，往往具有特殊的地勢挑戰。參與者在「運動」中身處不同位置，會產生差異化的風險和空間知識。他們之間激發了一種暫時性，卻黏著的團隊紐帶。

第二部分通過對抗議事件目錄的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考察在更長時間幅度，因應催淚瓦斯、新冠肺炎疫情等大氣擾動事件而蔓延的威權政治氛圍，如何與運動參與者的身體共同風化，形塑他們的抗議風格及軌跡。透過風化的概念和情動理論的嫁接，本文分析了病毒爆發前後都市環境的變化，以及示威者面對大氣擾動，與國家暴力和病毒大氣一起風化的眾多方式，包括唱歌、悼念、集體現身與呼吸調適。這些身體美學實踐展示了抗議者如何在日漸嚴酷的都市氛圍中獲得政治覺醒，同時試圖讓流水革命在被政府抹除的危險中持存。

透過激進社會運動中的情動及具身視角，本文主張「運動」本身除了具有公民參與，推動體制變革的社會意義，也包含身體的移動、動作和練習，與都市大氣/氛圍共同風化的物理-情動面向。這樣橋接「運動」的社會意義與物理意義，清楚說明抗議者不只是被框限於預設的集會遊行空間，而是會外延和曝露於大氣下發聲。甚至這樣沉浸式身體感擴展抗議政治的空間性，更有其時間延展效應，會後續對抗議者日常生活節奏和實踐產生實質改變。

關鍵詞：抗議政治、運動、風化、移動性、量體、呼吸身體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use of tear gas against participants in social movements has intensified, reflecting the rise of atmospheric policing as a means of crowd control. Within this form of state violence, protesters are immersed in toxic physical environments and intense political atmospheres shaped by urban conflict. This thesis uses the Hong Kong Be-water Revolution (2019 – 2020)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how radical social movements generate a politics of bodily exercise and mobility. It also explores how these movements engage in a process of weathering, a long-term entanglement between protesters and urban atmosphere that reshapes both material-affective conditions and embodied experiences of dissent.

The thesis is organized in two parts. The first draws on oral histories, media reports, and interviews to reconstruct how participants encountered atmospheric policing and state-deployed chemical violence. It considers th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movemen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1) bodily encounters with atmospheric policing and a tear gas-filled urban environment; (2) repurposing of everyday objects into resistant matters; and (3) navigation of contested terrain through differentiated risk and spatial knowledge.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a catalog of protest events to explore how the Be-water Revolution co-evolved with an authoritarian atmosphere intensified by tear ga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Drawing on affect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weathering*, it examines affective practices such as singing, mourning, breathing attunements, and withdrawal as forms of somaesthetic resistance that sustain protesters'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solidarity, even under the threat of erasure.

Overall, this thesis proposes an expanded understanding of movement, not only as sustained collective action aimed at institutional and broader societal change, but also as physical movement involving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of how bodies navigate conflict-ridden urban atmospheres. These affective encounters extend the spatiality of protest and, over time, transform the everyday lives and mobilities of those who resist.

Keywords: contentious politics, movement, weathering, mobility, volume, breathing bodies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誌	ii
摘要	v
Abstract	vi
目次	vii
圖次	viii
表次	ix
第一章 前言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6
2.1 社會運動的多重空間性	7
2.2 大氣警戒與抗議身體	10
2.3 研究社會運動的具身取徑	13
2.4 糾纏的歷史線緒：香港的大氣警戒與社會騷動	15
2.5 研究方法	21
第三章 流水革命的身體動作及移動性政治	29
3.1 同呼吸：穿行於香港流水革命的都市氛圍	29
3.2 六一二事件：與催淚瓦斯及警治氛圍相遇	30
3.3 共命運：拼裝反抗物質與召喚抗議氛圍	37
3.4 兄弟爬山：社會運動作為熟練身體動作及戰略移動	44
3.5 重新概念化社會運動：伴隨思考與認知的身體作為	58
3.6 小結：橋接「運動」的雙重意義	60
第四章 與催淚瓦斯和新冠肺炎一起風化	62
4.1 兩種激發抗議的動盪大氣/氛圍：催淚瓦斯與新冠肺炎	62
4.2 催淚圍城：遭受毒氣風化的香港都市環境	66
4.3 抗議的身體美學：儀式、疊歌與情感轉化	84
4.4 病毒蔓延：持續擾動的都市環境	100
4.5 呼吸的維安化：新冠肺炎爆發期間的大氣分隔	106

4.6 小結：都市大氣/氛圍與身體的風化政治.....	115
第五章 結論.....	123
參考文獻.....	127
附錄一：訪談大綱.....	146
附錄二：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	149

圖 次

圖（一）抗議案件目錄圖例.....	24
圖（二）612 事件中香港警方警告施放催淚瓦斯的黑旗.....	32
圖（三）警方「反包圍」示威者，並施放催淚瓦斯.....	33
圖（四）警方在中信大廈外釋放催淚瓦斯，群眾爭相逃入大樓.....	34
圖（五）612 金鐘現場，被催淚瓦斯淹沒的急救站.....	35
圖（六）612 於中信大廈內外休息的抗議群眾圍著傷者，為他清理刺激性化合物.....	36
圖（七）612 示威者於現場挪用物品及組裝路障.....	38
圖（八）612 後廣泛流傳的「運動」文宣：防護裝備及衣著須知.....	39
圖（九）反送中示威者創意地回應警方的催淚瓦斯攻擊和懷疑政府進行監控.....	41
圖（十）從「和理非」到「勇武」之演化圖.....	44
圖（十一）民眾防護相關情報：催淚瓦斯濃度及區域影響.....	47
圖（十二）衝突現場的抗議者自發收集催淚彈殼，堆積於路邊展示.....	67
圖（十三）香港警方使用的催淚瓦斯彈殼溶解馬路瀝青.....	72
圖（十四）香城教育電視購買山埃檢測機，化驗香港各處的山埃含量.....	73
圖（十五）民間團體「香港媽媽反送中」開記招展示小孩子出紅疹的相片.....	74
圖（十六）「中大保衛戰」期間遭催淚煙霧襲擊的雀鳥.....	79
圖（十七）《香港地圖：催淚彈遍地開花》.....	80
圖（十八）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	86
圖（十九）基督徒政總外集會唱聖詩反對逃犯條例修例.....	88
圖（二十）615 梁凌杰墮樓前站在太古廣場 4 樓平台外牆.....	88
圖（二十一）616「200 萬 + 1」遊行參與悼念梁凌杰活動.....	89

圖（二十二）梁逝世一週年，金鐘太古廣場外有大批市民聚集.....	90
圖（二十三）在台港人發起聲援流水革命及悼念梁凌杰活動.....	91
圖（二十四）溫哥華民間團體舉辦催淚彈聖誕樹及追悼梁凌杰活動.....	91
圖（二十五）《願榮光歸香港：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版》截圖.....	94
圖（二十六）中學生聯校人鏈以歌聲、裝扮和手勢抗議警方暴力.....	94
圖（二十七）抗議者於中環地標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商場舉辦歌唱活動.....	95
圖（二十八）世足外圍賽香港對陣伊朗隊比賽.....	95
圖（二十九）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互動地圖儀表板.....	104
圖（三十）香港抗議者在筆架山上懸掛直幡.....	108
圖（三十一）罷工醫護前往醫管局大樓遞交請願信.....	109
圖（三十二）逾萬名市民進入維園自發參與悼念六四集會.....	113

表 次

表（一）香港大氣警戒與社會運動/動蕩時序.....	19
表（二）大英帝國各地催淚瓦斯實驗及使用狀況.....	20
表（三）與催淚瓦斯和新冠肺炎一起風化.....	120

第一章 前言與研究目的



你談到背包，我就想到剛剛開始「發夢」的時候，跟著一個大學的學長，一起去迪卡儂（Decathlon）買東西。因為那裡很便宜，我就買了四、五個幾十塊的背包回家，每次出門就扔掉，換一個，或者是帶上兩個背包，走的時候把裡面的拿出來用。

我們的話，如果知道背包裡有 gear（抗爭裝備）的話，我們的老師會在學校輪班留守，學校會有空間讓我們放 gear。因為狗一定不會進中學裡面，所以校方會讓同學放東西進去。我們也可以回去學校拿東西出去（抗爭），可能是補充一下物資或者換一個背包——我們用那些很大型的背包，上下都有口袋可以拿東西出來，沒有到登山背包那麼大，但也算是「運動背包」，全黑或全灰色的那種。

以上的對話，來自筆者與一位香港流水革命參與者的訪談（2023-02-18）。當中出現了許多關鍵詞，例如是「發夢」、「裝備」、「物資」、「狗」，等等……不認識當時脈絡的讀者，可能沒法立刻理解當中的意義。不過，這個對話首先浮現的直觀問題是，為何在參與社會運動前，人們需要去迪卡儂（一所大型連鎖體育用品專賣店）購物呢？為什麼人們需要這些物品？這些與各種體育運動相關的裝備、背包和其他日常移動的物品，究竟可以起到什麼作用？或是他們對於社運運動的政治參與而言，究竟有何意義呢？

對此，本文希望通過香港流水革命（2019-2020）的案例，把上述這些問題放置在一個激進都市抗爭的脈絡下進行討論。正如「流水革命」（Be-water Revolution）的名稱所示，這場持續半年以上的大規模抗議，牽涉到許多身體上的動作和運動：「自6月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以來，示威者一直堅持他們所謂的『be water』策略，並且完全迷惑了警察、政府和北京的政治局。這是在向香港最著名的演員致敬。1971年，功夫電影明星、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武術家李小龍在一次視採訪中說：『要無形，無影，像水一樣』。『水可以流動，也可以衝擊——成為水吧，我的朋友』（“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 be water, my

friend.”) 抗議者將這個比喻延伸到描述他們的戰術。在面對警察或暴力治安團體時，『像冰一樣堅強』；『像水一樣流動』，以便同時擾亂城市的許多地方，使警察資源緊張；『像露水一樣聚集』，進行難以準備的『快閃』抗議；『像霧一樣散開』，避免被捕，改日再戰。」(Anderlini 2019)。

在命名上，本文把 2019-2020 年於香港爆發的抗爭浪潮稱為「流水革命」(Be-water Revolution) 而非常見於台灣、香港媒體的「反送中運動」，在於這個指稱能更好地描繪整場社會運動溢出單一的政治議題（從一開始圍繞逃犯條例的爭議，到後來香港人關注警方使用過分暴力、國際制裁、爭取民主制度改革和自治權利等面向）的特色。此外，相對於「反送中運動」所呈現的官民對立和民衆抗拒外部威脅圖像，「流水革命」更多地強調了這波社會運動所體現的去中心化特徵、眾多參與者充滿創意和動感的實踐，以及抗議浪潮所呈現的連接性與流動性，把社會不同界別和地方的人、物品、知識、情動和元素聚集起來，進行政治轉化並重新組合，既讓氣勢宏大的群眾的集體行動遍地開花，也讓強烈的抵抗情感深入都市的日常角落與身體的臟腑肺腑之中。

吸收了國際武打巨星李小龍的「運動哲學」，「流水」不僅表現了示威者以多樣化的抗議曲目應對警察，它也是一種有關身體作為與移動的隱喻 (Urry 2012: 26)，描述了參與運動的群眾如何流動、溢出警察溢定的維安空間，以及發展各種在都市中遊走的空間戰術。透過分析流水革命的經驗資料，本文也會提出「be water」帶有身分與位置流動的意思。以此看來，我們習慣為常使用的「社會運動」概念，其實具有的兩義性。在媒體報導和訪談中，許多流水革命參與者都曾談及他們如何從「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 — 採取溫和抗爭方式的示威者) 轉變為「勇武」(勇武抗暴 — 採取更激進及暴力行動) 的示威者，中間就涉及到肢體動作、抗議裝備和政治、倫理判斷的轉變過程。對於這些從中生成的主體而言，「運動」不僅有公民參與，推動體制變革和身分轉化的社會意義，也包含身體的動作和練習，移動於環境地勢的物理與政治意涵。本文認為，學界需要重新考慮和橋接「運動」的社會意義與物理面向，以一種沉浸式的身體感擴展並重新理解抗議政治的空間性。同時，通過位置的轉移（例如是隨著衝突升級而使用暴力），運動參與者會發展出迥異的空間實踐與游擊戰術，視都市空間為充滿挑戰和危險的地勢。

作為寓居於世的肉身存在，我們的身體與周遭的空氣和其他身體的呼吸無法截然二分，而是互即互入，恆常處於交換和纏繞的狀態。研究者身處群眾其間，與運動者一起漫游 (wayfaring)、感受和思考，能夠帶回參與者與實質環境交纏的氣息/啓發 (inspiration)，有助於既有社會運動理論突破靜態、結構化、工具化、去身體和對情感麻木的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從流水革命的流動特質和環境面向開始發想，強調了運動者的共同呼吸與身體動作、移動方式的政治性，以及他們與國家暴力和大氣/氛圍聯動，產生親密（有時是正面，有時是負面）的情動連結。

現時，抗議政治空間性的研究雖然有涵蓋移動性和社會動員 (social mobilisation) 的各種機制，但普遍缺乏具身的「運動」(bodily movement) 和感官 (sensorial) 的視角，忽略了抗議政治的影響如何呈現於參與者的身體、其周遭物品及都市環境的緊密連結之上，甚至改變他們的(非)日常移動方式。本文認為，學界不應該忽略抗議政治空間的身體性——社會「運動」本身，其實也包含體育、健康、動作、情動等身體性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這些經驗可能是隱含或被遏制的。許多遊行活動往往也是多以警方框定的路線、集會廣場，以及參與者進行視覺展演為主導。不過，當都市抗爭激進化——甚至演化為暴力升級的衝突的時候，參與者就將面對一個更為危險的都市環境。他們需要更積極打開感官和訓練體魄，應對時刻變動的抗議現場。

至於在現有的地理學文獻中，身體、移動性與周遭環境條件的密切關係，是日漸受到學界關注的議題。第一類是具有健康意義的大氣經驗，例如是都市居民如何在空污社區中維持日常生活，從中感知到眾多身體與環境的交織性。第二類是沈浸於天氣世界 (Ingold 2010)，身體的遊走感覺和動態認知，第三類是在地緣政治衝突、戰爭和核武器武器實驗的脈絡下，士兵和常民的身體感受和移動性，探討他們如何在嚴酷的地勢中戰鬥、疏散和生存。這些研究牽涉到不同類型的身體和主體，如何感知、穿越和生活於特殊元素環境之中。可惜的是，學界尚沒有系統地討論抗議政治的身體運動經驗，揭示這些抗爭者於都市量體一同遊擊的移動方式及知識，甚而是與蔓延都市的大氣/氛圍一同風化 (weathering with urban atmospheres) 的不同模式。

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面對反全球化、反種族歧視、以及反威權擴張等社會運動，出現了許多採取使用催淚瓦斯等警治手段的案例。在這些都市抗議場域，抗議者沉浸於一

種特殊毒性的大氣環境 (physical atmosphere)，以及警民衝突的情動氛圍 (affective atmosphere)。過往抗議政治研究，對於政治變遷過程與相關空間議題多少著墨，但對於不同抗議者如何透過身體感知、穿越和生活於實質與政治環境，以及如何從中反思「運動」的多重意義等較少提及，乃為一個研究缺口。因此，本論文特別以香港流水革命 (2019-2020) 為例，主張激進社會運動爆發過程會產生身體動作和都市移動的政治性，讓都市氛圍及抗議者產生持續的、共同風化的過程。抗議群眾面對都市環境遭受毒害的危難處境，在集體漫游和實作中，會逐漸瞭解、調適並熟悉其周遭充滿風險的環境，練就具身的導航技藝。

在晚近的社會理論和人文地理學文獻當中，風化的多義性（既表示物質曝露於大氣影響下所產生的作用，也可指涉訓練動物、忍耐、練習、手工藝等文化技術和活動）越來越受到論者重視和強調，以此黏合不同領域的知識，並反思人類身處環境，伴隨環境一同變化的異質經驗。留心於人與環境之間的風化關係，也讓我們得以重新提出有關主體性、能動性、尺度，甚而是關乎整體系統的動態變化和崩解等理論問題。在《風化：曝露的生態學 (Weathering: Ecologies of Exposure)》這本具開創意義的論文集中，Holzhey (2020) 從語言學視角分析了風化的語義對立性。他指出在不同配價 (valency) 之上，風化這一詞彙均顯示了迥異的「主語—賓語」語法關係，從而折射出相應的權力模態、不對稱的「主體—客體」關係和「身體—環境」關係。比如說，當我們說國家使用催淚瓦斯風化都市環境和抗議者時，其中可能包含了許多依賴先進技術所中介的大氣監視系統和化學暴力裝置。至於當我們分析抗議者的風化有何含義的時候，則可能在物質性和技術中介的層面以外，帶進更多身體性和情感性的語義，例如是指向抗議者如何具身地穿越和創造空間，忍耐被催淚瓦斯和病毒所改變的環境，把這種受害經驗與感觸內攝，重新表達為公共語言，形成跨身體的共感。

風化作為一種詮釋社會運動經驗資料的啟發式方法，提供了一個跨越不同尺度和知識領域的理論視野。這一視角更加動態、切近且敏感於身體運動與環境變化，為社會運動研究注入新的思考維度。對於社會運動的考察者而言，風化補充了傳統研究中將環境視為靜態背景，或對環境想像缺乏流動性的不足。透過與都市大氣/氛圍一同思考，風化揭示了那些持續影響抗議行動和身體潛能的物質—情動力量 (Adey 2015)。這些力量不僅充斥並

超越單一社會場域，還往往被會理論忽略，當成無色、無味、無聲的背景。本文主張，以風化為視角，有助於重新理解抗議政治如何在動態的身體與環境互動中展現其多重意義。

上述這些議題都會在後續章節中有深入討論。以下，我先簡略說明論文的章節安排。本文內容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會考慮口述歷史、紀實電影和筆者的訪談資料，從特定的抗議事件與場所重構流水革命參與者與國家大氣暴力相遇的過程，並從三個角度去理解「運動」的政治意涵：（一）抗議者的身體緊密地與都市環境和元素糾纏起來。當身體遭遇國家化學暴力，群眾會逃逸、聚散和抵抗，溢出警治框定的空間界綫與交通模式。（二）面對化學暴力，香港抗爭者發展出多樣化的活動方式進行抵抗。隨著流水革命展開，許多日常移動的工具、健康物品和運動商品，都被參與者挪用和轉化為充滿政治意涵的抵抗物質 (*resistant matters*)。（三）在都市衝突下遊走、移動和活動身體，往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和地勢挑戰。參與者在「運動」中身處不同的位置或角色，會產生差異化的風險和空間知識。儘管如此，流水革命在參與者之間激發了一種暫時性，卻黏著的團隊紐帶。他們通過在現場一同呼吸、游擊和分工協作，形成抵抗威權的共感。

在第二部分，本文通過對抗議事件目錄的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考察在更長時間幅度底下，因應催淚瓦斯、新冠肺炎等大氣擾動 (*atmospheric turbulence*) 事件而蔓延的威權政治氛圍，如何與香港流水革命參與者的身體共同風化，形塑他們面對大氣警戒的抗議風格以及運動軌跡。透過對風化的概念進行探討並接合當代情動理論的觀點，本文分析了新冠肺炎爆發前後香港都市環境的改變，以及示威者面對大氣警戒和擾動的都市環境時，與國家暴力和病毒大氣一起風化的眾多方式，包括唱歌、悼念、集體現身與呼吸調適。這些身體美學實踐展現了抗議者如何在日漸嚴酷的都市氛圍中獲得政治覺醒，同時試圖讓流水革命在被政府抹除的危險中持存 (*endure*)。

透過激進社會運動中的情動及具身視角，本文主張「運動」本身除了是一種公民參與，推動體制變革的社會意義，也包含身體的動作和練習，移動於環境地形，以及身體與都市大氣/氛圍共同塑造、聯動、風化的物理意義。這樣橋接「運動」的社會意義與物理意義，清楚說明抗議者不只是被框限於預設的集會遊行空間，而是會外延和曝露於大氣下發聲、呼吸、流汗、受傷、練習，充滿情動和質感。甚至這樣沉浸式身體感擴展抗議政治的空間性，更有其時間延展效應，會後續對抗議者日常生活空間和節奏實踐產生實質改變。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對於參與者而言，社會運動是特殊的歷史開放和文化轉變過程，也是個體與集體身處於關鍵時刻，經歷強烈情感、認知轉化的一系列事件 (Della Porta, 2016)。儘管既有文獻已討論了抗議政治的多重空間性 (multiple spatialities) 和各種類型的空間實踐 (Leitner, et al. 2008)，卻仍然缺乏探討其中身體、物質性與都市移動性的緊密聯繫。特別是，對於都市居民而言，「運動」也是一種身體性的沈浸和空間越界經驗，也關乎參與者如何使用身體和周遭的物品。有鑑於此文獻缺口。本文認為，香港流水革命作為激進都市抗爭的案例，將驅使抗議政治研究考慮和串連感知身體、大氣/氛圍、物質性等較為前沿的空間範疇，挖掘抗議者遊走於都市環境的空間知識、具身經驗及轉化作用。

近幾年出現許多國家採取催淚瓦斯等警治手段的案例，來處理反全球化、反種族歧視、以及反威權擴張等社會運動，例如從 2016 年的 1 例激增到 2019 年橫跨五大洲的 20 例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3)。政治地理學者把這種現象稱為大氣警戒 (Feigenbaum, 2015)，國家致力通過暫時遏制人群呼吸的能力，奪取受到群眾佔領的空間。催淚瓦斯的全球流通和在地化，顯示了政府越來越傾向把空氣武器化，對付「不聽話」的群眾。在這些充滿身體的都市抗議場域，抗議者沉浸於一種毒性的物理大氣，以及高亢的政治氛圍當中。

過往的社會運動研究傾向以結構條件和因果機制的方式進行呈現，近年開始有考慮各種時間和空間的範疇，來分析社會運動過程、脈絡及其軌跡。然而仍有兩個不足。其一，很少注意到都市大氣/氛圍，也因此未能具身地把握社會運動橫跨多尺度和維度的空間關係——特別是與警治和衝突情境密切相關，卻稍瞬即逝的大氣/氛圍。其二，是其中遊走和呼吸的身體 (moving and breathing bodies)，正視身體與其周遭的實質環境，而非忽略人與物質環境之間，充滿不平等和張力的權力關係及空間知識。因為若社會理論把這些資訊視為不相關的給定條件，將導致一種靜態和機械式的社會運動想像。

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空白，擴展社會運動空間分析的可能性。量體地理學及女性主義地緣政治可以通過研究各種湧現於抗議活動中身體、物品及其關聯動作、移動的樣貌，與社會運動理論產生對話。本文認為，呼吸身體與大氣及都市量體緊密糾纏與實踐，會影響到社會運動的性質和出現形式，以及各行動者如何戰略性地移動、使用和重新創造空間

(Routledge, 1997)，甚而是更新了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的想像——把實質性的身體、大氣和地勢等量體概念，突顯為警察與群眾激烈交鋒的舞台。這些伴隨警民衝突而產生和轉變的大氣/氛圍，無時無刻都改變著群眾的情動流向 (affective flows) 和行動能力 (capacities to act)，也會影響到都市的運作邏輯和居民的日常經驗。

建立在跨學科的具身及情動研究取徑之上，本文試圖將社會運動從「令人窒息」的動員框架中移開，並切且重新構想一個溢滿生機的詮釋方法。我將指出，「社會運動」不僅是指狹義的「動員與被動員」過程，也包含各種受到網路關係和現場情境所激發，群眾身體的動作和練習，移動於環境地形的物理意義。這些「運動的身體」會使用到不同的載具和物品，同時產生強而有力的抗議氛圍，以身體認知和改變城市的運作邏輯、意義與情感。現時，抗議政治空間性的研究雖然有涵蓋移動性的研究，但普遍缺乏身體上的動作練習、情動和感官的視角，忽略了社會運動如何改變人們的（非）日常移動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身體的移動經驗及可能性都處處被政府所框定和遏制。一旦既有的、潛藏的、籠罩社會的公眾秩序被打破，群眾的聚集就有可能打破和重構主權的情動配置 (Wall, 2020)，讓其政治力量自身體之間溢出，擴散至都市不同場域。甚至乎，當抗議因激進化而演變為暴力衝突時，參與者就需要面對一個更為危險的都市環境。激進示威者需要更積極地打開感官和訓練體魄，應對國家的化學暴力、警治鎮壓和時刻變動的抗議現場。因此，在催淚瓦斯等元素性的化學暴力蔓延都市大氣的當下，這層「運動」的身體性意義和政治潛能需要被重新強調。

2.1. 社會運動的多重空間性

社會運動是指通過非傳統手段實現政治目標的集體抗議政治形式，牽涉到互相衝突的主張以及各種社會力量的交纏與交鋒 (Iaquinto et al., 2022)。Routledge (1997) 曾提到，以往的各種理論範式基本上都是通過時間的範疇理解社會運動 (包括動員、組織和策略) 與其結構、文化過程（例如政治機會結構、認知框架以及運動身分認同的創建, 見 Tarrow 2011），缺少探討特定的空間性如何形塑社會運動的性質及其表達方式。受到人文學科的空間轉向影響，近年來不少政治學者開始把社會運動的空間維度凸顯出來 (Tilly 2000; Martin &

Miller 2003; Della Porta & Fabbri 2016)，討論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如何生產其獨特的爭議空間 (特別是利用法國哲學家 Henri Lefebvre 的感知空間、構想空間，以及生活空間的三維結構)，以及空間如何促進或限制了社會運動能動性及各行動者互動的軌跡。都市空間不只是一個物理的容器，也是一些相互交疊的社會關係。空間因其物理及關係性的特徵，而產生政治衝突。而且，空間經常是受到權力規範的，它們難以被視為外在於政治衝突，而是位於政治爭逐的過程當中 (Kwok & Chen, 2022:617)。例如，社會運動經常牽涉到具有政治意義或象徵的場所 (locale)，這些空間的產生，有可能是由國家等公共權力所賦予或介入，也有可能是人民集體行動的偶然產物 (Lee, 2009)。作為一組社會關係，社會運動的空間性也可以呈現為抗議者身處特定場所 (例如是佔領營區或公共廣場)，有意或無意遵從的規範。這些規範也是歷史的，可能是基於警治機構於群眾長時間的互動而固定起來 (Kwok & Chen, 2022: 619)。

除此之外，社會運動研究者和政治地理學者也透過一系列概念，產出了許多分析社會運動空間性的框架，顯示空間性對於我們理解社會運動的軌跡與形式，是必不可少的概念工具。政治地理學者 Leitner (2008) 曾歸納了五個抗議政治研究用以討論社會運動多重空間性的範疇。第一個範疇是結構化的尺度 (scale)，尺度的政治貫穿於社會運動，為不同的行動者在其關係網絡中建構起來，並且服務於特定的戰略目標。至於這些複數的尺度框架 (scale frames) 也有可能是相互競爭，左右著組織和行動者對於運動的想像 (Leitner, 2008: 160)。第二個範疇是處於特定政經結構與意義網絡底下的地方 (place)，意謂抗議者的實踐會匯聚於特定的地點 (sites) 之上，並且產生了相應的物質建設、情感依附 (attachments) 和權力關係，形塑著當地的空間秩序。近年也有政治學者關注佔領營地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腳本，看見其中隱含的階級關係和矛盾 (Tominaga, 2017)，其他研究也探討了地方本身如何被示威者賦予意義和想像，成為政治衝突的焦點。在弱勢群體的運動空間策略當中，也經常牽涉到如何他們如何藉由展演去顛覆主流的美學習慣、重構特定地方的意義，獲取政治能見度 (Leitner, 2008: 162)。

第三個範疇是網路 (network)，即社會運動的行動者能夠建立跨地方的網路，把不同地域或地方的組織、個體連結在一起，招募成員、共享資訊及資源，構成抵抗的拓撲空間 (topological spatiality)。隨著網際網路興起，社會學者也關注網上平台和社交媒體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 (Castells, 2012: 222; Bennett & Alexendra, 2013: 40)，在與實質空間的

來回轉譯中，改變抗議者之間的組織、溝通模式及領導關係 (Gerbaudo, 2012)。第四個範疇是社會空間位置性 (social-spatial positionality)。受到女性主義對於關係性、處境性的能動性和權力概念所啟發，社會運動研究已廣泛地注意到性別、階級、種族和其他差異和交織的關係，會如何影響行動者的主體性、想像、利益和知識取向 (Leitner, 2008: 163)，這些差異經過他們的日常操演而再製。當然，社會運動也牽涉到處於不同位置的主體，如何溝通、結盟和合作，或有機會從集體行動中轉化此前的位置、身分與視角 (Leitner, 2008: 164; Routledge, 2015: 384)。第五個範疇是移動性，主要是關注主體和物體於特定時空中移動 (或不動)的方式和權力關係，而在移動途中，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也有可能產生新的經驗與想像、協商與衝突，鬆動給定的身分和關係 (Leitner, 2008: 165)。

Leitner (2008) 指出，以上的社會運動空間性範疇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分開，但於運動的實際實踐上則會相互依賴和混合起來。近年盛行於政治地理學的拼裝理論 (assemblage theory)，也是一種對於社運多重空間性的整合，即人與非人部件在特定時空內暫時聚合 (temporary aggregates)。從以上的概念歸納中可觀察到，社會運動的空間研究正從靜態的結構條件與因果分析，移轉為關注不同能動者之間的網路化連結，以及各種社會/空間場域之間的流動狀態。為了改變社會運動理論淪為動員研究 (mobilisation studies) 的狹隘化趨勢，一些持更基進立場的抗議政治研究者更提出以「場域 (fields)」(Fligstein and McAdam, 2012)、「舞台 (arenas)」(Duyvendak & Jasper, 2015) 等概念取代「社會運動」的中心位置，以分析「國家」、「地方」、「社會」與「運動」等邊界更為多孔、分散和流動的動態過程，切實回應現實上不同行動者的能動性及其抗議活動之間，相互聯結、滲透、溢出的關係。

對於以上與社會運動空間性相關的理論討論，本文同意學者研究需要以更流動和對多重空間性敏感的方式，去理解「社會運動」這個概念。不過然而仍有兩個不足。其一，既有文獻很少注意到都市大氣/氛圍，也因此未能具身地把握社會運動橫跨多尺度和維度的空間關係——特別是與警治和衝突情境密切相關，卻稍瞬即逝的大氣/氛圍。其二，是其中遊走和呼吸的身體，正視身體與其周遭的實質環境，而非忽略了人與物質環境之間，充滿不平等和張力的權力關係和空間知識。因為若把這些身體、空間及環境資訊視為不相關的給定條件，將導致構想了一種靜態和機械式的社會運動想像。在這個意義下，我認同 Gukelberger & Meyer (2021) 的呼籲，在結構和言說分析以外，社會運動研究需要更認真看

待抗議的具身、參與及情動等眾多屬性 (embodied, participatory, and affective qualities)，並透過現象學對於社會運動參與者者經驗的獨特視角，分析抗議情境出現的微觀動態和抗議氛圍的連續動態 (Gukelberger & Meyer, 2021: 7)。抗議的身體應被視為一種「移動，言說和文化空間，無論是就其自身而言，抑或是身在空間之中。集體的具身實踐也作為能動性的中心，即言說與展演作用於世間的眾多位置」(Gukelberger & Meyer, 2021: 3)。

社會運動不只有動員的工具性面向，同時也帶出了抗議者的身體動作與移動的政治文化意涵。不過，有別於 Gukelberger & Meyer 只把氛圍概念化為散發自抗議身體之間的意義範圍 (province of meaning)，本文認為大氣/氛圍的多義性 (同時包含物理大氣與政治氛圍兩者) 能夠在抗議現場捕捉一種複雜的，持續處於「運動」狀態的人與環境關係。對於如何構想一種更為流動且具身化的社會運動，我採用的方法並不是以另一個概念取代社會運動，而是重構「運動」的詮釋框架，尤其是關注個體、聚集的身體運動，以及具身化的空間實踐和知識，如何與都市量體、大氣/氛圍纏繞及進行關係重構。這樣的重新想象運動，有助於抗衡社會運動理論（和動員研究）趨向高度工具化、結構化、去身體且「忘記呼吸」的傾向，把眾多在地行動者的聲音帶回討論。關注大氣/氛圍，也將讓研究者更好地調適於 (attune to) 周遭世界的變化，尤其是覺察身體與環境元素性的、親密的牽連。主體與他者共同分享和曝露於環境的影響，究竟會產生哪些充滿政治性的互動方式與倫理關係？在以下部分，我將回顧地理學的大氣/氛圍研究和人類學的現象學視野，如何幫助我們進一步詮釋這種把身體、物質、環境，以及都市大氣/氛圍等量體關係都匯聚在一起的「運動」概念。

2.2 大氣警戒與抗議身體

無論是物理大氣疑惑是情動氛圍，都具有中介 (mediation) 的作用。Engelmann & McCormack (2021) 指出，空氣是一種元素媒介 (elemental media)，具有可讀性和介導作用，能夠提供即將到來的事物的跡象。空氣之中承載著那些資訊和意義，可以告訴我們當代的都市生命/環境政治的特徵。地理學近年出現大氣/氛圍轉向，已廣泛討論了空氣的元素性 (Adey 2015)、橫跨自然和文化的多重意義 (McCormack 2008; Choy 2011; Adey 2014; Marinucci 2019)、基礎設施技術 (McCormack, 2017) 和都市情動實踐 (Gandy 2017; Bille & Simonsen 2021, Bille & Hauge 2022)。不少學者也致力於詮釋「大氣/氛圍」物理與情動的雙

重意涵，接合兩者為一個豐富的批判地緣政治場域。當代有關大氣/氛圍的論述，往往都與其湍流和動盪狀態息息相關，在不同擾動事件和災害裡，人們往往能從空氣中感知到衝突和危機的物質性與情動強度。空氣和各種氣體透過在量體中的不均衡分佈和擴散，以及透過技術進行分隔、遏制等過程，會製造和揭發特定的社會秩序，界定統治者的權力，同時也激發被統治者服從、抵抗、發生的權力。

當代都市環境易於被框定為生命政治媒介，以隔離或包覆技術服務於醫療、維安、經濟等目的。其中，空氣被調節為不同(增益/毒害)的品質和濃度，展現了照護與暴力的權力關係。Kenner et al. (2019) 問道：在特定時空裏，什麼東西和誰被視為可接受的實體？(Kenner et. al 2019: 154) 誰擁有充足/清新的空氣，誰沒有？空氣日漸被設計為分層化和差異化的球域，讓權力調節為正面與負面的品質。這種控制呼吸條件的實踐，也決定了「生命的價值」— 誰的生命重要(需要維護)，誰的生命不重要。因此，在不同的歷史脈絡和權力關係裡，我們看到空氣/大氣也是生命/死亡政治過程的重要一環，並與身體、技術物及其他物質組裝起來，產生特定的政治效應。Adey (2021) 則指出，呼吸的取走(breath-taking)可能是快速(例如美國種族主義的警暴讓 George Floyd 窒息而死)或是緩慢(例如空氣污染危害附近居民的健康)的，而且呼吸與國家暴力、物質、種族歧視等現象都是緊密交纏的。

這一點把我們帶回本文一開始提到的，蔓延全球的大氣/氛圍警戒趨勢。面對在人口密集的都市中頻密發生的抗爭，政府和警察越來越傾向使用催淚瓦斯等化學暴力去對付「不聽話」和憤怒鼓譟的民眾，企圖把他們驅散「回家」。這些毒氣武器攻擊事件也展現了主權或其他形式的權力有能力運用化學合成的氣霧對人類做成毀滅性(或「非致命」)的影響，暫時剝奪敵人的抗議能力和生存條件(見於 Sloterdijk 2009; Larrinaga 2016; Nieuwenhuis 2016)。同時，這些進行抗議的群眾也突然發現了自己被剝奪的權利— 不被認可為可以發聲的公民，或是容許於空間存在的實體(Nieuwenhuis, 2016; Kenner, et. al, 2020)。Nieuwenhuis (2016) 指出，催淚瓦斯等「非致命」化學武器，讓受害者透過身體的不適感，注意到大氣/氛圍不穩定的物質性和流動性。空氣與呼吸身體的交換過程，可以讓生命政治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外顯出來。他認為只有當空氣的物質確切性突然崩塌，不再運作時，人們才會發現其中的「不可見政治」。當身體出現呼吸困難時，才會發覺空氣的「重量、物質性和外顯真實性」(Nieuwenhuis 2016: 7)。

當代警治不只是對身體的物理規訓感到興趣，而是更積極參與實質環境的設計與控制。在抗議現場，政府對於空氣的介入方式是透過臭味劑、聲波、有毒氣體，攻擊人們的感官機器，導致生理與心理狀態的危機，也改變人與其生存及行動場域 (milieu) 之間的關係。作為一種以空氣傳播的「非致命」化學武器，催淚瓦斯被設計為同時攻擊多種感官，產生身體和心理創傷。大氣警治的論者認為，空氣中的毒氣超越了「生理創傷與政治創傷的多孔邊界」(Malabou 2012: 11)，警察通過於示威者身體的微觀尺度產生震攝恐懼情緒，鎮壓其抗議能力：「催淚瓦斯和其他非致命性氣體的吸入會產生顯著改變的微氣候，使受害者的身體受到高強度的疼痛刺激，觸發呼吸道和肺部腺體和肌肉的無意識和自主反射過程，迫使身體改變呼吸模式，強迫其陷入部分或甚至完全失能的狀態」(Nieuwenhuis, 2016: 12)。另一方面，催淚瓦斯也具有跨越時空尺度的警治作用，在科學家還沒有充分了解毒氣如何影響身體神經系統的情況下，新世代的化學武器在空氣中傳遞的速度更快，在人們身體感到不適之前，就迅速穿越空氣散佈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毒氣也可能對身體產生時間延展的影響，像是會造成流產，或胎兒缺陷與基因突變，人們難以知道未來可能會發生那些副作用。因此，空氣恐怖主義不僅僅是對身體物質的攻擊，更根本地侵犯了身體與空氣之間的沉浸式心理與生理關係：「恐怖不能單單被歸因於心理上的誘發作用，而是（警察）通過製造致命的大氣，在物理上進行介入」(Nieuwenhuis, 2016: 12)。

在這種把都市大氣/氛圍與身體致命地，卻也親密地聯結起來的情動迴圈當中，政府和警察把抗議群眾的身體，視為需要受到國家力量馴服和遏制的量體地勢 (Squire, 2016, Furuhashi, 2022)。那些受到防暴警察驅散的群眾，經常被治理者指稱為一種過剩 (in excess) 的、不服管的、非理性的狂暴流動。在這種上而下的俯視想象中，群眾需要被冷卻下來，讓社會和公眾秩序返回「和平安寧」的狀態 (Wall, 2020: 9)。不過，國家運用催淚瓦斯等技術施行大氣警治的效果，也可能是適得其反的，因為當代的都市抗爭者和被剝奪權力者，都會以各種方式應對受到武器化的空氣 (下一節將會提到)。於是，催淚瓦斯並非一定起到衝突降溫的效果，而是讓廣大民眾受到道德震撼 (moral shock) 的情緒所感染，動員更多人加入抗議的行列。

2.3. 研究「運動」的情動及具身取徑

警方越來越頻繁於示威現場使用大氣警戒技術，而社會運動曲目亦日漸多樣化，抗議者並不必然固守於特定地點或單靠特定手段爭取訴求。情動力量溢出了既有身體與空間界線。對此，我認為現象學理論提供了一些關於當代「運動（作為身體動作、移動）」實質意義的啟示。人類學家 Tim Ingold (2010) 指出，身體的行走動作也隱含著一種「運動中的感知觀點」(kinaesthetic perceiving)：運動與思考並非截然分開，而是意識在運動中去不斷認識身體和世界，與大氣與地面彼此符應、共同生長 (co-evolving) 的過程。行走並不遵從心中的藍圖，而是需要透過肉眼不斷轉換視界，從感官吸收信息來移動，因此走路同時也是思考和知曉本身。周遭大氣包覆著行走的旅人，他們透過不斷練習，可以變得熟練和獲取智慧，掌握風中和地上透露著各式各樣的線索。Ingold 對於運動的「實質」意義之詮釋，可補充社會運動長期以來對於身體動作與移動性及環境糾纏的忽略。尤其是，當社會運動處於都市大氣/氛圍的警治與衝突脈絡下，本文強調必須在概念上需要橋接「運動」的身體動作和移動這兩層意義，以包含社會運動的情動與物質性、身體感官和環境感知的面向。

在類近的都市地緣政治文獻中，Fregonese (2017) 曾提出棲身於都市衝突的民眾，具有沈浸式的感官體驗 (immersive sensorial experience) 和流動的默會知識。他從居民的角度捕捉了衝突局勢升溫與降溫的氛圍變化，特別是「那些塑造了都市政治及衝突的日常、具身和微觀的實踐，例如是棲居、移動、人際關係，以及人們在脆危情況下應對和決定」(Fregonese, 2017: 2)。生活在都市衝突熱點，民眾從街道上的氛圍、政治物品的出現或消失、日常移動的經驗以及聽覺的情境覺察能力，了解到衝突的情勢：「人們通過聲音品質和強度，以及對不同武器類型和實踐的知識，居民可以確定交火的大致位置，以及戰鬥與他們所在位置的距離，從而做出保證自身安全的決定」(Fregonese, 2017: 6)。在都市地緣政治衝突升級期間，（非人）物質性和（人類）主體性複雜地糾纏起來，街道上升溫或降溫的氛圍，隨著物體和建築環境的出現或消失而凝聚起來，滲透於居民的日常移動經驗、身體的感官和實作當中。

呼應 Fregonese 研究「氛圍都市地緣政治」的情動及具身取經，本文認為，當都市居民和抗爭者身處警治暴力和社會運動的衝突當中，他們亦需要依靠沈浸式的感知和移動方式，去理解周遭環境——尤其是大氣/氛圍的化學毒性與情動品質。正如上一節提到，警察使用氣霧武器對準「不服管」的群眾，企圖通過調節示威者周遭的大氣品質，剝奪他們的呼吸條件。可是我們不應忘記，示威者並不會被動地停下來接受毒氣的洗禮，而是會逃走、抵抗和聚集結盟。正如 Ingold (2020) 所說，呼吸是活躍、有生機的，「雖然呼吸運動可以暫時停止，但它在本質上不能被遏制的」(Ingold, 2020: 5)。當大氣警戒與抗議者交鋒起來抗議者的具身行動，能夠在警戒球域的溫室宰制效應裡，成功建立喘息房間，甚而是生產出團結抵抗的情動氛圍。Leff (2021) 指出：「在受到催淚瓦斯攻擊之後，人們發展起來的逆反的照護實踐 (counter-practices of care)。吸入毒氣以後，我們需要恢復呼吸，迫使我們依賴他人、互相關心，以讓大家恢復正常的呼吸狀態。在我工作過的許多組織和空間裡，如果醫務人員預期警察會使用催淚瓦斯，他們通常會在安全屋和補給站建立『去除毒氣的基礎設施』(de-gassing infrastructure)。在街頭的醫務人員會把傷者帶進來，然後我們會用洗潔精沖洗他們身上的化學物質，這是人們從過去幾十年來國際鬥爭中繼承的一種策略」(Leff, 2021: 3-4)。身體作為量體和沈浸於量體，具有本體論上的多孔性。情動氛圍具有加劇社會不平等，或建立抵抗聯盟的潛能。人們帶入空間的歷史，與物質構成的大氣/氛圍互相糾纏、混合。受到女性主義的觀點啟發，Leff 呼籲社會運動研究者需要關注民眾對於情動氛圍的調適、生活實踐，以及他們如何挑戰社會上佔主導地位的空氣感受 (feeling of the air) (Leff, 2021: 3)。因此，群眾多樣化的身體動作和移動方式，對於我們理解都市衝突——特別是警治與抗議大氣/氛圍的混合狀態——是至關重要的。

根據上述的情動及具身取徑，社會「運動」關乎「實質」移動者的身體作為、臟器感覺和動覺智能 (kinaesthetic intelligence)。沈浸於警治與抗議氛圍當中，示威者會透過反覆練習，能夠更有準備地應對和從大氣警治中脫困：「訓練有素的身體是自發的戰略家；它頓時了悟、理解、判斷和應對」(Wacquant, 2004: 97; 引用自 Adey, 2013: 196)。對於這些穿越於各種大氣/氛圍之間，「運動中的身體」(body-in-motion) 而言，頭腦並非脫離身體感覺，「純粹通過文字、圖解和觀念來思考，（而是）經由操作的經驗而產生的直觀體悟」(Adey, 2013: 197)。在移動的實作和情緒當中，民眾和抗議者都有著轉化其政治身份的可能。

例如，抗議者會以各種方式與散佈都市的物品和充斥現場的其他身體形成緊密聯繫。

Feigenbaum (2014) 把滙聚和出現於社會運動空間的物體及媒介，稱之為「抗議物質」，指出抗議者和政府都是藉由物品（從圍欄、佔領營、數位技術、毒氣與防毒裝備）的流動和實作，傳達政治訊息。處於衝突現場的物品和建築環境，向抗議者傳達了特殊的意義和情動，甚而是變得「越來越黏著」(the become stickier and stickier — laden with meaning and potent with feelings) (Feigenbaum, 2014: 17)，讓特殊的物質、技術與抗議主體性糾纏起來。

也因此，社會運動是由各種「運動的身體（也包含非人身體）」所組成。事實上，群眾移動性以及他們身處的移動中介物和場域，一直是地理學者分析社會運動空間性的重要取徑之一，民眾移動方式的差異，顯示了他們如何發展出各種揭示權力不平等及不正義，爭奪權力的抵抗手段 (Adey, 2013)。社會運動期間，控制都市移動性的官方策略可能被迴異多元的戰術顛覆 (de Certeau, 1984)。社會運動也牽涉到都市（移動）基礎設施、建築環境和周遭大氣/氛圍，如何被不同行動者政治化、動員和爭奪。國家往往試圖調節這些移動的場域和中介，壓制示威者的反抗和群眾的過剩流動，而群眾也試圖通過集體行動在都市空間現身和遊走，把政府鎮壓的警治氛圍轉換為高亢的抗議氛圍。而且，一旦社會運動升級，示威者與政府的衝突和暴力加劇，都市移動性的「地勢」將會更為突顯（不只是作為公共論述場域的隱喻，而是結合其物理及政治的雙重意義），四處遊走的抗議者需要考慮到都市空間的安全風險及戰略意義，從而尋找或建立可供休息、集結力量和進行抵抗的「呼吸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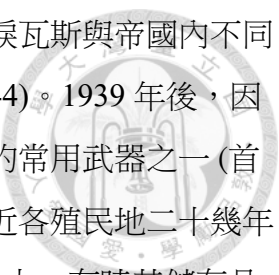
2.4. 糾纏的歷史線緒：香港的大氣警戒與社會騷動

本節從大氣/氛圍警戒的視角，簡略勾勒香港從英殖時期到中英主權移交後的公共秩序與社會運動軌跡。自開埠以來，香港這一島嶼都市便是海權帝國位於大陸邊陲的治理實驗場。就其地理條件而言，亞熱帶的島嶼氣候為白人殖民菁英們構成適應問題，讓整個都市居住環境發展出分層化的空氣空間 (air spaces) (Choy 2011: 160)，隨著物質文化與技術發展，香港也出現各種小規模改變炎熱天氣的空調措施 (air-conditioning measures)。在政治上，香港作為英國於遠東殖民地，亦有其獨特的族群文化及政治地勢。面對毗鄰的中國大陸政權、海外勢力與本地華人精英，英國持續建構混雜的行政體制與法律實踐，處理香港

複雜的地緣政治事務，維持維持冷戰各方勢力在遠東的利益平衡。冷戰時期，港英政府除了發揮促進大英帝國海外貿易利益、橋接各陣營交流的角色，亦需要時刻防範中國國家機器入侵和紅色意識形態滲透的過度多孔性。

在殖民時期，極大比例的香港居民為（因應不同的政治災害）從海陸路徑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人口，他們普遍不被視為擁有完整政治權利的西方公民主體，而且也沒未有產生本土歸屬的政治意識，這些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的居民視香港為暫時的避風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borrowed space, borrowed time)」(Hughes 1985; Hung 2022)。在此脈絡下，Wall (2020) 指出「對於 [大英帝國] 殖民地主權而言，『和平』是讓統治民眾變得順從的規律。這是一種特定的馴服，可能（不）包含忠誠或同意的信念和渴望。殖民地政府需要控制一群暫時順從，但隨時可能陷入混亂的民眾。這意味著殖民地是情動管理技巧發展的重要場所」（Wall 2020: 93）。二戰後，英國各殖民地陸續開發出應對暴動的群眾管治術，包括創建新的維安法律、警察鎮暴手冊與演練方式。殖民地的主權和平呈現為平靜祥和的情動氛圍。作為政府與民眾的界面與接口，英國殖民者把香港警察想像為具有雙面性的執法者：在日常情景，他們低調地融入都市背景，巡視民眾和處理市井糾紛。然而，這種殖民地和平穩定性通常只是暫時的，永遠存在被打破的可能。當殖民地的政治衝突（通常牽涉到冷戰或不同黨派勢力）升級到公開騷亂的地步，香港警察隨即被動員為可靠的反叛亂力量 (counter-insurgency force)，迅速向鬧事的黨派群眾實施鎮壓打擊和心理震懾。在這個脈絡下，催淚瓦斯被視為殖民都市治理配置的重要一環，旨在緊急狀態（被殖民者或其他政治力量衝突的「過剩」）反覆出現的情況下，成為政府期望迅速恢復「社會正常狀態」的警治手段之一。

早於二戰以前，催淚瓦斯已在大英帝國殖民地之間廣泛流傳，主要用以軍事演習（模擬遭受敵軍毒氣攻擊）、應對囚犯暴動，以及海外領土的反叛分子。從 1920 年代起，英國戰爭部門和殖民地部一直有關注美國使用毒氣進行警治的案例，但未有積極自行構建生產鏈和授權各地政府使用。然而，到了大英帝國影響力大不如前的 1930 年代，各殖民地政府（例如是印度和北羅德西亞）不斷向母國提出配置和使用催淚瓦斯的申請，特別是在英國批准巴勒斯坦高級專員的請求之後 (Feigenbaum 2017: 54-61)。在此段時期，歐美國家（主要是美國）已把催淚瓦斯對準暴力及非暴力示威活動，並為它辯護為比起實彈開火「更為人道和文明」的驅趕群眾方法。Mankoo (2019) 指出，當時英國亦在其本土軍營及殖民地



外島（非洲、東南亞等地）進行一系列化學毒氣實驗，以建構有關催淚瓦斯與帝國內不同氣候、地理、人種條件之間關係的「科學知識」（Mankoo 2019: 139-144）。1939 年後，因應科學和醫療數據的累積，催淚瓦斯已成為大英帝國控制殖民地人口的常用武器之一（首例為緬甸仰光警察鎮壓火車罷工事件）。催淚瓦斯的化學元素配方經過近各殖民地二十幾年的實驗室及實地反覆試驗（當時其它類型的毒氣被詬病為有時殺傷力過大，有時其儲存品質不達標和不夠震攝效果），終在 1957 年定錨於 CS 氣體（又稱 o-chlorobenzal-malonitrile 和 T.792）（Mankoo 2019: 222-224）。英國政府認為，這種當代配方能滿足當時帝國的殖民警治需要，「其『穩定』的化學構成和『攝氏 95-96 度』熔點，意味著 CS 氣體有更長『享味期限』，也易於儲存在一些炎熱的殖民地熱帶氣候環境」（Mankoo, 2019: 227）。儘管在 1960 年代催淚瓦斯仍然在英國面臨政治輿論壓力和正當性爭議，它已大批進行工業化批量生產，並深陷於各亞、非殖民地的警治配置當中（見圖（二））。而且，有關施放催淚瓦斯施放的「科學」專業計算及（具有彈性、模糊性的）實踐規範也開始慢慢成形，儘管不同殖民地之間有所差異。值得一提，當時的殖民地警察不只是把催淚瓦斯示威警察在遭受攻擊時「被動地」驅趕敵對暴民，而是更積極地驅散非暴力公民行動¹（包括進行靜坐，手無寸鐵的婦孺）和用以懲戒不服管群眾（punish unruly crowds）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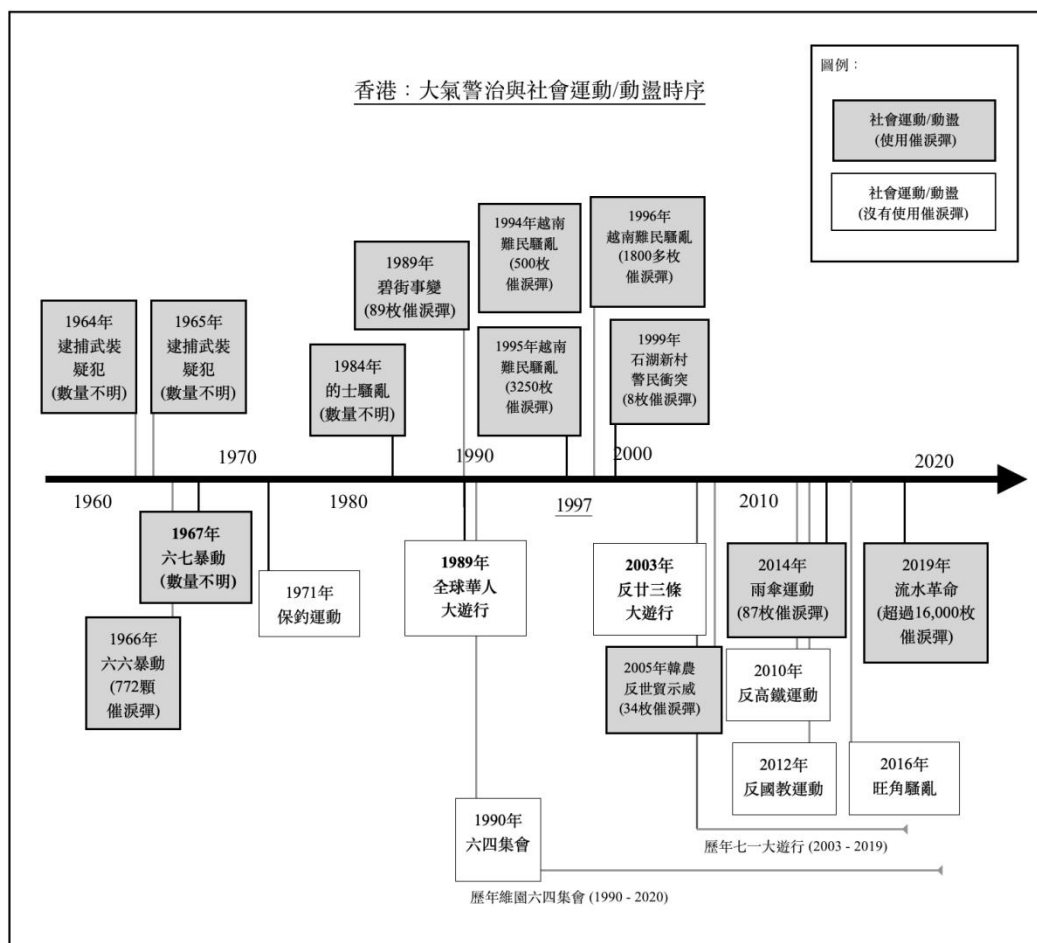
考察了催淚瓦斯的於大英帝國的橫向擴散與流通過程，我們需要進一步將毒氣的大氣/氛圍警治案件與特定殖民地（香港）的歷時性流向或變動交匯起來，才能把握更立體的「大氣警戒—社會動盪」圖像。從圖（一）的案件時序整理，可歸納出幾個關鍵的歷史轉接與趨勢。1960 年代的香港首兩宗使用催淚瓦斯的案件，都是用於逮捕武裝罪犯。受到本地左派動員和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1967 年的騷亂（左派稱為「反英抗暴鬥爭」）為香港歷史分水嶺，面對這場公共秩序危機，港英政府甚至制定了撤離方案，也大肆動用催淚瓦斯鎮壓日漸升級的左派群眾示威（Cheung 2009）。六七暴動受到鎮壓後，港英政府加強推進一系列經濟及社會發展計畫，擴大行政建置以收編殖民地的公民社會，克服反對聲音（Ip 2019）。其後二十年間香港殖民地當局有需要使用到催淚瓦斯的公共秩序的氛圍擾動事件，主要

¹ Feigenbaum (2017) 指出：「在這段時間裡，催淚瓦斯與國家拒絕回應變革訴求的能力密切相關。它作為一種身體上的（驅散）和心理上的（瓦解士氣）雙重力量，使得一定程度的公民反抗（警方對集會規定）行為可以輕易被控制。此外，由於這些武器如今可以合法地用於對付和平或被動抵抗的示威者，目的是讓他們在旁人看起來十分愚蠢，當局對於新的非暴力集體行動形式不再感到那麼威脅。催淚瓦斯成為了一種常用工具——不僅用於鎮壓群眾，還用於有計劃地削弱公民不服從行為。」（Feigenbaum 2017: 61）

為小規模騷亂（這些事件背後均有國共兩黨勢力介入）和外來難民與警方衝突。至於本地社會的抗議行動則比較「建制化」和嵌入於政府的協調機制當中，在這段時期，社會運動變得越來越建置化，民主派也在殖民政府開放部分民意機構議席選舉後，發展所謂的「議會路線」街頭示威動員方面，反對派領袖組織需要與政府協商，劃定路線和集體空間 (Kwok & Chan 2022)。較有名例子，有 1972 年保釣學運應港英政府要求取消集會和 1989 年六四事件後支聯會收到港英政府警告，決定臨時取消全港大罷工。其後每年的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主辦方都會按慣例向香港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劃定明確的遊行路線和集會範圍。在香港其它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當中，這種協調機制普遍為本地各派別所實踐。另一方面，幾十年間香港的群眾運動也漸漸形成了一種身體習慣性——形塑何謂「恰當」抗議身體動作展演，例如是參與七一遊行的民眾有秩序地遵從遊行路線從 A 點走路到 B 點，由主辦方牽頭拉橫額領叫口號；每年相似的六四晚會的集會議程，也被批評者認為是「行禮如儀」。當 2014 年戴耀廷教授等民主派政治領袖發起佔領中環行動之前，主辦方甚至預先演練了公民抗命參與者應如何被警方拘捕，作為整個「和平、理性非暴力」身體抗議行動一個重要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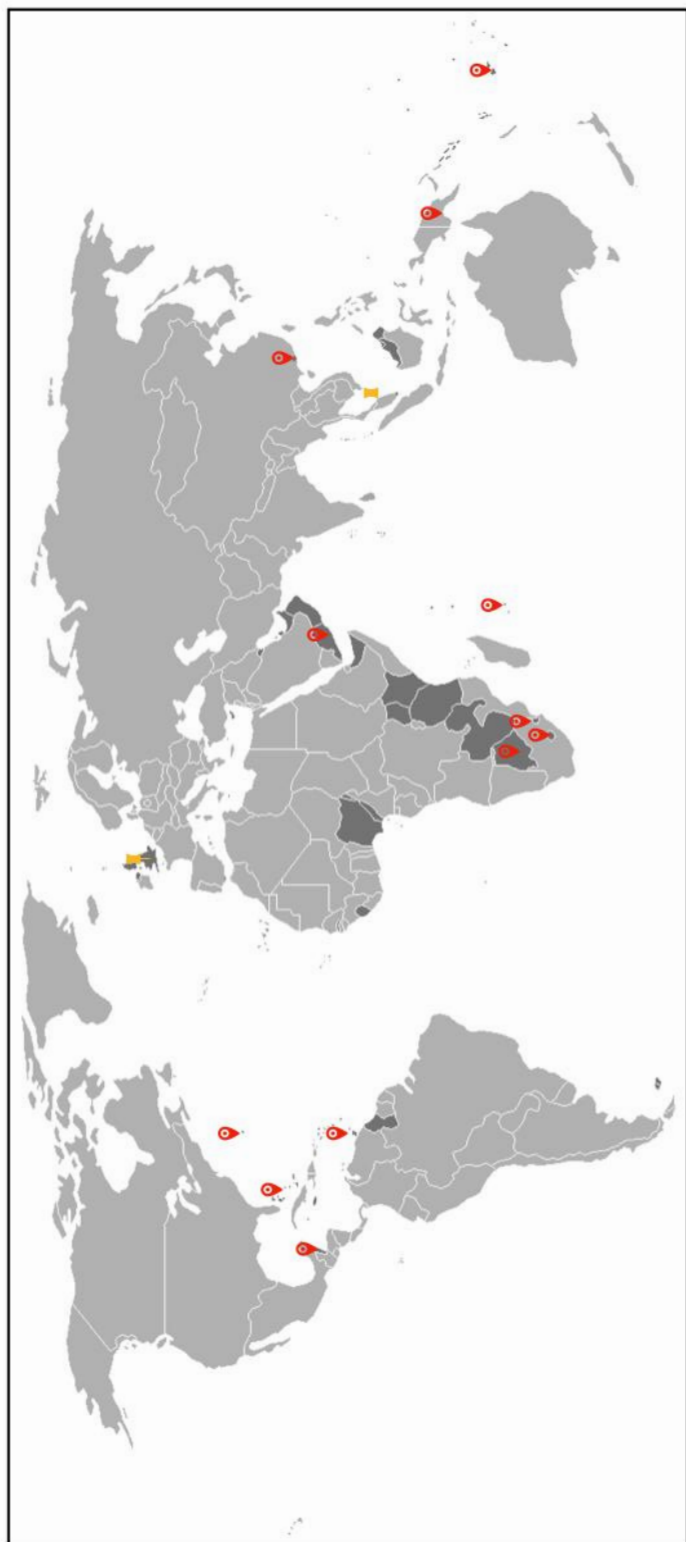
中英主權移交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殖民地城市的政治地勢和景觀，但香港特區政府大致上仍然延續了殖民地法律及警察的公共秩序配置，但從全球脈絡來看，社會運動的型態已有所改變。二十一世紀初，反對全球新自由主義的佔領浪潮在香港上演，預示了往後政府重返以大氣警治鎮壓社會運動的維安策略。2014 年，催淚瓦斯時隔多年又重現香港（引起市民巨大的道德震驚和憤怒），引發大規模都市佔領行動，是香港社運軌跡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歧點。其後，雨傘運動分裂為金鐘大本營的「和理非」與勇武派。勇武派更重視直接行動和肢體衝突等較為激進的抗議方式，鬆動了既有的抗議腳本（反對組織先於香港警方協調遊行路線或集會空間，以及抗議者的身體行為），是為「運動」意義的重新想像過程。2019 年爆發的流水革命，更呈現了香港前所未有的催淚瓦斯施放數量和民眾大規模參與的社會運動，旨在維護都市自治和表達廣泛的民主訴求 (Cheung et al 2022)。城市面臨前所未有得政治矛盾，而香港政府威權化的警察鎮壓，以及中港邊界模糊化為香港居民帶來的威脅感，也充斥著反抗中港政權的都市氛圍。催淚瓦斯重現都市街頭，更體現了這種殖民性延續的例外常態 (remains of coloniality) (Wall 2020)。流水革命期間，群眾和居民

暴露在毒氣的時間長度和空間廣度，遠遠高於此前的案件 — 毒氣遍佈十八區，警方施放超過 16,000 枚催淚彈，為史上最多。其中，身體動作、移動與都市量體的跨尺度大氣/氛圍政治，也激發了「運動」意義的變化：「運動」不應只被視為解釋社會的概念模型，而是具有實質意義。流水革命中和理非與勇武的路線結合，展現了其「上善若水」原則的戰術意義 — 我們可從中看見都市的呼吸身體、物質性、移動中介、場域和地勢的現身，如何促成或阻礙警治者和抗爭者的行動能力。在更長時段的時間幅度，本文也將指出大氣警戒或受到病毒擾動的空氣，會引起持久和複雜的風化效應，從多個層面上轉化都市環境與（寓居其中的）身體、國家與民眾之政治關係，以及社會運動中抗議者之間的連接能力。



表（一）：香港大氣警戒與社會運動/動盪時序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華僑日報 1991-02-28；羅淑敏 2010；蘋果日報 2013-11-16；香港舊照片 2014-10-14；端傳媒 2020-07-27）



Tear Gas Trials	"Operation Crusoe" in Malaya (1953), CN & CS trials in Britain (1950s & 60s)
Tear Gas Used	Aden (1962, 1963), Bahamas, Basutoland (1960, 1961),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1963), Bermuda (1965), British Guiana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British Honduras (1961), Fiji (1965), Hong Kong (1964, 1965, 1966, 1967), Mauritius (1961, 1963, 1964), St Lucia (1963), Swaziland (1962, 1963, 1964, 1965)

表（二）：大英帝國各地催淚瓦斯實驗及使用狀況
（作者繪製，資料來自 Mankoo 2019；Feigenbaum 2017）

2.5. 研究方法

本研究建基於作者於 2019 年身處香港流水革命中的具身經驗，並且使用了混合的質性方法，主要為抗爭案件目錄 (event catalogue)、多種媒體資料的內容、論述和語言分析，輔以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選用這些研究方法的目的，在於從相對宏觀及微觀的角度，理解社會運動如何改變其參與者的都市移動性、具身的空間知識及感官體驗，以及置身激烈都市衝突中的人與物品及環境關係。這些經驗資料有助我回應上一章闡述的理論思辨，橋接並分析「運動」及「風化」的社會及物理意義。

在進入各項研究方法的討論之前，我先交代自己作為研究者的位置性，以及與流水革命的關係。筆者出生並成長於香港，2019 年 6 月，當流水革命爆發的時候，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政治學位。適逢學期完結，我和系上許多同學都見證著逃犯條例的推行和爭議過程。其後在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暑假，我亦參與在一位香港大學教授的研究團隊當中，協助他進行民族誌研究的田野調查（包括在街頭招募受訪者和跟進訪談，瞭解不同類型抗議者的身份認同、政治理念、行動實踐、現地和網絡連結方式）。這些從參與社會運動中觀察、對話和同行的經驗，漸漸讓我培養了一種切近「運動者」的思考角度。2019 年 10 月，我作為政治系的交換學生遠赴英國華威大學交流，因此只能從較遠距離（和半日的時差）繼續追蹤流水革命的事態發展（例如是在 11 月中旬每天黏著電腦收看「中大保衛戰」的網絡直播），但也在倫敦、伯明翰等地觀察到許多海外撐港遊行和地區港人網絡的出現。

2020 年 3 月，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席捲歐洲，而且擔心英國當地的醫療量能不足以應付越發致命且迅速蔓延的病毒感染，我和其他香港留學生一樣，選擇臨時返回原居地。那時候香港的流水革命也因社區感染個案上升，民眾普遍隔離在家而陷入停滯狀態，同年 6 月，我在香港見證了港區國安法的訂立和城市的轉變。在接下來一年間，我完成了大學學位（當中大部分時間因數波疫情反覆而需要線上上課），其後前往台灣修讀地理系研究所。抵達台灣是我的人生和學業轉折點。由於國安法限制和政府持續打壓公民社會，許多流水革命和敏感政治議題的出版、藝術展覽和學術交流，都漸漸遷移到台灣進行，因此我在臺北仍然接觸到許多與 2019 年運動和香港議題的活動。在臺北求學期間，我認識了一些在台

灣流亡、重建生活、持續抗議，或只是因各種原因（例如旅游、志工活動、工作、觀察選舉）短暫跨域來台的流水革命參與者，並有幸與這些流離在外的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扶持、交流意見，訪談他們各自的經驗與生命歷程。至於在學院裏，除了從實務上參與了流水革命抗議事件目錄的編碼工作，我嘗試從人文地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人類學等跨領域的修課過程中重新反思流水革命的意義，也期望反過來通過流水革命這一關鍵的政治事件的啟發，推進人文學科對於「運動」的想象。

對筆者而言，這篇碩士論文是一份充滿生命力和情動力的文件，凝結了許多來源於自身經驗和記憶的抽象思考、在異地工作的勞動成果、從各處偶遇和爬梳的文獻資料，以及與許多流水革命親歷者相遇而生的對話。同時，在漫溢恐懼、創傷、壓力、限制和挫折的「後運動」時代中，重新閱讀、訪談和書寫有關流水革命的事跡，無論是對於受訪者及研究者自身而言，都充滿了認知上、情感上和倫理上的挑戰。記得來台求學，努力適應生活的第一年，我甚至有意識地阻隔香港的政治新聞和資訊，想要減低自己受到資訊觸動的情緒影響和持續出現的挫敗感、罪疚感和無力感。經過一段時間在台灣安頓，我慢慢發現「研究者」（或人類學意義上「田野工作者」）這一位置（既需要有理論和文獻閱讀的支持，也需要有從多個層面和視角上進行分析的社會學想象），其實能夠持續地幫助我（從一個我感到比較安適的距離）反思流水革命對我自身、我所身處的周遭社群和更廣泛社會的影響，甚而是讓我在知識上和情感上連結其他時空的抗議者。與此同時，我認為從參與者的視角研究社會運動的知識開拓過程，也是讓人得以召喚、安撫和轉化此前被壓抑的複雜情緒，重新與世界構築關係的過程。

接下來，我將簡略介紹本研究各項收集資料的方法和使用狀況。

1) 抗議案件目錄

抗爭案件目錄的數據（參見圖（一））²，主要是由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團隊，從流水革命抗議者匿名創建的網絡開源新聞資料庫「聞庫」(collected.news)上擷取資訊及重新編碼，再進行數據統計。案件依時間順序(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排列，對應流水革命在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中開展，以及在隔年六月港區國安法立法中衰落的歷時過程。這些案件數據依照研究團隊的分類方式，呈現了每一個抗爭案件當中，這些群眾的規模、抗議的目的、手法、風格；參與者的身分、組織及發生的地理位置；官方回應、警察有否使用鎮壓武器，等等。在截取資訊和進行編碼之後，研究團隊會從不同面向（包括抗議事件數量、和平/暴力分類、周末/平日案件分佈、抗議手法分類、新手法出現數量和時期、案發地點和地區分佈、被捕人數）進行統計分析。這樣進行計算和製圖，主要是依據目錄使用者自身的主題和研究取向。

就本文而言，我主要在第四章參考了統計中的「抗議事件數量」與「和平/暴力分類」的數據，以描述流水革命大致處於和平抗議的時期。我以「身體美學集群」分類並統計了抗議手法數據，並且從抗議案件目錄所記載的資料來源鏈接追蹤、梳理相關的報道，釐清這些手法出現的時空背景、目的和發起團體等資訊，進而詳實地描繪悼念、歌唱等抗議曲目於流水革命中湧現和演變的過程。至於在有關新冠肺炎如何影響流水革命的章節，目錄也提供了除抗議案件外的「運動相關的眾籌活動」、「聲明意見書」、「官方回應」、「保守派行動」和「香港社會大事記」等類別的資料，幫助我整理其他行動者的觀點、論述、行為和補充抗議案件的歷史與社會脈絡等背景資訊。除此之外，由於抗議案件目錄只收集到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的報道內容，它也可以作為一個時間上的參照點，讓我轉而通過其他渠道（包括參考二手文獻資料和從網絡查找香港、台灣、加拿大等地一些并未下架的媒體報道）獲取更多有關該議題的資料，以此加強章節的論述厚度。

² 本研究已獲得授權，使用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團隊創建的「香港反送中案件登錄」資料庫。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Grant Research Project (no. 110-2410-H-002-231-MY2)

（因受訪者記憶模糊而散失），或是成為訪談中引起對話的參照點、觸發點和比較點。另外，在處理「運動」的身體動作和流水革命參與者與現地物品的親密聯結，從不熟悉到逐漸熟悉激進抗議手法（及其地勢）的時候，我閱讀並援引了香港民間歷史學者楊威利修（筆名）著述的《香港秘密行動》（2021）。楊氏的歷史書寫通過訪談流亡台灣的香港本土派和勇武抗議者，詳實地交代了許多此前不為人知的勇武派活動狀況和抗議者的生命故事。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從一些提供實時地圖和抗爭情報的 Telegram 網路通訊頻道，特別是有約 66,000 追蹤者的「氣象巴打」，下載通訊內容進行分類和分析，包括不同種類的「民眾防護相關 情報(地圖)」、抗爭日程地理文宣、休息空間地圖、哨兵資訊、警方武器警示貼圖等等，了解社會運動當中民眾自發產生的地理再現和圖資，也追蹤了運動開展和升級期間，都市作為變動的「氣象」、「地勢」等環境樣貌。

至於在第四章有關流水革命如何與催淚瓦斯、新冠肺炎和都是環境共同風化的描述中，我尤其受到了香港小說家韓麗珠的紀實文學《半蝕》和獨立記者譚惠芸的報導選集《天愈黑，星愈亮：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所觸動，並嘗試從結合我所找到的（香港不同媒體的）報道和專題故事（例如明周文化在 2020 年 12 月製作的《催淚煙後遺》網上特輯、匿名記者團隊於同一時期出版的《口罩下的香港人》等著作），以大氣/氛圍的分析框架進一步詮釋抗議事件目錄所呈現的運動變化軌跡。

3) 半結構訪談

除了以上在主題上較為分散的媒體資料以外，筆者也對流水革命的參與者進行半結構的訪談，務求以融貫的方式了解個體參與運動的生命故事，其中的身體感和空間知識，以及投身「運動」（後）如何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及移動習慣。

具體的訪談大綱，請參見附錄（一）。這些訪談資料可以幫助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抗議者於運動中的身分位置，其移動性的戰術考量及空間知識，以及如何創建及使用抗議物質等較為實作的問題。本文也注意到在抗議事件結束以後，進行訪談的限制，即受訪者的記憶可能會模糊（或是受到其它資訊混合），從而影響到他們如何論述自己的歷史經驗。有關受訪者對於參與運動或特殊事件的記憶，對此，我會與抗爭案件目錄的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確認該項敘述所指涉的時間點。不過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記憶的模糊性，在

某些情況下也能夠打開讓對話者之間互相釐清、進行經驗比較和對於可能性發掘的空間（例如根據受訪者的回想，我會根據我對於當時事件或局勢的認識進行追問，「如果你身處這種或那種情況，你會怎麼做？你覺得以前的你跟現在的反應/行動會不會有所不同？」）有時候，一些受訪者提到自己在當下的跨域生活處境或在閒聊時，亦會突然跳接到一些零碎的運動記憶和感受，因此研究者往往不會只是跟從訪談大綱設定的問題路線和時間框架收集資料，而是需要來回和循環地，從（具有非線性時間性特質的）受訪者記憶的發生（occurrence）及其言語表達當中/之間，重新拼湊和組織受訪者的參與歷程和經驗。

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我主要是透過滾雪球（snowballing）的方式，從香港既有的、在台灣新建立的私人與社交網絡，招募曾參與香港流水革命（反送中運動）的受訪者。截至目前（2024年12月），筆者總共訪談了17位香港流水革命參與者，性別認同包括11男性及6位女性。受訪者主要是以支持運動訴求的青年（20-25歲）為主（儘管個人對於這些訴求的理解可能並非一致），但也包括一位中年人受訪者（55-60歲）和一位老年人受訪者（60-65歲）。在運動位置性方面，我的訪談也盡可能涵蓋多樣化的運動身分認同和位置，例如是和理非、前線勇武、區議員競選者、學生組織者，等等。但必須留意的是，這些身分位置並不是給定的，而是隨時流動的轉化過程（參見附錄一的訪談大綱）。至於受訪者的階級、性別認同、或者是其它社會背景因素有否影響運動參與者對於上述的身分位置、身體感及移動性的理解，則有待訪談資料的進一步分析。這些訪談主要以廣東話為主，並把錄音轉錄為繁體中文的書面語（特定的表達方式和詞彙則會在句子後保留原文）。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和安全，任何可供辨識的個人資訊皆被隱去，其真實名字以代號或化名取代。

在進行訪談的過程中，「在台港人學生」的特殊身份和（來回跨域往返香港、台灣的）社會位置，也讓我對於本研究需要持續注意和面對的政治壓力（就如無形卻具有重量的大氣般包覆）有所反思。就算身處享有言論自由的台灣，無論是我在台北日常交往和接觸，或是偶有聯絡，仍然留在香港生活的港人，談論流水革命和當下的政治處境都遠非易事，對話者經常面對著日常的懷疑、安全憂慮和自我審查的困境。就此而言，本文的收集資料和寫作過程，往往需要仰賴在地的社會網絡和關係，提供讓研究者和受訪者都感到安心和放鬆，能夠彼此信任、傾聽和對話的空間。這讓我回想起承載我日常學習和工作的研

究室、宿舍房間、大學圖書館、參與研討課和研討會的課室，相約訪談的巷弄咖啡館、多次造訪的臺北朋友客廳，尋常的越洋通話或視訊連線，以及跟其中一些受訪者一同在台灣各地旅行的日子。在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時間節奏方面，遭遇合適文獻和訪談的機遇，往往需要筆者漫長的耐心等待（例如是流散時代香港人於世界各地出版的口述歷史和重新整理的深度報道選集）、或在與潛在的受訪者相處時，把握突然發生的契機，鼓起勇氣詢問（或面對當下被拒絕的不安、尷尬）。

在後國安法的年代，訴說和書寫流水革命的故事皆難以一蹴而就。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面對（官方和非官方的）審查、噤聲和（本地與跨境）鎮壓的疑慮。身處威權的氛圍中，「可不可以開口訴說」、「能夠訴說什麼」和「如何訴說」自己與他人在以前或現在的政治參與，往往涉及複雜的考量。在這些問題裏面，自我揭露（例如筆者在上述簡介自己的文字）往往與安全風險衡量、照護（潛在受影響的自我和他人）、情感狀態這些處於變動的條件緊密糾纏，而研究者的任務是盡可能覺察自己和受訪者的種種疑慮，對採訪的形式和時間安排保持開放性與耐心。駐留台灣的四年間，我深切體會到「等待」的時間在收集資料（尤其是訪談資料）上的重要性。例如是跟在台港人互相認識的時候，我們往往未必可以迅速瞭解到對方的生命歷史或對於敏感話題的觀點（或許是出於一般性的防備，或許是對於個人情報泄漏的警惕）。只有在找到大家有所連結（一些感覺到“we connect”）的時刻（或許是意識到一位共同朋友，曾經共同身處的空間，有所感觸的物件、媒體、事件，等等），才會比較放下心防地交談和表達觀點（相反而言，在一個港人聚會的場合中，當一個人毫無保留地暢談自己的政治參與和觀點時，我的其中一位受訪者曾經對此表達過疑慮，擔心這人是否「粗心大意」或「別有用心」）。在跟我的受訪者互動和對話時，身處我們彼此都感到安全放鬆的環境，能讓訪談更為順暢地進行。

當然，這種包裹和觸發對話的「舒適感」并非自然而然，而是涉及到流動的主體狀態和具體的歷史社會脈絡。舉一個例子，當我詢問一位前綫勇武受訪者希望約在哪個地方碰面時，他選擇了一家鄰近臺大醫院，頗為喧鬧的咖啡館。後來我到達後發現，除了是因為這個位置便捷受訪者從別的縣市過來以外，也是因為不同於西門、中山等香港遊客常去的咖啡店，店裏的顧客基本上都是在地居民（而且他已經來過好幾次，認識老闆，也較收悉環境）。不同於一些維持安靜氛圍的臺北咖啡店，這裏顧客（用華語）放鬆談話的聲音，包圍並覆蓋了我們在角落小聲用粵語交談的聲音（而且我們也預期其他顧客聽不懂）。在

公共空間進行敏感議題訪談的場合中，語言的界線在此起著營造私密感的作用，讓訪談者和受訪者能夠專注地進入回想的時空當中（而非把注意力放在當下的警戒，防備旁人或「隔牆有耳」的疑慮）。

除此之外，我作為研究者獲得訪談機會的時間，往往也與受訪者離開香港，短暫或長期駐留外國的時間重疊。相比我在香港跟朋友談到流水革命時的「片段式回想」（受訪者往往只是迂迴隱晦地表達或指向了某一地點發生過的事情），我在台灣接觸到的受訪者，經過一段時間互相熟悉和日常相處，往往較願意較完整地跟我分享自己的社會運動參與歷程（如果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敘述可能會對還身在香港的人有潛在影響的話，則可能會拒絕揭露和要求我不要記錄）。其中一些受訪者是我在一些在臺港人社群的活動或日常聚會中認識的台灣居民，也有一些是從舊有關係（比如說香港的同學）中延伸的相遇或是因特定事件（例如觀察台灣總統選舉、參與志工、民間交流活動、旅遊）和身處特定空間（台灣的港人黃色店家、流水革命香港藝術展覽、社會運動的街頭現場、學術研討會）而結識。就此而言，本文使用的大氣/氛圍視角去詮釋社會運動的歷時動態變化，其實也適合用以描述研究者連接、追蹤從社運回歸日常生活（或持續進行政治工作）的參與者、流亡者和倖存者，在不確定的地緣局勢與高壓政治氣候中導航的行走姿態。每一次與受訪者一起回憶和對話，或許也是在風暴的狂嚎中持續溝通，彼此觸動，培養共同呼吸的嘗試。在談論流水革命這一左右了香港命運的關鍵事件時，我們也會在言談間一起關心到當下的地緣處境，一起思考和推想未來的個人與社群，以及香港、台灣和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牽引之下，持續發生的轉變。

第三章 流水革命的身體動作及移動性政治



3.1. 同呼吸：穿行於香港流水革命的都市氛圍

香港流水革命當中充滿著各種與身體動作及移動方式相關的「運動」語言，例如是「一起走」、「齊上齊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都成為了這次全民廣泛參與社會運動的主要口號之一。本章將呈現這些情動紐帶和抗議腳本，如何通過群眾的身體動作和戰略移動，湧現於共同遭遇大氣/氛圍警戒的抗議經驗。選擇關注都市衝突的關鍵事件和場所，可以讓我們比較聚焦和清楚地看見衝突氛圍的聚集，從各種人與物質的出現和消失中，閱讀其都市地緣政治意涵 (Fregonese 2017)。對此，本文主要以「612」的中信大廈圍困這一個案件，以及簡介圍困事件期後的情勢變化，來說明被大氣/氛圍警治攻擊和波及的群眾，如何藉由身體與移動意義上的「運動」逃避毒氣和警察的空間封鎖，形成不同的抗議曲目（包括使用物質、群眾移動策略和文宣論述）爭取呼吸空間，壯大抗議聲勢。正如我們在以下章節將會看到那樣，各種差異但具有連續性的(抗議或警治)情動氛圍，隨著社會運動現場中不同行動者、物品、圖像、聲音、氣味與其他信息的出現、消失與流動循環，而被展演或改變。抗議群眾通過遊走個穿越於處於衝突狀態的城市，進而感受到異樣的大氣/氛圍，它們又反過來形塑其行動能力，中介著「運動」的自我認知與文化表達方式。

另一方面，當都市既有公共秩序持續受到挑戰，並且抗議者能夠克服催淚瓦斯的大氣警治時，政府及警察亦會以其它方式重構其警治配置，試圖對抗議移動性構成阻礙或更具風險，例如於「721」及「831」事件所呈現那樣。隨著流水革命開展，香港市民生活中熟悉的都市模樣在運動衝突升級中逐漸剝離，成為警戒或示威暴力頻頻發生的場所，一種視都市環境為地勢的觀點也湧現出來，成為遊走其中的各行動者(運動家)需要考慮的重要面向。尤其是，身處不同位置，透過網路連結的抗議者，會使用生產一系列具身化的空間知識，協助他們抵達、觀察、遊走和脫離行動現場，確保安全與降低被捕的風險。從一些訪談資料以及各種都市「大氣/氛圍書寫」(atmospheric writings)的文本，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這些基於沈浸於衝突大氣/氛圍的運動身體感和衝突感知，如何滲透於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場域、感官和身體當中，形成具有時空延展效應的移動與抵抗實踐。



3.2. 六一二事件：與催淚瓦斯及警治氛圍相遇

催淚瓦斯可能是「氣候緊急狀態的典型媒介」。它的部署是一種戰術性的微氣候操控方式。催淚瓦斯的出現標誌著政治和生態的崩潰，並且反映了「威權大氣」和「軍事化的生態系統」的交織。

Jerry Zee, *Continent in Dust* (2022: 166)

正如空氣能夠被調節為正面、舒適的品質，它也可能被逆轉為權力對身體、群體實施宰制、鎮壓和警治的媒介。這呼應了哲學家 Peter Sloterdijk (2009) 所言的「大氣恐怖主義」(atmosterrorism)。近年來，越來越多政府和警察，選擇在社會運動等情境中施放催淚瓦斯，這種「非致命」武器經常被用作控制和管理(警方認為「擾亂社會」的)人群移動性。在社會運動中，催淚瓦斯連同城市監控網絡的電子信號，成為充斥著整個城市大氣的氣候媒體(climatic media)，讓國家有能力應對公眾秩序危機。在城市大氣飄動的化學氣霧作為一種陰險的空調形式，可以改變當地大氣(local atmosphere)的化學成分，並充當社會調節的工具(instrument of social conditioning) (Furuhata 2022: 133)。

本節主要探討當社會運動爆發的都市環境，如何被國家化學暴力(早期主要表現為催淚瓦斯攻擊)改變。從抗議現場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來看催淚瓦斯，Furuhata (2022) 指出，這種使用有毒和刺激性氣體控制大氣/氛圍的暴力手段，不僅是沉浸式的，而且具有訊號交流的作用。警方使用這種單向傳播媒介攻擊的對象的呼吸道(發出政治信號)，意圖打破抗議的意願和意志，就猶如在戰爭脈絡下，空軍轟炸同樣是向敵人發送信息(迫使他們投降)的交流行為(Furuhata 2022: 136)。在香港流水革命的示威現場，警方會舉出不同顏色和寫有警告字眼的旗幟，並使用擴音器做在發放又頭警告。其中，警察在示威前線施放催淚瓦斯，(理論上)會先舉起黑旗，警告「示威者勿衝擊防線及即時散去，如示威者使用武力，警方將會發射催淚彈驅散及拘捕」(香港 01 2020-07-01) (參見圖(二))。在其預想中，民眾在街道上看到的看到相應旗幟出現以後，必須立刻做出應對，如果示威者或市民不聽從警方指示，警察就會使用武力及採取拘捕行動。同時，警方為了驅趕人群而施放

催淚瓦斯，會大幅改變抗議空間中群眾的身體動作、移動實作和集體情緒。當抗議者遭遇毒氣(國家化學暴力)，其身體會與這些化學元素糾纏起來，也產生了若干情動影響，包括民眾的社會身分和位置會因此而遷移，以及他們的身體需要運動起來——群眾會逃逸，或是發展出流動的照護和抵抗實踐，進而溢出此前框定的抗議空間。

在流水革命的 612 事件中，數萬名示威者於金鐘包圍立法會，阻止逃犯條例修訂案二讀。當天下午，警方武力清場，將催淚彈射向(有申請警察「不反對通知書」的)和平集會場地。當催淚彈自槍口射出，毒氣煙霧瀰漫首先會在抗議空間營造一種恐懼氛圍和圍困感。對於抗議的身體而言，催淚瓦斯不僅會造成呼吸系統損傷，也會構成其他生理及心理損傷的危險反饋循環。事實上，警治和鎮壓不總是需要通過警察與示威者身體的碰撞和觸碰來施行，不少示威者(尤其是站在後方的「和理非」)甚至可能沒有直接看見警察及其警告信息：「直到 3 時多，望向立法會方向，知道戰友有所行動，前面有人叫我們向演藝[大學] 方向退後，但由於警察就站在分域碼頭街，我們其實也不能退得太後。我們一直看著立法會那一邊，但其實什麼都看不見，只是一直傳來一些需要物資的消息，『長遮! 眼罩! 頭盔! 生理鹽水! 水! 哮喘藥!.....』我們就一直傳過去。過了一會，開始聽到前面有發放催淚彈的聲音，然後望到『煲底』[金鐘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示威區] 的白煙，繼而是看見一枚一枚催淚彈在添美道的上空飛過。突然間，有發射催淚彈的聲音從我們後方傳來! 根本沒有人會預料有這一著。」(中信圍困團隊 2020: 43-44)。然而，他們仍然會通過催淚瓦斯的大氣媒介，被毒氣包覆和沈浸其中，深入肺腑地 (viscerally) 感受到鎮壓武器的威力。當時一位和平示威者(化名「和牛」) 第一次吸入催淚瓦斯，被白色煙霧籠罩時，她「雙眼酸澀得不能睜開。閉氣仍覺得非常刺鼻。專用口呼吸，喉嚨又好似被灼傷的感覺。用回鼻又呼吸不到，令(她)極度惶恐」(中信圍困團隊 2020: 77)。

毒氣包覆示威者群眾，激發皮膚的刺痛，帶來心裡震攝、痛苦等作用，成為國家驅散群眾，剝奪其身體駐留空間和發聲抗議的力氣、務求重奪被群眾「非法」佔領的空間 (de Larrinaga 2016: 16)。作為一種隨風飄蕩的化學物質，催淚瓦斯包覆著目標人群，同時催促著他們離開原來的位置——移動起來 (move)！甚至乎，一位因呼吸被奪走，被迫隨著人潮逃跑的示威者如此描述：「催淚彈的氣味簡直就像有生命般，追著我們跑! 後面不斷有人叫大家繼續走..... 而催淚彈的氣味繼續尾隨我們，有人咳嗽、乾吐、洗眼睛，就只有一件事大家沒做過，就是反抗! 我們都是戰場上的難民，毫無反抗之力，只能拼命逃跑」(中

信圍困團隊 2020: 111)。這是政府警治配置所操作元素移動性的預設效果，試圖改變民眾都市移動場域的化學品質，引導人群移動 — 驅使他們散開，或趕到特定空間，進而讓抓捕小隊 (snatch team) 擒拿目標人群，至於其他逃脫的人群則被迫尋找可呼吸的喘息空間。



圖（二）：612 事件中香港警方警告施放催淚瓦斯的黑旗
（香港 01，2020-06-23）

不僅如此，催淚瓦斯也與示威當地的量體地形聯動起來，形成多個令人窒息，「雖生若死」的圍困領域（參見圖（三））。根據一位在場參與示威的大學生(化名微塵)證詞，「前面添美道仍然不斷有戰友逃生，後面的警方又開始向我們推進和發射催淚彈，那時候我們根本是被前後 夾攻！走進中信大廈就是唯一一個可以離開的方法！但由於本來 站在龍匯道人數眾多，而且中信大廈只有一邊門有開啓讓我們進去，同時警方不停向我們這邊擲了很多枚催淚彈，我們只能夠用濕毛巾盡量蓋住口鼻，在眼睛半張開的情況之下，扶著身邊的戰友摸路，希望能進入中信大廈。我們已設法離開，但還是看見幾枚催淚彈正正落在我們中間，令一帶空氣都有濃濃的氣味。可是，由於根本無路可走，很擠逼又沒有位置可以移動，在外未能進入中信大廈的我們都只能夠「硬食」催淚彈，附近所有人都感到不適，所有人都很無助，我們只能哭泣」(中信圍困團隊 2020: 43)。由於缺乏風把煙霧吹走，毒氣會不均衡地集中在密閉和圍封的空間（參見圖（四））。對於被毒氣轟炸的抗議者而

言，催淚瓦斯的刺激顆粒進入身體時，警治震攝的效果可以具有時空延展的影響。另一位因躲避催淚瓦斯而逃進中信大廈的示威者(化名明日香)，回顧了她穿越毒氣元素環境期間，呼吸、求生和逃生經驗：「突然，催淚瓦斯射向[民陣]大台，就在我跟丈夫不遠的位置。那是空氣充滿化學物，根本無法呼吸，我好害怕，怕發生人踩人。自己對聲音、氣味、能量很敏感，周遭充滿恐懼：發射催淚彈的聲音、人們呼喊的聲音、大力敲打玻璃的聲音，還有化學的氣味……進入了中信大廈內，沒有很安全，因為整棟大廈都充斥著催淚煙霧，我們不斷往上走，嘗試看看空氣有沒有好點——是沒有的！呼吸越來越困難，而且很痛。看著周邊的人，大家的痛苦、無助的表情，深深印在了自己的腦海裏，我跟丈夫一直走來走去，嘗試尋找出口……隔天，6月13日，發燒。6月16日，全身出風疹。中信大廈一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陰影。到人多的地方，當自己被人群包圍時，會害怕有催淚彈出現；於人多的商場或室內時，會怕被困；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在封閉的空間內，如浴室，也出現恐懼感，隨之崩潰。直到現在……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好起來」(中信圍困團隊 2020: 74)。這顯示，催淚瓦斯不僅在當下製造出圍困的恐怖氛圍，而且會黏著在她的身體之上，形成從當下持續到未來，長時段的生理和情緒影響。



圖(三)：警方「反包圍」示威者，並施放催淚瓦斯
(now新聞，2020-06-30)



圖（四）：警方在中信大廈外釋放催淚瓦斯（左），群眾爭相逃入大樓（右）
（香港 01，2019-06-15）

然而，國家的警戒技術企圖震懾群眾，限制群眾聚集，身處社會運動的群眾卻未必會產生政府或警察預想的情動反應。例如，棉花糖(化名)當時在 612 事件中，經過反復實踐著示威者在現場分工的任務，經過警方突然施放催淚瓦斯的洗禮，反而會感受到一種對執法者的不信任感。當她遭遇 612 的衝突氛圍裏(猶如進入了一座新的城市)，她就與其他一同佔領和遊走於都市空間的抗議者，形成一種緊密的情感連結，獲得了猶如「身在戰場的覺醒」，在移動的過程中感知情勢：「一路上看到警方重重佈防，警車數目不尋常的多，大隊警察也已手持盾牌列陣，甚至有速龍小隊到場抵達龍匯道中信大廈外，在望向「煲底」方向，穿著簡單裝備的前綫少年們正面臨警力的包圍，幾道戰線已成形。那一刻我開始進入戒備模式，因為我感覺到這裏是個戰場……我們決定繞到夏慤道作後方支援，在人群中不停聽到「煲底」方向傳來要求各種物資的呼叫聲，於是立即幫忙大叫或用手勢，將要求傳送至後面的物質站。「保鮮紙!口罩!索帶[用作製造障礙物阻止警方推進]!長遮[遮擋警方視線和飄向示威者的催淚煙]!」長遮很快就沒有了，聽到有人高聲呼叫需要生理鹽水甚至哮喘藥，雖然沒親眼看到前線的慘烈，但我不能停止想象，孩子們正受到怎樣的挨打受苦「食」催淚彈。有很多天橋上圍觀的路人開始拋下自己的雨傘，示威者立即拾起交到前綫，這一幕令我頗為激動——始終大家都是香港人。一個滿身大汗聲音嘶啞的少年走過來大叫：「大家要守住戰綫後方邊緣!」我們除了不斷點頭和應，也不知下一步應該如何是好……大概 8 時左右，只是站著偶然叫口號的我們，驚見警隊向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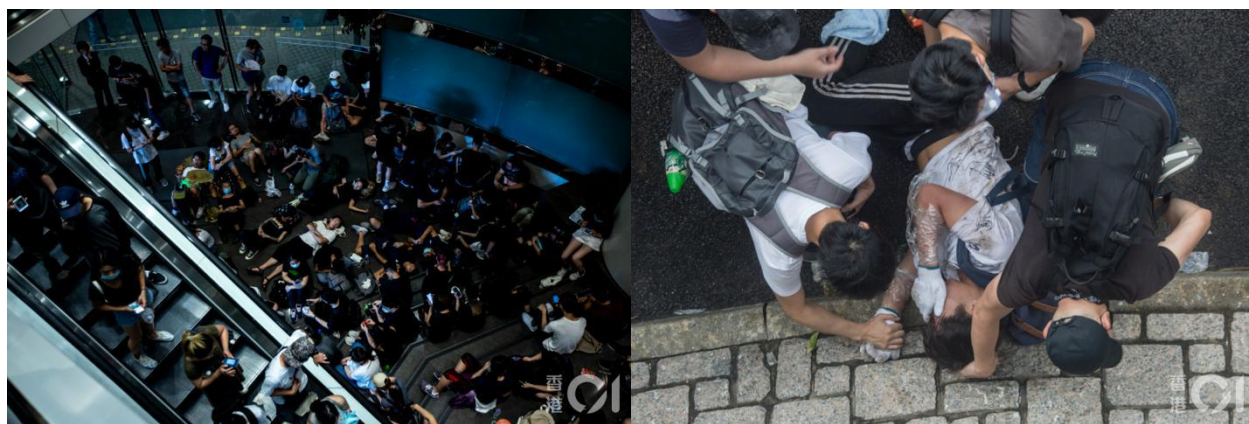
推進並將黑旗展示一秒，然後我「食了」人生第一枚催淚彈。轉身逃跑之際驚恐交集－原來我甚麼也沒有做你也要趕絕我。從此以後我對警隊的信任已當然無存，內心一直躁動至今」(中信圍困團隊 2020: 130；解釋由筆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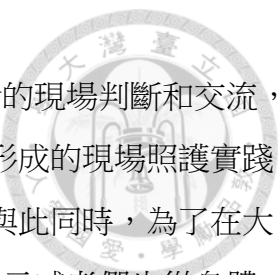
圖（五）：612 金鐘現場，被催淚瓦斯淹沒的急救站
（香港 01，2019-06-23）

在抗爭現場的混亂狀況中，因身體和環境差異，催淚瓦斯會對抗議者做成的傷害具有不同程度和面向。而且，抗議者沈浸於毒氣中的情動反應，也遠非是單一的。催淚瓦斯不只是有它的預設效果－把群眾驅散，有時候它也促成了抵抗集群的聚合。特別是，有經驗的示威者會發揮其經驗和技能所長，感染和引導身邊其他示威者的行為－他們必須要學會在抗爭空間和瞬息萬變的時刻中打造團結，以不同的方式和實踐，讓自己適應處於敵對和衝突狀態的大氣/氛圍。同時，煙霧觸發了一些民眾改變其既有的社會－空間位置。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抗議者需要在運動現場，情勢瞬息萬變的當下回應警察和毒氣的侵襲，照護身邊同被警治大氣侵襲的身體。當時，儘管許多固定的醫療站已經被警察推進或催淚瓦斯淹沒（參見圖（五）），示威者們仍然會如水般在當刻流動傳送除氣物資和建立臨時的「去除毒氣基礎設施」(Leff 2021; 3-4)。根據一位身處中信大廈的社工(化名漆男)的證言，「大廈中有許多人需要清洗眼睛，相信大廈內所有人都很擔憂，不知警察會再有什

麼行動，但大家很快便團結起來，建立物資站，把哮喘藥 拋上二樓，照顧身旁的每一位香港人」(中信圍困團隊 2020: 88)。許多擁有醫療知識的專業人士，也在現場擔當了義務急救員的工作，負責治理、運送受傷的示威者和市民，同時也要及時顧及、回應和判斷示威事態的變化(例如警方隊形的突然推進)。至於現場一些沒有醫療專業知識和物資示威者，亦會即興地進行救援行動，或者互相以身體支撐和進行照護(參見圖(六))。例如，當時一位示威者(化名塵先生)憶述了他如何與其他示威者因毒氣傷害而糾纏在一起，使用身體(作為屏障)和醫療用品，幫傷者進行護理，並在危機關頭成功抗拒警察抓捕的經驗：「我發現我身後有幾個人正在圍著一個男人，為他急救。上前一看，原來是剛才在救護站看到的那個少年，但看來狀況沒比剛才好，所以別人把他抬了進來繼續護理。有人叫其他人別圍著她，讓他能呼吸更多新鮮空氣。可是，原來大家圍著他，是因為他連下體重要部位也中了催淚彈，準備要脫掉褲子清理，為免尷尬和不雅，才築起人牆來保護他。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期間，店鋪裏的人安靜了下來，每個人都不敢鬆懈，帶著口罩，每個人都露出了絕望、悲傷和略帶疲憊的眼神。過了不久，突然有一排防暴警察從行人天橋衝進了中信大廈，先是喝令一批留在大家樂店鋪門外的示威者從行人天橋往統一中心方向散去，再企圖強行進入大家樂。店鋪裏的人都顯得非常驚恐，每個人都站了起來，把店鋪的玻璃門頂住，高舉雙手齊聲向門外的防暴警察大叫：畜生！畜生！畜生！最後，防暴警察不知為何，真的沒衝進來，很快便撤退了。可是，站在玻璃大門前的衆人，一直都不敢坐下，繼續把大門守住，直到救護員到來，我們才敢把玻璃大門打開。」(中信圍困團隊 2020: 52)。



圖(六)：612 於中信大廈內外休息的抗議群眾圍著傷者，為他清理刺激性化合物
(香港 01, 2019-0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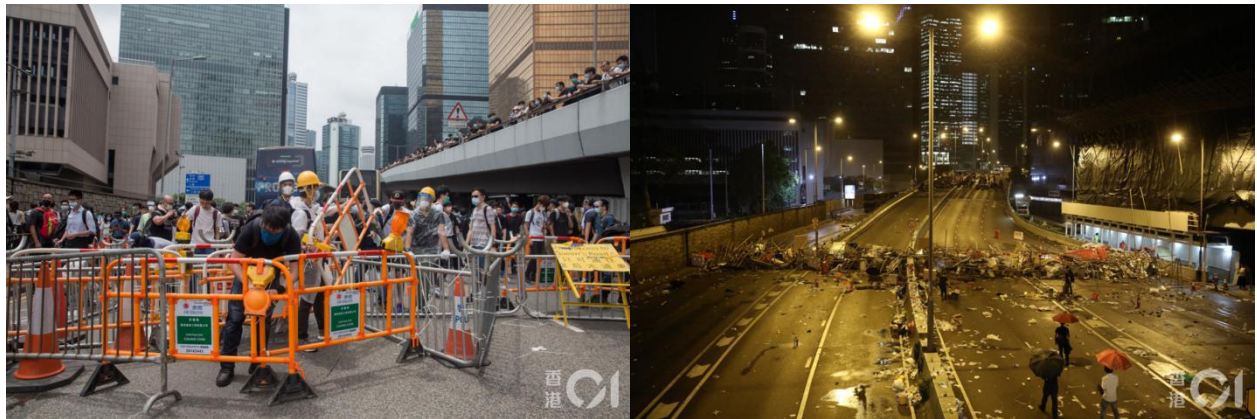
這顯示，警方施放的催淚瓦斯，也觸發了現場抗議群眾之間自發的現場判斷和交流，照護彼此和進行抵抗。群眾之間因暫時聚合(躲避毒氣和警方追捕)而形成的現場照護實踐，也形塑了示威者往後沉浸和移動於毒氣環境中的體驗和倫理關係。與此同時，為了在大氣警治和衝突氛圍下，確保自身和（鄰近）他人的移動性，流水革命的示威者們也從身體、物質性、移動性這些面向駕馭催淚瓦斯的影響，並且漸漸湧現出抵抗警戒大氣，轉變為抗議氛圍的產生過程，於社會「失序」當中形成社會運動自身的「秩序」。以下兩節將會深入探討這些隨著「運動」開展而發展起來的抗議物質，以及抗議者在都市中遊走(擊)的空間知識。

3.3. 共命運：拼裝反抗物質與召喚抗議氛圍

612 早上，在現場聽說「全世界要人」，人們開始架設 roadblock（路障）。當時還不知道，原來身邊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一個 roadblock，或者一樣「有用的物品」。例如垃圾桶、鐵馬，街邊的雜物，都可以很有用。那時候，我只是聽一些陌生人的「大哥哥大姊姊」（有經驗的示威者）說，原來三個鐵馬，加上幾條索帶（捆成三角形結構），就可以變為有用的路障。那時候我和朋友讀中四、中五，都沒有意識到我們即將要面臨，或者要親身體會的事情，會是這麼「強大」……我當時是在警察總部？（P 打開手機的 google map 指畫）在這裡，那些狗是在這條路（指著龍和道），roadblock 則在這個三角形的位置（指著龍和道和添華道交界），大家都是守在這裡。我記得行車天橋的底部可以直通「煲底」，警察最強的警車都在那邊，所以那天路一定很難離開，只有 roadblock 和示威者。然後添馬公園旁邊有條小路（地圖綠色的位置），我就在這個位置。前一點的地方，有立法會議員在跟警方溝通，所要預留一些位置給示威者通行。然後……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和知道有「勇武」（示威者）的存在。他們帶著黃色頭盔和眼罩，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欸，一個靜坐或遊行示威的活動，需要用到安全帽、眼罩、保鮮紙包著自己的手臂……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都是需要的。

在筆者與一名「前線勇武」的訪談 (2023-02-18) 當中，這位化名為 P 的示威者詳盡地描繪了不少抗議現場的情境。其中有許多抗爭經驗，都是他在述說著自己如何透過現地

的「實戰經驗」和平時的練習和準備，去製造或在現場拼湊出具有戰術意義的抵抗物品。P 首次於 612 當天目睹其他有經驗的前線示威者，如何利用塑膠索帶、鐵馬、垃圾桶等物品架設路障（參見圖（七））。因為當時的環境十分吵雜，或者是人們需要傾聽現地狀況，抗議現場也發展了各種身體動作和手勢，讓示威者之間不需要發聲而進行溝通。本節將會討論流水革命如何產生、匯聚多樣化和大量的抵抗物質（以及相應的身體動作和各式各樣、暴力與非暴力的抗議曲目緊密相關），並持續支持著示威者的「運動」。這些散佈於都市各處，看似平常無奇的物品，在社運情境中受到示威者挪用，轉譯其功能，變身為極具政治意義的抗議物質。它們既保護了他們的肉身，不受警察的直接或間接暴力影響（或者反過來主動攻擊對方），也確保了抗議者可以對群眾的移動性實施某個程度上的操作，協助抗議者達成其戰術目標（例如是透過癱瘓交通來向政府施加經濟壓力），或是去壯大、延續現場群眾的情緒和士氣。



圖（七）：612 前線示威者於現場挪用物品及組裝路障（左），
入夜示威者散去後遺留路面的路障（右）
（香港 01，2019-06-23）

面對國家化學暴力和警治於現場的各種展開方式，流水革命的示威者發展出多樣化的活動方式進行抵抗。隨著「運動」的蔓延和開展，許多日常移動的工具、健康物品和運動商品，都被參與者挪用和轉化為（在抗議現場）具有特定功能的「物質」。這些物質有些是透過海外的線上銷售網路採購（例如是頭盔、戰爭遊戲的防具和裝備、高規格的豬嘴、濾罐，等等），有些是市民平時可在百貨公司、運動商品店家、超級市場和藥房等地點購

買的商品，也有些物資是示威者可以在現場湊齊和組裝 (例如是鐵馬、垃圾桶、垃圾雜物、竹枝等建材)，或是透過「人鏈」的方式從四方八面傳送到隨時湧現的抗議前線。這些本來尋常無奇，互不相干的物品，卻因警察使用暴力鎮壓，以及抗議群眾持續地以身體和交通載具運送而再抗議現場匯聚起來。

612 港島流血衝突後，城市蔓延著一股緊繃的衝突氛圍。前線「運動」(不管是社會意義上開始物理意義上) 的示威者們開始帶備背包和各種護身物資，以應對催淚彈、胡椒水和未知、突發的街頭情勢。當沉浸持續一段時間後，有了「食彈」經驗的示威者，也開始學會更嚴密地使用保鮮紙、雨衣、防風防水外套、手套、運動冰袖、實驗室面罩、加過濾器或濾棉的防毒面罩 (俗稱豬嘴) 等拼裝而成的技術物，來包覆自己的身體、呼吸道和皮膚。這些包覆身體，應對國家化學暴力的資訊和運動知識，都在示威者 (可能透過 airdrop 在示威現場 和日常交通期間即時傳送) 和媒體之間廣泛流傳 (參見圖 (八))。



圖 (八)：612 後廣泛流傳的「運動」文宣：防護裝備及衣著須知 (沃草，2019)

從流水革命早期示威者的物品使用方式來看（完整列表請參見附錄二），這些隨身物品都與「運動」的兩個面向——身體動作和移動——密切相關，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運動」用品：第一類是在變化的環境中（風、溫度、濕度、毒性，等等）確保身體處於健康狀態，包括照護和清洗黏著皮膚之化學顆粒的醫療物資、以及維持身體恆溫、熱量的物品。第二類是在多變的都市環境，包括毒性的大氣和崎嶇平的地形中，確保示威群眾移動性的運動裝備和物品。這些用品可能是幫助示威者架設路障的工具，也可以是遮蓋和包覆身體的實驗室用品，讓抗議者能夠抵禦警治武器震攝，持續穿越催淚氣霧。其他的日常移動商品，例如是雨傘——多把雨傘組合起來，也可以遮擋警察、航拍機和監視鏡頭的視線；至於手機等連網電子設備，則可用幫助示威者在街頭定向、通訊和即時紀錄示威現場。

當然，在流水革命的抗議現場，總是會出現更多「戰略物資」。隨著社會運動爆發的時間推移和空間擴散，大氣和水的「元素性」也更為深入地鑲嵌在反送中「運動」的抗議文化和曲目當中，成為一種物質性和隱喻性的戰術想法（例如大氣就具有多義性，涵蓋煙霧的化學氣體、風向和數據情報等「包覆身體」的面向）。透過反復實踐、交流和試驗，示威者更熟練地即興地挪用、變換和拼裝城市空間裏的現成物品，進而克服、駕馭毒氣和躲避警察的圍堵，成為猶如「流水」般的都市游擊。正如人類學家 Jerry Zee (2022) 充滿詩意地評論現場所見，示威者的演化：

抗議戰術已經從試圖躲避或逃離催淚瓦斯轉變為應對警察氛圍的編排。抗議者借用李小龍的說法，鼓勵對方像水一樣：流動、硬化，既被動，又有力。在他們通過相位轉換的形式過程性對抗議主體性的想像中，抗議者也學會了操縱玷污開放空氣空間的有毒氣體的流動。2014 年為抗議者提供庇護的雨傘可以被集體舉起，以拋出戰術性的大氣架構，在充滿魅力的黃色烏龜殼中保護抗議者，形成對抗惡劣空氣的方陣。戴著防毒面具的示威者，變得像水一樣，學會了讓氣體流動和彙集，臨時編排了被玷污的大氣層來傷害他們。黑衣抗議者用市政交通錐筒迎接催淚彈，這些錐筒將容納他們的有毒載荷，直到它像科學展覽會上的火山一樣從錐筒的開口處噴出。海龜在這種不自由的空氣中游泳，他們的天空已經成為有毒的海洋。抗議和治安已經成為一種實驗性的氣氛。(Zee 2022: 169-170)

抗議者對於現地物品的挪用，轉化其意義及功能，是一種處境性的即興實作過程(improvisation)。這些物品不僅是只有防守、忍耐警治暴力的一面，也可以與一些更為積極的「反擊曲目」結合。例如，示威者在室外處理迎面而來的催淚瓦斯，要比在密閉的空間裡更容易操作。就其物質性而言，催淚瓦斯作為一種於空氣中飄動的氣態化學顆粒，其實際效果是不穩定的，它的燃燒過程可以被介入和遏制，其實際效果也需要考慮到城市裡的風向和城市地勢的變化——煙霧在開放環境中會比起封閉環境更快散去，風向改變則可能把催淚煙吹回警察隊伍。應對催淚瓦斯的抗議曲目還有：示威者會以水淋熄催淚彈，(試圖)令其無法加熱、粉末不能氣化(晴報 2019-06-20)，也極具創意地以羽球拍、網球拍等運動器具回擊警方的催淚彈(蘋果日報 2019-08-26)。面對遍佈都市角落的監視鏡頭(或者僅僅是「可能受到監控」的威脅感)，示威者運用雨傘和噴漆遮蔽遍佈城市角落(地鐵站、商場大廈、街頭)的監視錄影機，也把怒火和懷疑投射到政府與市面試驗推行的智慧燈柱之上(示威者「拉倒一條智慧燈柱，拆開內部零件，指其中藍芽傳送系統供應商與內地上海開發官方天網監控系統乃同一公司」)，又在燈柱的殘骸貼上「拒絕極權監控」、「抵抗暴政無罪」的標語(立場新聞 2019-08-24; 蘋果日報 2019-08-26)(參見圖(九))。「運動」緊密結合了身體動作與移動性的政治考慮——這一點見於上述示威者對於物品的使用與拼裝等事例。



圖(九)：反送中示威者創意地回應警方的催淚瓦斯攻擊和懷疑政府進行監控
(自由時報，2019-08-24；立場新聞，2019-08-24)

正如「be water」這一中心格言所示，參與流水革命的群眾極少是處於完全靜止的狀態。在抗議現場，一些熟練的示威者都會因應情勢需求，進行多種行動——盡量讓身體動起來，不要停止一個地方無所事事。對他們而言，抗爭行為的成效可以包含多個方面，例如是充當「哨兵」觀察警方部署、堵路、擋住監視鏡頭、清洗身體、跑動以逃離現場，等等——盡量讓身體不要靜止下來。在訪談中，前線勇武 P 告訴我，他覺得「be water」的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指持續的身體運動：「大家（示威者）去到那一個區，就會像水一樣，「set 完野」（做完行動）就走，「裝修」（破壞藍店或中資店家）完就撤，混入人群之中。還有就是，那些狗，（P 指著桌面上一點）比如在這一個位置，「和理非」在這邊，那麼後面沒有狗的時候，我們就在那邊 set road block [設置路障] 又好，「裝修」也好……「keep 住郁」（保持身體運動的狀態），不可以讓它停下來」（訪談，台北，2023-02-18）。對他而言，長時間處於靜止的狀態，是「運動」被圍困（無路可逃），或是抗爭缺乏效率（被批評為猶如「嘉年華」）的徵象。不過在某些時候，群眾處於靜止狀態，反而會符合示威者的戰術需求。例如，P 告訴我，當 9 月 1 日示威者要求「三罷」（罷課、罷工、罷市）的時候，他去了地鐵站阻止市民上班，堵塞人群的流動：

9 月 1 日開學，三罷的時候，那時候我沒有特別的行動，只是 keep 住 [不斷地] 去塞任何的地方。我覺得很廢 [很沒用]，那時候的自己。那時候就是塞住路口，大家都站到那裡。後面的人要去上班，就咒罵我們，但我們沒有理會。勇武派有 set road block，有些巴士停在路中間。之後是罷工、罷課、罷市，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去罷課，去合理化其他人罷工巴士，或者是去做「塞」的人，這樣他們才有原因，讓他們「合理化」自己罷工。

（你會如何堵塞地鐵交通？）例如我們以身體擋著車門不讓列車駛走，或者是用室內裝潢需要用到那些「填縫膠」，把入票機塞住。這種膠很有用，可以塞住任何東西。它本來是液體，擠出來塞住以後會固化……三罷行動就是，我見「勇武」就是去塞道路，我就只能做一些「街坊」也可以做到的事情。或

者是在現場咒罵警察啊，拖住大家的腳步。現場氣氛也很 peaceful，反正大家也不想上班吧，就只有少數人在罵 [示威者]]。(訪談，台北，2023-02-18)

就算是站著「比較後排」的位置時，P 也會盡力利用當時手頭上能夠獲取的物質 (示威者之間稱之為「魔法」)，服務於抗議現場當時的特殊戰術目標。有趣的是，這些常見於五金舖和超級市場，能夠迅速從液態 (可以佔據任何形狀的罅隙，也具有黏性，一時三刻難以清除) 轉變為固態 (柔軟而有彈性，成為它佔據空位的形狀) 的矽酮樹脂，也發揮了相似的政治效果 — 如同那些卡在月台與列車中間的示威者身體一樣，把目標的民眾人群黏合起來，操作移動性以拖延列車開駛的時間。

至於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運動物品」的政治意涵，就是流水革命裡的示威升級 (escalation) 與具身化 (embodiment) 的銜接關係 — 「勇武」需要透過身體動作和實作來傳達較為激進的政治信息，以及爭取其他示威者、民眾的情感支持或理解。從以下文宣 (參見圖 (十)) 所見，示威者覺得升級而進行「勇武抗爭」，可見於他/她的身體動作和(如何)使用何種抗議物質。圖中的女生，從靜坐抗議 (手持抗議的文字語句) 站起來 (手持雨傘，做遮擋的動作；穿校服也意味著未「走出」日常的社會身分界線)，到換上黑衣運動背包 (手持反過來的雨傘，可與警方進行「更近距離接觸」，也戴上又罩遮擋面容和防備毒氣)、裝備升級 (換上運動鞋子及裝束，在較前位置推動和架設路障，戴上頭盔防止子彈等硬物擊傷頭部)，一直到「最前線」的位置 (成為直面警察武器子彈的盾手，以及跳起來，向警方陣型及裝甲車投擲汽油彈、燃燒彈的勇武)，透過強度更大的「運動」，與不同物質糾纏起來，嘗試把抗議從「守勢」轉為「攻勢」。不過事實上，「火魔法」只是前線勇武各種應對警方推進的其中一項攻擊手段 (示威著使用暴力及的抗爭升級，並不表示他們和警察雙方達至武力上的平衡 — 遠非如此)。在現地與警察互相牽制的示威者，往往需要更為靈巧的身體動作和更多樣化的物資協助他們抵抗。特別是，P 在訪談中告訴我了一些勇武的特殊攻擊手段 (各種「魔法」— 油漆、雞蛋、蟲子，等等)，以及他如何在身體動作的熟練化過程中，從原本只在後排傳送物資的「和理非」，走得「越來越前」而成為「勇武」— 轉化自身在運動當中的位置性。



圖（十）：從「和理非」到「勇武」之演化圖
（諸多香港藝術家，2020：251）

3.4. 兄弟爬山：社會運動作為熟練身體動作及戰略移動

倫理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合作共處，而非判定誰對誰錯
.....行走有如摔跤的控制 (walking as controlling falling)，因為我們的身體在行進中時既有限制，也有自由。自由，亦即向前行走、渡過生命的能力，不一定是逃避限制 走路時，你要先放棄穩定，讓自己幾乎要摔倒，繼而防止摔倒，恢復平衡。我們向前行的時候，是和各種限制拔河，而非避免限制。行動是自由開放的，即使無法避免限制。說話也一樣。我認為這是游走於限制和操作餘地之間。

Brian Massumi (2024 [2015]:31)

流水革命期間，示威群眾透過網絡連結和現地感知等多重方式，產生了能夠共享，或是極為個人化的抗爭地理知識。這些知識湧現的脈絡，在於示威者（尤其是隨身帶備破壞或攻擊物品的前線勇武）在都市衝突下遊走、移動和活動身體，往往需要面對政治風險，

躲避防暴警察的追捕或警員在街上盤查。因此，本來用以通勤等日常移動的交通工具、街道和建築物，就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並產生了一些地勢的挑戰。Routledge (1994) 曾提出「抵抗地勢」(terrain of resistance) 這一概念，捕捉社會運動能東西如何受到空間所中介。作為一個受到各方爭奪的場所，抵抗地勢「不僅是一個實質的地方，同時也是一種物理的表達……它們不僅反映了運動戰術的創意，也賦予空間一系列意義——包括象徵性、精神上、意識形態、文化或政治的。因此，抵抗地勢即是『隱喻的地勢』，又是『字面意義上的地勢』。它構成了衝突發生的地理基礎，也是一個再現的空間，用於理解和解釋社會行動」(Routledge 1994: 561)。無論是對於和平抗議或從事暴力抗爭或游擊的示威者而言，都市地理的複雜構造讓它們能夠進行戰術介入或政治表達，同時也是充滿風險與令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場所。

在衝突升級的香港，缺乏閱讀都市複雜地勢以及人群流動的能力，對於示威者來說往往是充滿風險和致命的。受訪者 I 告訴我，他曾誤以為散佈於棋盤街區的唐樓天台是合適的躲藏地點，便與同伴上樓觀察形勢，不料遭到防暴警察上樓圍困追捕，後來他在不遠處發現了警方無人機的身影(訪談，台北，2023-02-08)。受訪者 N 則憶述了他在沙田遭防暴警察拘捕的經驗。當時他與身邊的群眾在逃離示威現場時，遭警方從中切入，把他們「打散」為幾個幾十人的小群體，進而在商場外，沒有記者的公園「收網」圍捕(電話訪談，香港，2022-07-14)。受訪者 P 也提到當他身處屯門示威者與防暴警察對峙的前線，有時候會看不清前方建築物內的狀況。當時，勇武在設置大型路障，建築物裡面的防暴警察突然衝出來搜捕，他和其他前線示威者卻被後面的「和理非」人群(有的「還在「撒溪錢」沒有逃走」)阻塞，夾在兩者之間難以脫身，終於被距離太近的警察壓倒拘捕(訪談，台北，2022-02-18)。

都市環境被視為一種地勢，很大原因與群眾運動作為一種戰略移動性 (strategic mobility) 有關。對此，Routledge (1997) 也指出社會運動會展現出多樣的移動性策略和空間實踐，其中包括蜂群 (swarm) 與小隊 (pack) 的運動風格：「蜂群以數量的優勢 公開對抗統治權力，佔據空間，不論是在物理、象徵、政治還是在文化上。蜂群有時是可預測的，也可能是社會運動的前奏或表達。在其他時候，蜂群可能表達出 示威者即時的抗拒、憤怒或喜悅的時刻，幾乎在形成之後就立刻解體。這些運動能動性——小隊和蜂群——可能是相互關聯或相互對立，也可能構成彼此之間的前奏或轉變。它們與空間的關係——領域化和

去領域化的關係 — 始終是相對的，也始終交織在一起」(Routledge 1997: 2167)。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流水革命正體現了蜂群與小隊相互糾纏和變奏的運動風格。正如流水革命當中「和勇不分」的口號所示，抗議行動需要因時制宜地同時包涵著領域化(佔領)與去領域化(流動)，例如是先以大規模的民眾遊行集會為起始，再由散步各處的小隊或個體進行堵路、攻擊警方或其它破壞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極其偶發的，並且會在行動結束後融入回抗議蜂群當中，讓警察難以追捕。同時，一些同情或支持勇武行動的示威群眾或市民，也會積極掩護從事破壞行為的示威者，或是向他們提供安全脫離的交通載具和管道，例如是透過人際關係或通訊軟件維持的「家長車」網絡。

因應流水革命多樣化的抗議曲目和移動風格，群眾需要恆常運動和不斷遊走的需要，各種網上平台及通訊軟件頻道，如同雨後春筍般增生成長，為居住或遊走於都市各衝突熱點的人們提供實時地理資訊，協助其行動判斷。一方面，示威者也透過數碼基礎設施的建立，學懂了如何閱讀城市氣象的變化 (urban meteorological changes)，既能快速掌握當地的警力部署和變化，也能幫助安排風險較低的逃生路線和尋找安全空間暫時躲避。與許多新世紀的佔領運動一樣，反送中運動的流動式佔領、游擊和逃走，也依賴線上 (online) 與線下 (offline)，來回於網絡空間與城市現場的溝通與環境知識生產過程。例如，紀錄片《時代革命》就記錄了示威陣營中架設和維持 Telegram 抗爭消息頻道的團隊小組，電影團隊拍攝他們如何把抗爭現場上「哨兵」們用肉眼觀察、互相交流警方行動模式、武裝種類、人員部署等資訊，進而轉譯、整合和發佈到網絡通訊軟件頻道的過程（也請參見 訪談故事 a）。其中一位頻道管理員解釋：

我們的 Telegram 頻道有幾萬個訂閱者，我們估計有勇武行動的行動日，然後慢慢去學習。便會約一班人出動 有 10 至 20 個朋友會幫我們到現場做哨兵。大概有 10 個人會在我們的總部。我們會分兩邊，一邊輸入數據，立刻(通過哨兵消息和各媒體直播)衡量現場「戰區」的情況，然後想哨兵應該所站的位置，有不有即場調動。至於「地圖組」的朋友便會把所有資訊即時上載到 HK Map（網上地圖）。我們還有「車手組」，兩至三隊「咪手」（現場廣播員）..... 就算我出去衝擊，都要別人救我，倒不如我找一個適合自己的角色。我本來是一個不懂看 Google 地圖的「港女」，但我慢慢學習 我們

齡，但透過一
(25:44-27:18)
ogram 頻道，是有約

[illegible]

47

訪談故事 a. 資訊頻道管理員：遊走於線上與線下的實作身體

隨著網際網絡和社交媒體平臺的興起，這些新的通訊及資訊共享工具在社會運動當中的角色經常令人難以忽視，從 Facebook、Twitter，到更晚近出現的 Telegram、Signal 等強調通訊保密性的軟件，均被廣泛視為二十一世紀全球佔領運動浪潮「去中心化」動員的重要標記。可是，論者對於網絡串連（及其奇觀式的後果）的聚焦，卻往往忽略了實質上這些網絡平台是如何仰賴不同身體的持續勞動、遊走和實踐而支撐起來的。

受訪者 Tom（化名）是流水革命中其中一個最大型 Telegram 資訊頻道（包含負責偵察的「哨兵台」和負責接送抗議者的「家長車台」）的管理員之一。該頻道高峰時期有將近 20,000 個用戶追蹤。管理員團隊有 7 名成員（其中包括 Tom 在內有 4 人為常駐成員），他們私底下互相認識。據 Tom 所說，這個團隊和頻道最初成立的目的并非是情報搜集和抗議者救援行動：

其實一開始，我們並不是想做「家長車」的，我們一開始是想要在 612 封路的，用車輛來封路。因為有一個朋友，他本身是駕車的，然後他在 Telegram 本來有加入一些「車 Group」[汽車群組]，真是很單純地討論車的資訊的群組，接著有人提議「612」那天不如我們拿車出去堵路吧！他就真的覺得此事可行，於是他就開始負責組織這件事情。

後來我們發覺警察應該知道我們想這樣做，於是他們就在集會之前在不同的主要路口設立 Road-Block [路障]，在趕車或者不讓車進入那些主要幹道。後來我們就發現很多「手足」完場之後都不夠膽去搭地鐵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那他們就會很麻煩……所以我們就將原有的資源變了作「家長車」。

於是我們在 Telegram 上，在其他一些很公開的，幾個地區的大群組裡面，就問說，我們想召集一些私家車也好、電單車也好，看他們有沒有興趣一起堵路。到了後期，我們有幾個比較熟的「車手」，大家介紹、介紹、介紹，朋友介紹朋友那樣。

在 2019 年 6 月和 7 月，Tom 所屬的團隊主要負責處理抗議相關的地理資訊，在各區游行活動前發佈至群組上供追蹤者參考。後來，他們也跟其他「哨兵台」合作，負責召集、分配家長車車手和哨兵，與現場夥伴溝通的工作。例如 Tom 描述了他們在 721 元朗站事件中的參與：

參與地理資訊的工作是比較前期的；另一方面我們是有跟「哨兵台」合作的，所以我們前一天就會將那區域的地圖就貼了在我们的「安全屋」裡頭，之後我們就可以很快地知道那些地方是可以走或不可以走，哪些位置有警察這樣。

（走到的意思是首先示威者要能夠走到那個接送的位置？）對。我們也會靠當時在前線的「哨兵」或者「車手」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是安全可以上車，哪些位置不行。（那會否實時去調整？）會啊，因為「手足」會不斷「Be Water」[如水般]移動，所以我們也要變得隨機應變。

721 是我處理過最深刻的日子。因為在那天，可以算是我們正式試行「家長車」接送的那天。當時我還沒有很流程化，還沒有很完善的 SOP [按：標準作業流程] 去管理這些東西，而那天剛巧就是銅鑼灣那邊遊行完了，一些人就陸陸續續在銅鑼灣「散」[四面八方離開]了，但銅鑼灣「散」到一半時，突然間出現元朗那個事情。那時我就不斷看著直播，看著前面的「手足」，突然看到原來那邊「好大鑊」[出大事情了]。但那時慘的事情是，那時 Telegram 還未如此廣泛地使用，還是主要在像我們這樣的年齡層，年輕的「手足」之間比較多人使用。我們那時已經很迅速地叫了很多「車手」在元朗前一個站，好像是朗屏……總是原來前一個站，在西鐵站門口等，隨即又發放 Telegram 訊息叫其他人不要在元朗下車，要在前一個站下車，司機已經在外面等候，大家可以搭他們的車回去。

（有在月台那裡叫人嗎？）主要在 Telegram 叫人。因為剛巧我們沒有人在月台附近，也沒有想過會這樣突然間……我們都是盡叫，幫得多少得多少。（你們會在安全屋裡頭跟進整個運動的走向，又開始到結束？）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另一部電話，以及一部電腦。電腦就是直播著，當時有「反送中電視台」幾格幾格那樣，直播全部在發生的事；電話就是可以即時可以調配「車手」，或者與「車手」、「手足」溝通那樣。

Tom 也向我詳細地描述了管理員團隊的日常工作模式。據他所說，721 之後，先前已跟他們累積合作經驗的哨兵群組那邊開始組建了新的隊伍，「他們覺得只用走路不夠，想要電單車甚至是私家車，幫他們在現場可以很快速地接送走路的哨兵，由一個地點去第二個地點，或者車手他們本身可以直接在路面幫他們視察狀況。」為了方便溝通和保密需求，管理團隊將召集到的車手分為多個小群進行管理，各自分派予哨兵進行合作。這種工作模式一直持續到理大圍城事件之後：

其實我們的方法都挺危險的。一開始我們已經組建了一群車手 - 真的相熟的车手我們是會親身見面的。然後到了較後期，就是新的車手一定要有他們的介紹，才可以做很內部的的事情，比如說接送哨兵這些任務。

(721 之後，你們的 Telegram 頻道運作了很久？) 我們運作到 …… 差不多到了「理大」之後，因為都沒得出去抗爭，我們才慢慢開始沒做。理大事件那時候，我們是接近 24 小時輪更制的，包括 Admin [管理員] 以及幾個車手也是。當時，我們團隊分為兩組人，一組就是他們會去現場看情況，以及我們俗稱「撈仔」，就是直接「抓」現在的「手足」上車；另一組就是在後台做管理員，就是主要做聯絡。

那時我們在理大手足和被圍困的人會跑出來的地方 Stand-by [待命]，譬如世界殯儀館、紅磡火車站後面、CC (理工大學專學院) 門口等，長期都會有四、五輛車在這幾個地方等候。我們後台長期會有 2-3 個人輪更，在接收資訊以及得悉有人要出來。

(會不會覺得跟警察在玩「貓捉老鼠」？他們會不會破獲你們那些上車的位置？會不會知道有你們這樣的模式出現？)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知道的，因為其實那些位置都挺明顯的，不是很隱蔽的位置，而純粹就是一條街那樣，所以我覺得他們 (警察) 的心態是，「如果你真的那麼好運能夠這樣走到出去，那我就算囉」那樣。到了後期，他們把「網」收緊到了只是理工附近，門口那些位置，而我們安排車的位置就不在他們封路的範圍裡，是比較外圍一點。

在理大，我覺得我們的角色比較被動，就是始終我們沒有辦法進去裡頭，要等他們能走出來，我們才有辦法幫到他們。(那他們會怎樣跟你們聯絡，是透過 TG 群組說「要車」嗎？) 對啦對啦，或者他們會事先說「我幾點幾點就會在那個位置試試看能不能跑出去」，我們就會安排，看他們幾多個人跑出來，我們就會安排車手在附近等，時間到我們就會跟車手說那個位置，看看會否等到人。我們多半會等 15 分鐘到半個小時，如果真的沒有人的話，就會叫「車手」離開，因為始終那些位置也有他們的風險。

持續的運動情報、溝通、組織和提供載具等支援工作，讓 Tom 和他的夥伴們發展出極為獨特的生活節奏和空間實踐。管理員們要先瀏覽網上不同的抗議「時間表」，預測當天會有甚麼行動，並預先準備當天的地圖和人員安排：

我們內部的話，在開始之前會大概知道那個區域的每一條路，我們是要先背熟的，比如哪幾條是主要幹道，是哪條路在哪位置……我以前是會能背出中環……中環紅棉路那附近所有的天橋，哪一個出口是去哪裡……哪一條路接去哪一條是要全都背熟的。

接著因為有些位置例如銅鑼灣或者尖沙嘴，每隔一個禮拜就會發生一些行動，我們會預先調查他們（警方）上個禮拜在某一個位置擺過路障，這樣就能做好準備——如果這個位置他們擺了路障的話，那怎麼辦，要如何疏散，那些車要轉去哪個位置那樣。

不過到了後期，預備了那麼多，其實到了現場已經不太實用，因為那些「手足」走的方向其實已經預測不到，所以都要隨機應變……就是可能等前面的 Admin 或者相熟的「手足」跟我們說，現在大家向哪個位置疏散中，那些位置有警察不要走，那我們就會將那些資訊發佈在頻道上提醒大家。

就算是遙距進行資源調配，管理員團隊也會在接近抗議現場的地方設立「安全屋」（通常選在酒店房間，不會特定在同一個地點，也會用團隊以外其他人的個人資料去預約），他們主要在裏面處理頻道的相關任務，以及接待深入前線的成員：

（你們的安全屋也會在接近抗議現場？）沒錯。因為我們要安排給前線的那一組人，他們可能隨時要走還是休息，都可以上來。（你是說「撈仔」那一班？）對。又或者有一些我們認識的「手足」，他們剛好在附近要休息，都可以上來。（那真的好像打仗的那些指揮中心那樣，要在戰地有個中心那樣。）對也是這樣的概念。

（那時你當時每個禮拜的規律是怎樣的？）在中大之前的是每個禮拜週末參與的。那陣時好像在過一個「兩重生活」，平日就照常上班上學，週末就幫忙做管理員的事務。最繁忙就是中大和理大的那一個禮拜，就是整個禮拜都在安全屋，沒有回過家。

儘管 Tom 的團隊內部不乏安全意識，而且人數編制亦維持在較少數目，但恆常出現於抗議現場附近，仍然為這些參與者帶來一定的被捕風險，例如是與警方追查刷身而過的驚險經歷：

在銅鑼灣，不記得酒店名稱了，是在一間小學旁邊的。那天本來我們有三個人在那兒，當天下午四點多，突然有其中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就說他有一個在銅鑼灣酒店工作的朋友跟他說有警察聯絡他們，說待會會去檢查銅鑼灣的酒店。（到房間檢查？）對，到房間或者樓層。他就問我們會否考慮立即離開。我們三人是兩女一男，那男的就說「如果你們擔心的話，你們先走，我留在這；待會即使有甚麼事也不會被人一網打盡。」

所以我們就立即離開了，很幸運剛巧有一個朋友是住附近的，我們就去了他家。誰知道就真的警察去檢查那家酒店，還在那酒店門口逗留了將近六、七個小時。在那天銅鑼灣的事情完結了，將近十一點多十二點的時候，我就回到那間酒店對面的麥當勞——我記得酒店對面是有麥當勞的，那時我就一邊跟在酒店的朋友在電話通話，一邊進入麥當勞觀察附近有沒有甚麼動靜，因為負責那時還有警察。我就去買麥當勞，發現前面的人就是便衣警察。

（你怎麼知道他是便衣警？）因為他買完外賣上的那一架私家車，是有早上便泊在外面，我認得那個車牌號碼。應該就是便衣警了，因為要是一般人，根本沒理由把車子停在那兒那麼久；我就立即跟那朋友說原來剛才我前面的那人是便衣警來的，他就分析說，他們現在會去買飯吃，看來警戒心也降低了點，於是他就決定立即離開，我就立即叫附近的「車手」來載走他。（那警察最後是沒有上房間，就是在門口守住？）對，也守了最少五、六個小時，是那些軍裝警察。

我問 Tom 他對於自己「運動位置（資訊頻道管理員）」的想法，作為首次投身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當時他是一位學期剛完結的大學生），會覺得以這種特別的方式參與，會跟去游行，去前綫抗爭等方式有何不同？他說：

我覺得是每個人擅長的事情或者性格不同，便適合做不同的角色。譬如我自己覺得自己並不適合成為一個「勇武派」，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和身體的狀況不太適合……因為「勇武派」有好多事情都要當機立斷、隨機應變，但我是那些會不斷想好多會出現的情況，然後想很多個解決方法的人來的，可能不能即時在現場做反應。所以我覺得自己不太適合做前綫。但反而在 Admin 的位置，當然反應也是要有的，但是那個時間可以比起前面拉長一些，至少……不會說你現在這一刻如果不能立即想不到解決方法就會死。

就像我們主要就是做這個「溝通和支援工作」，我覺得我們的分工很清楚。即是我們後台的那一組就只會做後台的事情，前面的那一組就只會做前面的事情。Admin 就不會上前綫的了。（即是你自己也有這個認知，就是我在擔當這個角色，就不會去其他位置？）沒錯。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會增加風險。所有重要的資料都在電話裡，電話都在不出去的那組人手上。如果我們要走出去的話，也沒有理由不帶電話隨身；如果我們真的出了去，又碰巧被人抓了的話，那部電話入面的資料就會沒了，那就會……（就會連累到人？）對，自己被抓不要緊啊，但裡面的資料就會連累到其他人呢。我們看起來就像是會移動的資料中心。（訪談，台北，2024-07-10）

此外，流水革命作為一場群眾用快速地用身體佔據空間，搭建路障，遊走於都市各地的「運動」，對於這些不停運動的抗議者而言，有策略地移動，就不僅止於依賴一幀幀「凍結」和片斷的地理圖資和數據，而是關乎「實體」移動者的身體作為、臟器感覺和動覺智能 (kinaesthetic intelligence)（也請參見訪談故事 b）。對於這些真正於字面意義上「運動中的身體」(body-in-motion) 而言，遊走就並非脫離身體感覺，「純粹是頭腦通過文字、圖解和觀念來思考，（而是）經由操作和操作的經驗而產生的直觀體悟」(Adey 2013: 197)。在不受警察控制的安全地點（例如是酒店房間、學校、後山、倉庫等地點），示威者會架設汽油彈的生產線，並根據實際經驗去利用不同的物料（天拿水、花生油、洗衣粉、砂糖等等）進行調配實驗，增加「火魔法」的威力和效能（楊 2022: 87）。同時，一些有前線經驗的勇武派也會強調「練習擲汽油彈」的必要性，例如是投擲汽油彈的適當手勢、要訣、距離及戰術位置等實作知識（楊威利修 2022: 109；訪談，台北，2023-02-18；2023-0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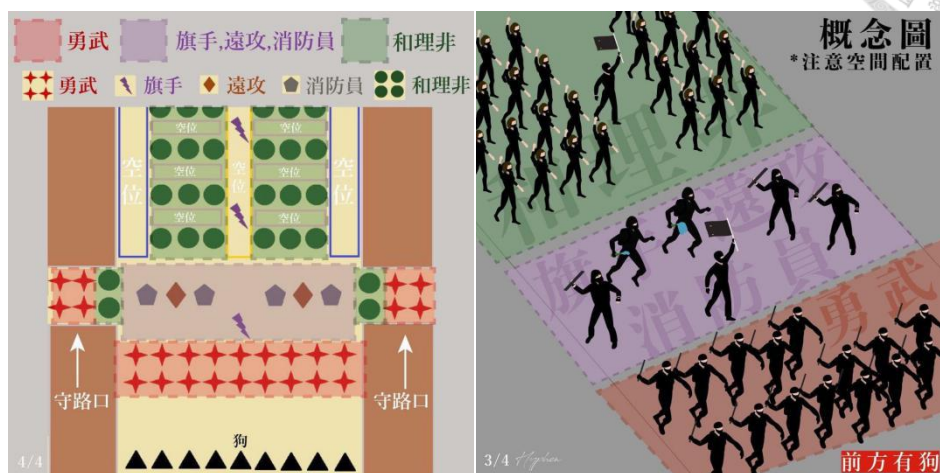
在運動現場，示威者需要關注瞬息萬變的形勢變化，以及從事多樣化的抗議任務，可能無暇打開手機研讀這些空間圖資。這時，因應示威者本身迥異的個人背景，以及他們在「運動」中身處不同位置，往往也會產生差異化的都市遊走知識，漸而發展出其移動軌跡和「運動」習慣。例如，受訪者 P 認為，香港有一些商場是適合躲藏的，例如是九龍站的圓方（ELEMENTS），因為「它的地方（面積）夠大，很多路可以走。（我：也是欸，我曾在那裡迷路過。）商場裡面有金、木、水、火、土等區域」。但一般而言，P 傾向覺得商場和其它建築物不是「適合躲藏的地方。它是密閉空間，就算有幾個出口，（警方）很容易就可以佈防。相反，如果我們去到市區或者平地的話，要怎麼走到（離開），或跨到對面的空間，都可以做到。但是，商場的話就難以走動……應該這樣說，一定不可以躲在任何的『建築物』裡/面，也最好不走進去。例如行人天橋——這也是建築物來的吧，我們（勇武）會知道這是盡量不要去的地方。」（訪談，台北，2023-02-18）。P 說他需要脫離示威現場，通常會跑到離街區遠一點，比較開闊的市郊區域：「我不會在現場躲起來，而是直接離開——就是離開這個示威 area，到遠一點的地方。甚至乎遠到那些狗（警察）不會 set roadblock、set 警車、有人巡邏的地方……抗爭發生在元朗的話，如果真的要逃跑，我會走到錦上路和朗屏中間的地帶。可能「抖啖氣」（喘一口氣），吃點東西，會感覺比較好。或者是在元朗的話，我會直接先回家，休息一會在出去（抗爭），家裡有什麼物資需要的話也可以順便帶上」（訪談，台北，2023-02-18）。隨著前線抗爭經驗的累積，

P 也漸漸意識到「地區知識」的重要，以及「當你有多熟悉（示威所在的）那個地區，就有多大的生存機率」（訪談，台北，2023-02-18）。721 事件後，示威者湧進元朗抗議，作為在地居民，P 會跟他私下認識的示威者解釋當區的特殊地理環境，「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就走那一條路。或是在這個商場什麼地方有防火門，可以直通地鐵站，或者直接下地面。或者哪條路會通往哪條路，以及哪一個位置的狗一定會碰到狗（警察）的。還有，因為有些朋友就是運動最前線的勇武派，他們開始有自己的 team。他們可能聽完我說後，就自己在腦海分析。分析過後就知道要在那個地方設路障。群眾要在哪一個地方聚集。選定地方後，他們就開始呼喚『和理非』（群眾）過來傳遞物資和進行掩護」（訪談，台北，2023-02-18）。另外，受訪者 M 也分享說，他所屬的勇武小隊或因應示威發生的不同地區而選出當天的「領隊」，負責安排隊員們的逃生路線「例如在旺角，不要沿著彌敦道跑，這很愚蠢，路面夠寬的話，很快會被警車追上。我們會預先想好要在那條小巷拐彎，在裡面換衣服並把身上裝備全都扔掉，再『手空空』地從小巷另一頭出去，比較安全……這些安排都需要住在不同地區，對不同地方較熟悉的同伴幫忙去想，運用這些優勢。逃走途中我們也會對照實時地圖，注意那些路線是危險，不能走的」（訪談，台北，2023-06-08）。

由此可見，為了促進流水革命的都市游擊模式，讓群眾進行在都市各處進行多樣化的動員、阻塞和破壞行動，示威者在線上和線下均產生了協助其辨識都市氣象（物理大氣與政治氛圍）及地勢，具身化的空間知識與移動慣習。這些知識牽涉到示威者如何比較安全地穿越於充滿毒性和被捕風險的都市環境，從而維持流水革命「散聚有時」、結合蜂群與小隊運動過程的去中心化抗議模式。關注流水革命參與者眼中的都市作為「抵抗地勢」，包括具身的移動交通知識與運動智能、風險感知與特殊地區知識等等，對於我們理解社會運動作為實質「運動」意涵，以及抗議身體的移動軌跡而言，都是極為關鍵的面向。

訪談故事 b. 前綫勇武抗議者：結合地理圖資與身體感的臨場判斷

受訪者 Jerry（化名）是一位界定自己為「前綫勇武」的香港女生。他曾在臺北一個私人活動上分享了一些參與流水革命的經歷和當時流傳的文宣內容，其中包括一些指引抗議群眾如何部署的圖資（參見下圖）。後來，我有機會跟他進行訪談，了解他對於這些運動地理資訊的想法。



2/4

Hyphen

角色介紹

和理非 Wo Lei Fei
定位：物資補給，充撐場面，封路
緊記：保持一隻手臂距離、時刻留意旗手、確保物資線&逃生線暢通無阻

勇武 Yung Mo
定位：物理輸出，魔法輸出，守前線
緊記：留意哨兵情報，小心為上

旗手 Kei Sau
定位：資訊傳送，維持隊形
緊記：確保勇武後方空間充足、留意情報

遠攻 Yuen Kung
定位：遠程物理/魔法輸出
緊記：與勇武保持適當距離、留意情報

消防員 Siu Fong Yuen
定位：於勇武後方空間滅火
緊記：與勇武保持適當距離、留意情報

齊上齊落唔好怯・緊守崗位咪亂撤

流水革命示威者部署圖資（受訪者 Jerry 提供）

55

doi:10.6342/NTU202500997

（請問你是這些圖資的作者還是接收者呢？）我是接收的。那時候我有加入了許多 Channel [頻道]，其中有一個叫「文宣 Channel」 嘛，管理員就會不斷掉這些圖出來。但我（在活動上分享的）那張圖是從連登 [網上討論平台] 下載的，連登有一些類似是談論戰略的貼文，會說一些整個運動或者出去勇武抗爭的不同人的企位 [站位]，就當作是遊戲那樣吧。哇真的做的很精緻。這些圖大致整理了運動大概分了什麼位置。也有一些是談作戰策略的概念圖。

其實當時我沒有真的看很多，只是先全部儲存在手機裏。我主要都是親身出去體驗來學習。（那你現在如何看待這些圖資呢？你覺得它們反映到當時的情況嗎？）反映到的！我覺得這些圖很有用的。記得這些圖出來後半個月內，你會在現場感覺到一堆人有意識地去做這些或那些事情，甚至會跟別人說自己是什麼「角色」啊，又或者他會知道自己要站在什麼位置，要負責什麼，會預想（與防暴警察之間）需要多少距離。例如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不是「投手」[負責投擲汽油彈或雜物] 也不是「消防員」[負責撲滅催淚煙] 的話，他就會知道自己要站在最後面。如果他自己這一次是要做「盾」的話，他就會拿雨傘站在最前排。

以這些圖資為引子，Jerry 向我分享了更多身處抗議現場的判斷和身體經驗：

（那你通常會是什麼角色？）我是滅火的，後尾有做「盾」吧。（那就是有一定的體力要求？）對啊對啊，是真的要跑的快。一開始對自己的體力沒有信心的，會覺得自己很孱。但我其實每天回家會做運動，還要是做類似 Hip 的那種，練爆發力的運動那些。到現場就真的覺得自己跑得快，比較出來原來其他人是那麼慢，原來我是算快的啦。那我就知道我可以站前一點再多做一些東西。

（那防暴跑得快不快？）一些些吧。但他們跑過來的氣勢會令我覺得很恐怖。當他們拿起警棍時，你會感覺到他們的裝備很重，但你又知道他們受過很多訓練，所以那麼重也能跑得那麼快。還有他撲向你的時候，又可能反應不夠快，就會被按倒。所以不再是跑得快不快的問題，而是要考慮反應。

（有些甚麼訊號會令你覺得要走？）就是你前面那一排「狗」[防暴警察]是不會突然衝前抓你的，通常是旁邊會收到「風」（風聲/信息）會說他們準備「包」（包圍）你。比如在旺角警署前面，可能在幾條街之外有人會叫「有『狗』在跑過來！」或者「有『狗車』[警車]落『狗』啦！」、「有『狗車』停在那裡啦！」這樣，那你就知道他們在部署，在收窄那個「網」的時候，你就差不多要走囉。因為你知道留得久就等如被人抓，那你是否要做被人抓那個人？除非你是有事情想在監獄做吧，否則你出來是主要希望攪亂那個秩序，給一些壓力他們，那時候就差不多要走吧。

（即是感覺形勢，決定去留的意思？）對啊，還有「哨兵」的消息，那時有 Telegram Channel 可以看，還有個「即時地圖」可以看「狗」的部署……哇這些真的很有用！當然還有看看自己的 Team（小隊）有沒有「哨兵」。

（你在小隊中會擔任哨兵嗎？）不會啊，因為我不懂得看地圖。所以我非常需要有人在在我身邊。我只能認到路，但我不懂看地圖，所以如果我熟悉那個區，我就只會在那個區裡打，不然我就要跟著我朋友，他做甚麼決定我就要跟隨，因為我判斷不了那條路是去哪裡，或者我看地圖，哪一個方位會有「狗」，我沒有絲毫概念。

所以我覺得擔任哨兵，其實好像在心裏看著一個 3D 立體圖，你就好像邊跑邊在這個鳥瞰圖上，抽離地去看自己在那個位置，附近他們有多少兵力，你自己有多少人，那些人走不走得及，還可以留多久。

然後現場有些人是會向群眾大喊的，可能會說「那裡那裡有『狗』下車」，那大家就知道要走；不過，如果當下還是有人是想留多一會兒，那個手足就會大喊「不用推我走了，我自己留多一會！」，大家算是會溝通的，這種情況蠻有趣。（所以抗議者之間會喊來喊去？）對啊，所以「對家」[警方]其實是全都聽進耳內的。（訪談，台北，2024-07-10）

3.5. 重新概念化社會運動：伴隨思考與認知的身體作為

身體能做什麼？身體的結構是其關係的組成。身體所能做的事情，取決於它受到觸動的能力之性質與界限。

Giles Deleuze (1992: 218)



作為一個以「需要快速地運用身體佔據空間，又保持流動」為特徵的運動，香港流水革命的流動性不僅依賴於靜止的、片段化的地理數據，還依賴於不同的抗議身體，以策略性的方式穿越城市地形的具體運動。對於這些不斷移動的抗議者來說，戰略移動不僅僅依賴於文本或圖表分析，而是依賴於「身體在運動中」的存在、臟器感受和動覺智能。通過反覆的練習，示威者變得更能應對和逃避大氣層式的警戒的管制。

這呼應了社會學家 Wacquant (2004) 的觀點，他認為受過訓練的身體是一個「自發的戰略家」，能夠立即察覺、理解、判斷和反應 (Wacquant 2004: 97; quoted in Adey 2017: 185)。置身於警察和抗議的氛圍中，社會「運動」必須考慮處於參與者們的具身體驗，以及由他們在線上、現場連結所打開的視地與空間。對於穿越各種氛圍的「運動中的身體」來說，心智並不脫離身體感受 (Adey 2013: 197)。在「運動」狀態下，無論是普通市民或是身處不同位置的抗議者，都有潛力去轉變他們的政治身份。在與眾多流水革命參與者進行訪談期間，我的對話者們亦時常提醒我（甚至是我自身的參與經驗），所謂的運動「角色」或「位置」只能是暫時性的，或隨時空情境不同而變化的概念。事實上，身處社會運動逐漸激進化、警方鎮壓持續升級的風暴當中，當都市既有的使用空間、移動的社會規範，甚至乎與陌生人與鄰人、他者的關係都被改變，無論是受到觸動的抗議者或民眾，都很難安穩地站立在既定的立足點 (或立場) 上，不受社會和物理環境的轉變調整（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我們可以說，「運動」的情動動態會懸置，並重新形塑出身體常規的行動路徑 (Campos Medina & Jaureguiberry Mondion 2021)。

另一方面，抗議者與散布於城市環境中的物品和以各種方式出現的身體形成緊密聯繫，改變了他們穿行於大氣/氛圍的感知模態。Feigenbaum (2014) 將社會運動中的物體和媒介稱為抵抗物質，強調抗議者和政府都通過物質流動傳達政治信息——從路障、佔領營地和數位技術，到催淚瓦斯和防毒面罩。這些物品和衝突場景的建築環境向抗議者傳達了具體

的意義和情感。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變得更加黏附，充滿了公共與個人意義，與特定材料、技術和抗議者的行動交織在一起 (Feigenbaum 2014: 17)。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由各種「運動中的身體」組成，這些身體包括人類和非人類的元素。實際上，群體的流動性，以及他們佔據的中介和空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地理學家分析社會運動空間動態的關鍵焦點。不同的流動方式揭示了運動如何發展出多樣的抵抗形式，挑戰權力不平等和不公義 (Adey 2013)。正如 Pile (1997) 優美地闡述的那樣：「社會運動被稱為運動並非巧合……關鍵似乎在於，社會運動之所以運動，是因為它們有一個起點、一個預計的目的地和一條要走的路徑，這條路徑遍佈於公開的政治地勢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are termed movements... The point seems to be that social movements move because they have an origin, a projected destination, and a path to travel, over an overt public political terrain)」 (Pile 1997: 29, 引用自 Leitner et al. 2008: 165)。

在社會運動中，個體和群體的流動性可以通過多種多樣的策略顛覆官方的空間腳本 (de Certeau & Mayol, 1998)。例如，抗議者可以通過象徵性展示其身體的方式來穿越城市空間，例如一起上街遊行，跳舞、展示標語。根據其策略的目的 — 例如是罷工、抵抗警察的包圍還是佔領 — 抗議群體可能會改變其移動方式、速度和群體規模 (Routledge 1997)。當然，抗議運動策略並不總是固有地具有顛覆性，有時它們可能無意中強化了現有的官方敘事。關鍵是將多樣化的流動策略與特定的關係和環境聯繫起來，從而揭示其政治意義和效果 (Adey 2013: 168)。

最重要的是，社會運動涉及到具體、實質移動的不同身體，以及人們對於那些承載、中介都市流動性的基礎設施、建築環境和周遭氛圍的政治化、動員和抗爭。國家往往試圖調控這些空間和流動的中介，旨在抑制抗議者的抵抗和群眾的過度流動。與此同時，群眾試圖通過集體行動佔據和穿越城市空間，將壓迫性的警治氛圍轉化為激烈的抗議環境。隨著社會運動升級，抗議者與政府之間的衝突加劇，使得城市流動性的「地勢」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這個地形不僅是公共話語領域的隱喻，而且具有物理和政治的雙重維度。

3.6. 小結：橋接「運動」的雙重意義

面對大氣/氛圍警戒和控制措施在全球越趨普遍，本章探討了都市大氣氛圍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交織關係。以 6 月 12 日「中信大廈圍城」事件為起點，並綜覽後續發展，我書寫了抗議者如何在受到大氣控制和氣體暴露影響下，通過即興或策略性地運用身體動作來躲避有毒氣體的影響和警方實施的空間封鎖。這些行動和即興創作最終形成了多樣化的抗爭曲目，包括物質使用、群眾流動策略以及宣傳材料中的話語，旨在重新奪回呼吸空間並且增強抗議動能。

通過結合對社會運動的討論與身體運動和流動的政治，本文主張，在大氣控制的背景下，「運動」的概念不僅包括傳統對社會運動的解釋——即推動或阻止政治變革或更廣泛社會轉型的持續性、非傳統活動——還包括身體性，既有社會也有物理意涵的運動。這包括動覺智能以及抗議者的身體如何感知、行動並在城市衝突空間中導航的理解。

本文在結論中分別強調一個理論和一個經驗上的要點。在經驗層面，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通過身體運動和流動戰術所表達的「運動」繼續產生跨越城市和國家邊界的地緣政治影響。隨著運動中的抗議行動愈加激進，部分面臨嚴重指控的「勇武」抗議者被迫通過多種方式緊急逃離香港。此外，中國實施《港區國家安全法》對香港公民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造成了寒蟬效應的政治氣候，並引發了數十年來最大的一波移民潮。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抗議者來說，無論是流亡、移民、留在香港，還是旅遊，他們的時空延展性都是持續研究的重點。理解這些社會和身體「運動」如何在新的時代和背景中演變，對於探索它們如何在不同的都市環境中產生新的抗議氛圍和地緣政治影響至關重要。

從理論上來說，本文通過「運動中的/運動的身體（body in motion）」的視角重新構想和理論化社會運動，對大氣警戒中的「運動」進行現象學描述，將其含義擴展到不僅僅是「為特定目的推動社會變革的一個群體」，還包括時刻流動的、不同個體的身體運動、行走、使用工具與物質、戰略部署和產生的情感效應。這種方法邀請我們重新審視「運動」一詞的詞源。例如，拉丁語詞根 *movere* 意味著「移動 (to move)」或「使運動 (set in motion)」，形成了「運動 (movement)」一詞的根源。在古法語中，「運動 (movement)」指的是行動 (actions)、動作、練習 (exercise)、發起 (initiation) 和鼓動 (instigation)。至於在古代中文中，「運動」

這個詞則涵蓋了多種身體運動和移動的解釋。具體來說，「運」指的是運輸或部署，而「動」則指「行動」、「移動位置」或「從靜止狀態過渡」。在現代用法中，「運動」不僅指體育活動，也指促進特定理念、意見或意識形態的群眾運動。跨語言的語義分析可以豐富我們對社會「運動」的理解，揭示出互補的視角。



第四章 與催淚瓦斯和新冠肺炎一起風化



4.1. 兩種激發抗議的動蕩大氣/氛圍：催淚瓦斯與新冠肺炎

空氣是看不見的，並且充滿了它所到之處的每一個角落；它在內外流動，在各處形成漩渦。有時，空氣似乎是透明的、無色無味且輕不著地；然而在其他時候，它可能呈現出某種重量和不確定的形態，例如霧，並與其他物質混合，喚起我們的感受和想像。我們被地球的大氣層所包圍，而它也在不斷與人類和非人類的多種形體進行元素性的交換。然而，空氣往往不在我們的視野和思維範疇之內。更重要的是，直到最近，它才成為人文學科中一個受到研究、反思和理論化的主題。

正因如此，過去二十年來，隨著人文地理學出現了大氣轉向的呼籲 (Jackson & Fannin 2011)，對空氣的研究變得更加豐富多樣。許多學者現在從情感、體積和元素的角度討論空氣/大氣 (McCormack 2018；Engelmann & McCormack 2021)，他們認為空氣/大氣超越了簡單的物理-材料作用，包含了各種超越化學的親和性 (Adey 2015)。這種方法鼓勵我們更專注地聆聽、察覺，並編織出藝術、工業和（戰爭）衝突之間常常未被察覺的關係、非預期的親和力、結合和分歧。其他學科，如哲學、人類學、建築學、科學技術研究、媒體研究和性別研究，也擴展了這一「多向度的大氣模型」 (DiCaglio 2021)。這些研究深化了我們對呼吸現狀和權力關係的理解，涵蓋了身體化、污染、環境治理和人類世等主題。Ingold (2008) 認為，大氣主宰著生命的各種動盪事態 (*atmospheres preside over life's turbulent affairs*) (另見 Adey, 2014；McCormack 2018)。根據這些學者的觀點，大氣如同「天氣世界」，能夠激發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情緒、行為、反應和結果。對於沉浸於環境的認知者來說，這些「天氣世界」還暗示著一種無形的「大氣地理學」 (*aerography*)，懸浮於空氣中，能夠影響並調節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關聯。

在上一章本文已經講到，都市大氣/氛圍警戒通常與動盪和不安的狀態緊密相關 (Feigenbaum & Kanngieser 2015；Wall 2019；2020)。警察普遍使用化學和嗅覺武器的情況表明，主權或其他形式的權力有能力利用化學合成的氣溶膠對人類施加毀滅性 (或「非致命」) 影響，暫時剝奪敵人抗議和密謀的能力（「*conspiracy*」既有「合謀」，也有「共同

呼吸」的意思）（如 Sloterdijk 2009; Larrinaga 2016; Nieuwenhuis 2016）。在大氣擾動下，人們往往能通過空氣感受到衝突的物質性和危機的情感強度 (Fregonese 2017)。以空氣傳播的各種物質、感官品質，通過空間的不均勻分佈和擴散，特通過技術進行的分離和控制過程，產生了情動氛圍並激發特定的社會秩序。例如，Wall (2019) 提到了政府如何化學之外的氛圍技術 (atmostechnics) 或防暴策略，以展示力量或與抗議群眾溝通，從而在整個環境中產生一種向民眾宣示主權治理的情感公共秩序。至於模控技術、閉路電視、計算機和無人機的技術網絡，也同樣是充斥著都市大氣/氛圍，促成一些政府企業複合體企圖引導社會型態流向的電子與政治氣候 (Amoore, 2018; Furuhashi, 2022)。

儘管如此，大氣/氛圍的管理並不只有服膺國家權力或技術中心的介入方式，也通過在地的、人與非人的、環境的異質連結而產生。根據 Anderson (2009) 的理解，情動氛圍是由人類、物質、物體和周遭環境的交融所產生的動態感官體驗。情動是指身體行動的強度、能力或脈衝，通過一種散佈卻可觸知的「情緒色調」(tone of feelings) 或氛圍，在身體與世界之間的空間形成。另一方面，媒體化過程能夠改變氛圍。抗議事件通過不同的媒介（從現場的氛圍到身體技藝的介導，再到社交媒體），在情境中建立了特定的意義範圍，以此佔據空間 (Gukelberger & Meyer 2020)。Jack (2021) 對德國狂熱球迷的民族誌研究表明，示威者與警方衝突而產生的環境破裂，為集體即興行動和表達打開了公共領域。氛圍是流動的，永遠不是靜態的——取決於物理空間和其中的參與者，與特定時刻的政治緊密相連，隨著地點、時間和情境的不斷變化。示威者也會實時、集體地適應各種情況，並在情勢變化時有策略地調節情緒：「如果情動驅動行動，那麼意識形態就是通過身體同步移動的聲光奇觀中得到強調和充分體驗的」(Jack 2021: 512)。不同於警治權力經常把群眾詮釋為非理性的烏合之眾，抗議群眾「同步地展示攻擊性和歡慶會構成威脅，是因為它們實現了一種替代秩序，而非混亂狀態，然而，氛圍並不意味著思想和身體能夠全方位完美無瑕地協調工作，而是突顯了氛圍作為一種難以控制，多價的體驗地勢 (a multivalent experiential terrain)——異質的體驗如何同時交匯起來和彼此競爭」(Jack 2021: 500)。而且，群眾在公共場所移動的經驗和實踐（例如穿過機場），有可能通過身體在「特定遭遇中幾乎察覺不到的權力轉變」而產生更廣泛政治轉型 (Jaquinto & Barber 2022)。這樣的具身遭遇可能具有情動的維度，因為情動在共享同一氛圍的人之間是潛在地「傳染」的。對於示威者而言，

情動氛圍的政治潛力存在於這些具有傳染性的性質 (contagious qualities) 上，佔領或集會的共在經驗與集體行為有助於構建一個國族，例如在機場示威的案例中，形成一個支持香港抗議運動，如普選權利等廣泛目標的民衆集體。

關於環繞、進出我們身體的空氣，Bruno Latour (2006) 寫道：「最初我們什麼也感覺不到，我們是麻木的，覺得自然而然。然後——突然間，我們所感覺到的並非某項事物的出現，而是之前從未意識到會缺失的，卻已然缺席的東西。想想那些在戰壕中的可憐士兵……他們知道子彈、炮彈、老鼠、死亡、泥濘和恐懼的一切——但對空氣卻沒有感覺，只是呼吸著它。然後，從這片醜陋、緩慢移動、綠色的雲霧中，空氣被移除。他們開始窒息。空氣進入了可以從我們身上撤走的事物清單中……空氣被顯現出來，空氣被重新配置；它現在是我們生存所依賴的一部分空調系統。」(Latour 2006: 104)。這意味著大氣因其引起的深刻臟器影響和情動強度變得可感知，甚至成為我們感官的關切。這些特質可以是積極的，例如嘉年華中的節日歡樂氣氛、大教堂內的安靜莊嚴，或我們在購物中心遇到的某些宜人氣味，它們喚起我們的欲望。相反，負面且令人無法忍受的空氣可能預示著我們周圍環境的危機，例如在工業污染區、激烈衝突之中，或疫情爆發期間。在這些情境中，人們被迫與滲透在大氣中的危險共存。

雖然 Latour 談到的致命化學毒氣在今天已幾近絕跡於戰場，但民用的催淚瓦斯也在大戰後，已然循環於爆發暴動和社會運動的都市之間，進入國家警治的常用兵器庫當中 (De Larrinaga 2016)。至於在疫病爆發，人人自危的情境，Outka (2019) 也從西班牙流感的案例中，爬梳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人如何感知到流感在都市裡蔓延，與充滿未知與危險的病毒大氣 (viral atmosphere) 纏繞在一起。通過空氣和呼吸傳播的病毒，不只產生了堆積如山的屍體，更帶來了一股焦慮、恐懼氛圍和在倖存者的罪咎情緒 (Outka 2019: 13)。在其他時空當中，Latour 和 Outka 各自提到的這些大氣擾動狀況，也可能以極為詭異的方式混和在一起。身處 2020 年的香港，歷經了激烈的社會運動、都市衝突和疫情爆發的作家韓麗珠如此寫道：

在病毒來襲之前，城市的空氣已瀰漫著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殘餘物，還有歪理和謊言，人們的身心便因而被鍛鍊得強壯一點。苦難成了一種鋪墊。有些人把

自己隔離在家裡，有些人被關進牢房，有些人被迫出走。但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感到，和城市裡無數陌生人如此緊密連繫著。

(韓麗珠 2021: 434)



事實上，韓麗珠對於都市大氣/氛圍極具詩意的感觸，在流水革命的參與者之間極為普遍，催淚瓦斯、新冠肺炎病毒這些隨著空氣和呼吸身體傳播的毒氣顆粒，早已深深黏連到民眾的集體記憶當中。在香港多年的大氣動盪中，政府不斷使用催淚瓦斯等化學武器來鎮壓廣泛的社會運動，創造了充滿恐懼、敵意和暴力的氛圍，這反過來又引發了大規模的抵抗。另一方面，抗議者通過集結抗議物資、各種身體實踐和策略性的移動，有節奏地召喚出強烈的抗議氛圍。韓麗珠的陳述生動地展示了氛圍如何成為調解都市衝突的關鍵場域。

那麼，在社會運動和警察的激烈對抗背景下，我們的身體如何更廣範的物質-情動環境有所聯動，與都市大氣/氛圍同行，一起思考？本章通過人文地理學中大氣/氛圍 (atmospherics) 的詮釋框架，接合現象學、女性主義和新物質主義有關「風化」(weathering) 的討論，探討香港於流水革命以及新冠肺炎時期的獨特情動地理和生態，如何在處於激烈衝突中的都市、社區、身體以不同形式鋪展。我指出，面對大氣控制，抗議者仍然「隨著變化的都市大氣/氛圍而風化 (weathering with the changing urban atmospheres)」— 不斷導航、調整、抵抗並干預他們周遭的物質—情感環境和呼吸狀況，以重塑社會和「同呼吸」的關係性抗議主體。

在這一章，我重點追索了一連串互相牽引的呼吸線索 (lines of breath)，包括橫跨 2019-2020 年的兩次大氣擾動事件，以及與這些環境危機相互交織的抗議氛圍及身體美學。流水革命爆發後，整座都市被一股警治的有毒大氣/氛圍所籠罩，也讓市民通過共同呼吸、聚集身體/物件、戰略移動、歌唱實踐、物理與化學攻擊等方式回應國家暴力，產生熾熱的抗議氛圍。然而，隨著新冠肺炎悄然於都市蔓延和爆發，這股非人力量及病毒的大氣/氛圍也塑造了新的警戒與社會運動地勢，將那裡重新演繹為眾多結盟、抹除、衝突與撤離的異質空間 (heterogeneous spaces of realignments, erasures, conflicts, and withdrawal)。面對警察權力的延長和變形，抗議者也以各種方式記錄、感知、理解並反思這種新的病毒傳播，試圖維繫社會運動的生命線，以及共同呼吸的可能性。

4.2. 催淚圍城：遭受毒氣風化的香港都市環境

Tear gas, Tear down, Tear apart, Tears.

以上，2019 年香港暑夏的印記



《突破雜誌》（2019）

催淚彈還可以從俗稱「大口仔」的防暴槍射出，一個金屬長筒內含五粒彈頭。空彈筒掉落在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隨即看到五條幼細的灰色拋物線劃破長空，小圓筒彈頭有時在地上翻滾，鈎出一條彎曲的白煙路。那個晚上，雲霧在馬路上凝聚、糾纏、飄散，像一幅水墨畫。後來才知道，催淚彈頭飛到藥房裡，飛到巴士外圍，翌日還飛入屯門屋苑七樓的走廊，有時還打中採訪記者的身上。

譚蕙芸（2020: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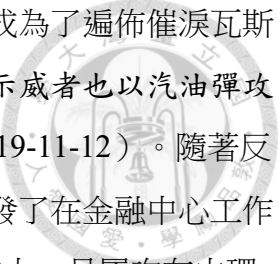
催淚瓦斯經常被視為稍遜即逝的短暫事件，其於眼前瞬間突如其來的時間性、於群眾中間和周遭範圍產生環境破裂的空間性，往往是人們指認這種鎮壓武器的重要標記之一。例如，Theophandis (2013) 曾描述伊斯坦堡一段幾分鐘的抗議短影音：「氣體完全填滿人群聚集區域的速度令人驚訝。在第一輪彈藥擊中後的四十秒內，天空變得不可見：一種黃色而濃密的煙霧充滿了整個畫面。隨後，攝影機將焦點轉向附近的一位年輕女性。與這段影音的創作者一樣，她被困在化學雲中，身處一輛無法移動的公共汽車上，顯然無法逃脫。她口中佩戴的簡易呼吸面具顯然無法在這種情況下為她提供足夠的保護。氣體的癱瘓效應在她迅速陷入的極度痛苦中得到了戲劇性的展現：短片中顯示她跪倒在地，驚恐地尖叫。這種經歷必然是令人感到恐懼的。」（Theophandis 2013: 14）影片中的女士被迫帶上口罩，儘快離開她所站的位置。隨著身體的移動和煙霧消散，他所身處的空氣球域又似乎恢復平常的狀態。

如果催淚瓦斯的施放標誌著環境發生了時空斷裂之事件，那麼我們把這些戲劇性的時刻串連起來或進行製圖，能夠揭示什麼？在 2019 年的香港，正正是催淚瓦斯於城市極度顯見、廣泛、反覆的出現，持續成為了公眾和媒體注意力的焦點。根據香港警察的數據，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警方在香港各區不同地點釋放了超過 16223 枚催淚瓦

斯（端傳媒 2020-07-27）。這個數量遠超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超越了 2014 年在金鐘應付雨傘運動佔領者的 87 枚。在 11 月 18 日，警方更在理工大學附近，向前來「反包圍」的群眾施放了 3292 枚催淚瓦斯，24 小時內平均「每 30 秒發射一枚催淚彈」（端傳媒 2020-07-27）在這一年間，催淚瓦斯滲透到全港各區的大街小巷，彈殼堆積如山（參見圖（十二））。甚至不少位於衝突範圍的平民住宅都曾被催淚煙所包圍和滲入，成為縈繞不去，甚至在夜間浸入到不少居民夢境的日常感官記憶。受訪者 Y 告訴我，2019 年他住在西環的中聯辦附近的唐樓二樓，家旁邊就是一家護老院。當警方在驅散到中聯辦抗議或佔路的示威者時，「那些催淚煙會飄上來，進到屋內，關窗也阻擋不了多少，鄰居的小朋友也聞到了，眼淚直流」（台北訪談，2024-08-01）。當時住在深水埗（另一個衝突熱點）的受訪者 N 也告訴我，他家所在的私人屋苑，就位於小販市場的隔壁，當警方從長沙灣警處推進過來時，示威者往往會在屋苑門前的窄長街道築起街壘，「幾乎每天上學放學都會經過 [示威者的路障]，而且打得厲害的時候，有些手足或街坊會進來我們屋苑的大廳和花園，保安員蠻好的，放他們進來躲避催淚瓦斯和那些警察追捕」（電話訪談，2023-07-11）。



圖（十二）：衝突現場的抗議者自發收集催淚彈殼，堆積於路邊展示
（香港 01 2019-11-27）



面臨群眾佔領和警方攻堅，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相繼成為了遍佈催淚瓦斯的「煙硝戰場」：「香港警察闖入大學校內發射催淚彈並逮捕學生，示威者也以汽油彈攻擊。這是香港的大學從未見過，有如戰場和衝突的局面」（報導者 2019-11-12）。隨著反政府的抗議運動持續升溫，示威者、防暴警察和催淚瓦斯的追逐也引發了在金融中心工作的國外移居者的焦慮。一位匯豐銀行的證券交易員向 BBC 表示，他在十一月屢次在中環的公司「出門買午餐的路上碰上發射催淚彈」，表示這些事件是一個「轉折點，他和許多同僚都對這座城市的前景提出了質疑 隨著示威持續升級，他們看到自己公司在香港的業務正在萎縮」（BBC 中文 2019-11-16）大氣警戒和抗議氛圍的持續、交替出現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波動的標記，在外資公司間引發了一系列的安全焦慮和緊急撤離論述。在更廣泛層面，有學者甚至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遊行集會現場進行的民調推算，「香港至少有 100 萬人曾吸入過催淚煙」（端傳媒 2020-07-27），除了顯示了政府進行大氣警戒的影響區域之廣，更指向了社會動盪和都市衝突之激烈程度。運動與鎮壓的迴旋共舞，業已深遠地黏著、沈澱於城市建築、市民身體的表面和時空節奏當中，縈繞不去，讓整座都市風化為一種弔詭地「活靈活現」的物質—情動環境（material-affective environment），大氣條件的湍流和變化不斷激發著居民的日常感受、評論和記憶。

催淚圍城之下，因應毒氣會長時間地停留在環境中，香港空氣的毒性和催淚瓦斯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持續成為市民憂心的來源。自 612 事件以來，警方一直拒絕公開《警察通例》第 29 章的「武力與槍械的使用」指引，只是聲稱催淚瓦斯、胡椒噴霧和布袋彈「都是低殺傷力武器」（蘋果日報 2019-06-13）。另一方面，除了在每次政府鎮壓清場之後，醫管局會向傳媒披露受傷送院人數之外，香港的公共醫療部門亦沒有向公眾公布催淚瓦斯是否會對公眾健康構成影響的詳細資訊和數據。2019 年 10 月 14 日，一群牛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者向醫學權威期刊 The Lancet 發信，向國際簡介了催淚瓦斯在香港的使用狀況：

香港警務處管理抗議活動和公共暴力爆發所採用的方法引發了極大的爭議。自 6 月以來，警方已經部署了超過 3000 發催淚彈作為人群管控的手段。警方使用的催淚彈含有 o-氯苯甲烯基馬龍腈（o-chlorobenzylidene malononitrile），這是一種刺激性物質，與粘膜感覺神經受體（包括 TRPA1 通道）相互作用，導致快速

的臨床效應，其癱瘓劑量和致死劑量之間存在較大範圍。儘管持續時間短暫，但臨床表現包括眼睛流淚和灼熱感、咳嗽、呼吸困難、皮膚紅疹、水泡、高血壓、噁心、嘔吐和煩躁等。



一項系統性回顧的作者報告了 5910 名接觸化學刺激物的人，其中有兩人死亡，並且 58 人出現了永久性殘疾，如失明、因創傷性腦損傷而處於植物人狀態、截肢和肢體功能喪失、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內的精神後遺症、持續的呼吸問題（包括哮喘）和慢性皮膚病。然而，有關長期後遺症、致癌性和城市環境中環境後果的數據仍然稀缺。

或許，公共衛生爭議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政府缺乏領導的去污努力，以及缺乏針對催淚彈副作用的健康保護的官方指導和自助建議。在香港炎熱潮濕的亞熱帶環境中，催淚彈在繁忙的火車站和商業購物中心等封閉空間的部署，可能使人們在長時間內暴露於高濃度的催淚彈中。催淚彈也在高密度住宅區和許多老年人居住的社區（例如觀塘、黃大仙和深水埗）中使用。受影響的社區和場所不得不尋找自己的方式來進行環境去除污染。

香港當前的情況，呼籲我們反思在高密度城市地區使用催淚彈進行人群和暴動控制的適當性，尤其是在當局對旁觀者、受影響社區和利益相關者提供去污指導和健康保護的努力，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之下。香港特區政府應投資於與催淚彈相關的健康監測和長期環境監測。（Chan et al. 2019）

對於警方使用催淚瓦斯引起不同界別和市民強烈關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立法會面對質詢時表示：

衛生署、醫院管理局香港中毒諮詢中心曾檢視醫學文獻和科學研究，沒有發現使用催淚煙引致二噁英中毒個案，燃燒有機物有可能產生俗稱山埃的氰化物和二噁英等化學物質，產生的數量和濃度視乎燃燒時間、溫度和物質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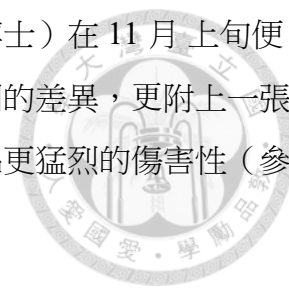
身而有所不同。由於催淚彈的燃燒時間甚短，所產生的氯化物很快在空氣中消散……

接觸催淚煙的人士一般會出現輕微呼吸系統和皮膚不適症狀，對身體沒有嚴重影響，大部分人在急症室進行清洗和接受治療後便可出院……至於催淚彈殘留物對環境的影響，催淚煙主要為粒狀物質，較空氣重，使用後會沉降到地面，一般會附於物件表面，不會長期懸浮於空氣中。（政府新聞網 2019-11-20）

兩星期後，陳肇始再次受到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問及催淚瓦斯殘留物對於市民健康的影響。這次他表示，衛生署已發出了有關催淚瓦斯的健康資訊，內容包括「市民在接觸催淚煙後的處理方法」，以及「有關進行清潔的建議程序」等等。根據該網頁附錄資訊（只有一頁），政府承認了「現時就催淚煙對人體長期健康影響的資料及文獻有限，但有研究指出催淚煙可對生理及心理健康又持續影響」，但重點還是建議，「市民如果身處有催淚瓦斯的地方應儘快離開」（政府新聞網 2019-12-04）。當議員問及「環境保護署會否派員到警方曾多次發射大量催淚彈的地點採集環境樣本，以檢測催淚彈所含有毒物質有否在社區殘留」，政府的回應卻把都市局部空氣異常的原因歸咎於示威者縱火：「環境保護署分析了自二〇一九年六月至今曾施放催淚煙地區附近空氣監測站錄得的粒子數據，比對在施放催淚煙期間和未施放催淚煙之前附近監測站的粒子濃度，以及比對同期間其他沒有施放催淚煙地區監測站的數據。有關分析並沒有發現在曾施放催淚煙地區附近的監測站錄得的粒子水平出現異常的情況，顯示催淚煙並未使到整個地區的懸浮粒子濃度明顯增加。然而有個別日子，因有縱火情況，而令附近監測站錄得懸浮粒子濃度有數小時上升至高於當天正常水平兩倍，顯示縱火活動會對附近地區的空气質素造成影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12-04）。

香港政府在面對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迴避了談論催淚瓦斯化學成分，卻正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所在。11月27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同樣拒絕回答議員問及警方使用催淚彈之產地、成分、威力和造成影響的問題，只是指出，「警方所用的裝備的採購細節，涉及行動部署，為避免影響警方的行動能力，不宜公開」（立場新聞 2019-11-27）。然而在整個流水革命期間，也有不少民間的化學相關專業者試圖為這個問題提供推斷的證據和

想法。一位化學科補習老師 Dr. Kwong（鄺士山，香港大學化學系博士）在 11 月上旬便投書立場新聞，除了詳細地向公眾解釋不同產地、種類催淚瓦斯之間的差異，更附上一張自己拍攝，顯示了催淚瓦斯彈殼溶解馬路瀝青的照片，批評中國製品更猛烈的傷害性（參見圖（十三））：



催淚彈一般由（1）彈身（有銅）、（2）彈藥（如發射用，正常炸藥）同雷管、（3）催淚劑固體（主要係 CS）、（4）發熱材料（以令催淚劑氣化分散）…… CS (O-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 係固體，約 100°C 熔，300°C 氣化，所以受熱會變成蒸氣，遇冷空氣變返微塵粒，被風吹到你眼、鼻、口，你就賴嘢。由於 CS >400°C 就會分解（咁就有乜催淚作用，而分解產物有有害就有人知），而越高溫，分解出來的化合物就越多，其中已知嘅有鹽酸(hydrochloric acid, HCl) 氣體可導致肺積水、氰化氫氣體（即山埃氣，hydrogen cynaide, HCN）、超級致癌物二噁英（dioxin）。基於這些原因，各國都希望將發熱溫度低過 450°C！

[催淚瓦斯的發熱材料] 主要由（A）氧化劑（oxidizing agent）同（B）還原劑（reducing agent）組成

氧化劑各國大致相同：硝酸鉀（potassium nitrate, KNO₃）及氯酸鉀（potassium chlorate, KClO₃）受熱分解出氧氣，而 KClO₃ 更出埋氯化鉀（potassium chloride, KCl）白煙

還原劑【外國】：碳粉、矽粉（silicon）、糖、火棉（nitrocellulose），燃燒後可達溫度最高 1,500°C，一般 <1,000°C，產品有二氧化碳（CO₂）、水（H₂O）、二氧化矽（silicon dioxide, SiO₂ 即白煙）

還原劑【中國、伊朗】：鎂粉、鋁粉、火棉，燃燒後可達溫度最高 3,300°C，一般 <2,000°C，產品有 CO₂、H₂O、兩種白煙氧化鎂（magnesium oxide, MgO）與 氧化鋁（aluminum oxide, Al₂O₃）。

由於中國貨產生 MgO 同 Al_2O_3 比外國貨 SiO_2 濃、重及大粒，所以中國貨的煙好白，而外國的煙 SiO_2 細微，經光學現象 scattering 產生微藍色。

由於外國貨溫度低，用水一淋立即熄滅，而中國貨溫度高好多，用水淋分分鐘水同鎂／鋁生成氫氣（爆得！），好危險。用手摸一定燒傷，打中人就著火！更可以熔馬路上嘅蠟青！

而由於中國貨 CS 有高溫分解問題，彈內嘅 CS 比外國多好多，分解出嚟嘅有毒嘢如 HCl 氣體， HCN 氣體，二噁英亦比外國多好多。更加大鑊嘅係好多高溫 CS 分解產物冇人研究過對人體短期及長遠有乜害！

所以用中國催淚彈可以解決到嘅唔係政治問題，而係解決市民，必須立即停用！（立場新聞 2019-11-09）



圖（十三）：香港警方使用的催淚瓦斯彈殼溶解馬路瀝青
（立場新聞 2019-11-09）



圖（十四）：網上專頁「香城教育電視」以眾籌形式購買山埃檢測機，
化驗香港各處的山埃含量
（蘋果日報 2019-11-27）

其實在更早時候，一些民間團體就試圖就都市環境的毒性（以及政府、警方對相關數據的遮蔽或忽略）以公民科學感測的方式進行回應（參見圖（十四））。8月12日，警方在記者會上承認曾於現場使用過期的催淚瓦斯（立場新聞 2019-08-12），有約40位化學工程師組成研究團隊，自8月18日起三個星期間「於多個曾施放催淚彈的地區，採集超過200個樣本分析，發現催淚煙中主要引致不適的化學成分CS，能殘留在社區中長達2至3星期……團隊代表、化學工程師李浩基表示，在空氣較不流通的內街施放催淚彈，會令殘留物逗留較長時間，舉例在深水埗內街，於事隔14天後仍測出CS化學物，反之較空曠的地方，如荃灣天橋及其附近的荃灣公園、九龍灣德福花園平台及偉業街行人天橋等，都在3至7天內錄得CS殘留緩解情況。另外，天氣也對化學物殘留時間有影響，如該位置會被太陽照曬、大風吹、雨水洗過等，都會減少殘留物……李浩基同時指出，若在

較空曠的地方密集式發射催淚彈，殘留物會隨風擴散得更遠，影響範圍更廣。他以 8.25 荃灣衝突為例，在受影響的荃灣公園，最遠測出殘留物的地方，距離衝突現場達 250 米。」（眾新聞 2019-09-11），顯示催淚瓦斯會與天氣、都市空間佈局、氣霧濃度和密集型等環境條件聯動，持續逗留和轉化。及後在 11 月的理大衝突事件當中，網上專頁「香城教育電視」的版主亦帶同山埃毒氣檢測機前往理工大學現場，「在催淚彈煙前，檢測機立即閃起紅燈並響起高音的警號，在旁的前線抗爭忙着『滅彈』，他就跑到不同角落檢測，近距離接觸催淚彈時測出的山埃讀數超標，高達 28.6 ppm」（蘋果日報 2019-11-27），又呼籲呼籲市民最近不要帶孩子前往理工大學附近的歷史博物館和科學館。《蘋果日報》也曾「委託歐洲化驗所檢驗催淚彈主要成份 CS 在社區和家居的殘留，首次得出定量化驗報告，發現催淚彈射入民居後，CS 在布質物和乳膠漆牆上黏附能力極高，推算枕頭袋手洗五次仍有令皮膚致敏的 CS 含量。政府多次指催淚彈影響短暫，但發射一個月後，一樓民居的冷氣機隔塵網仍驗出 CS。學者指警方絕不應大量使用催淚彈，因香港密集多高樓，山谷效應下污染物好難走，殘留可能以年月計」（蘋果日報 2019-12-27）。



圖（十五）：民間團體「香港媽媽反送中」開記招展示小孩子出紅疹的相片
（蘋果日報 2019-11-28）

香港警方伴隨每週抗議案件而施放催淚瓦斯，轉變都市物質環境的影響，也被在不同時刻被都市居民的感官所註記。例如 11 月 21 日，網上流傳，「有兒童到公園玩時因接觸到催淚彈殘餘物而導致皮膚紅腫，民間組織開始自發製作受催淚彈影響分佈圖，供市民參考自救」（蘋果日報 2019-11-21）。民間團體「香港媽媽反送中」也發布問卷調查結果（參見圖（十五）），指出兒童在社區公園、接觸催淚煙或殘留物後，出現多項不良反應，最長住院五天：「逾 1000 名兒童接觸催淚煙後出現不良身體反應，約 65% 咳嗽、55.5% 感覺喉嚨乾涸、50.9% 感到皮膚痕癢。另有 97% 受訪家長贊成政府公布催淚彈成分，及評估催淚彈對市民健康和環境的長遠影響」（東網 2019-11-27）。面對政府數據的缺乏，民間記者會在 12 月 7 日發表調查報告，根據網上問卷調查（收集 17,819 份回覆），發現「半成受訪者吸入催淚煙後出現咳血、瀉血及尿液顏色異常，亦有 14 至 16% 受訪市民出現肚痛及肚瀉，另有 18 至 23% 人表示有呼吸、眼球、皮膚方面症狀，有 16.7% 受訪者皮膚異常，出現紅疹、水泡，甚至含膿等，臉部、雙臂及頸部是重災區。而在皮膚出現異常者當中，發病頻率超過九成」（蘋果日報 2019-12-07）。同樣在 12 月上旬，旺角區議員也受到「居住於劏房的單親媽媽求助，由於警察不斷在彌敦道一帶施放催淚氣體，導致她與 5 歲兒子出疹，兩母子無家可歸……該女士發現兒子背部至大腿出紅疹，久久未散。上月向醫生求疹，醫生指紅疹『有可能跟催淚煙』有關」，同區街坊也表示每晚受催淚煙及開槍噪音困擾，難以入睡（蘋果日報 2019-12-07）。從暑夏到寒冬，報刊和獨立記者也不斷收集更多市民暴露於催淚瓦斯環境下的個案紀錄。例如明週文化在 2019 年年末邀請了四十五位市民填寫問卷，描述「吃催淚彈的經過」、「徵狀及維持多久」、「看醫生的情況和用藥」，以及「長時段身體狀況改變」等等，以下是其中一位市民的個案描述：

年齡：23

性別：女

吃催淚彈的最嚴重的日子：

6月12日，解放軍大廈對出2至300米；7月28日，上環干諾道西，摩利臣街交界；8月3日，黃大仙龍翔道巴士站。其實好多次我都有出去，不過這三個日子比較能明確看到身體反應不同，其餘是9月29日和10月1日。



當時吃催淚彈的經過：

6月12日，初次中第一顆催淚彈，距離近200米，雙手卻已出現紅點，流眼水、乾嘔、呼吸道灼熱、臉部灼痛。這一次身體反應較少，因為濃度不高。兩小時瘋狂食彈，近距離受催淚彈攻擊。之後添美道對峙太近，狂流眼淚，眼睛刺痛，難以睇路，鼻涕咳嗽，難以呼吸。添美道失守後，經往演藝道行車天橋離開。

7月28日，在上環，皮膚及眼睛灼痛。之後示威再中催淚彈，沒有出現紅點。正常即時身體反應。後遺症是一直頭痛和久咳，因為現場曾用生理鹽水沾濕毛巾掩臉，洗臉會感到毛巾有催淚彈味道。精神上容易受大聲響嚇到，人多地方與安靜環境都會聽到示威嘈雜聲音。短期重回金鐘夏慤道時，會感到呼吸及吞口水困難。

徵狀及維持多久：

6月12日紅點於3至4日後消退；7月28日，當日吸入催淚彈後身體皮膚（臉部以外）灼痛感增加。而黃大仙第一晚衝突後，肚痛肚屑維持了3至4日，腸胃隱隱痛，左胸口隱痛，肚屑，肚痛，久咳。總結，後遺反應逐次增加，可能6月12日只出了紅點，下次就會咳四至五日 and 頭痛，出現心理問題。再下次，回家就會發現腸胃胸口隱隱作痛，肚痛肚屑三至四天。由皮膚到呼吸道，一直到脾臟，認為後遺症愈來愈重。但同時現場能夠頂耐咗催淚彈，因為懂得慢慢呼吸保持冷靜。

我認為不是以次數劃分現場濃度，而是警方使用哪個批次的催淚彈。所以每一次出去食的第一粒，已經會分到是不是比上次更濃。我曾於上環經干諾道西前往無限極廣場，找回落單朋友，當下沒有發射催淚彈，可能是十五分鐘前發射

了一輪，但瀰漫在空氣中的催淚氣體卻也足以令你眼睛刺痛、皮膚灼痛，於是我認為 7 月 28 日這一天的催淚彈濃度其實最高。



流鼻涕，眼睛刺痛，但是身體較容易復原。好似以前催淚彈爆開，不舒服可能維持十來分鐘才完全消退。現在可能我三四分鐘後眼睛就睜得開，呼吸就已經能調順了。以前後遺症會肚痛肚瀉，現在只瀉不痛。有次隔了一段時間無出去，但連續三日排出黑色糞便，大便次數頻密，於是再 tg [透過 telegram] 找了醫護手足查詢，沒有進行治療。

看醫生的情況：

沒有就醫，因為覺得應該會自然康復。相比四個月前，身體狀況改變：

對街道殘留催淚煙味道十分敏銳，在 尖沙咀行人隧道，區選兩日後 有時坐朋友車駛經某些公路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聞到，全車人都聞到。我會覺得空氣污濁，一去到旺角等地區就咳。呼吸的空氣不清爽，氣管會比較敏感乾咳，很容易就想趕快進室內。

心理作用，一般在街上，或在家都會覺得聽到大量示威嘈雜聲，例如大力撞擊、有人尖叫、警笛聲響。有時樓下可能係一班後生仔打波入球開心叫囂，我卻以為抗爭者退到我樓下出事了。另外有次聽見附近有女士尖叫爭執，以為是濫捕事件發生，不料是情侶爭執。在極其安靜的環境下，會自然響起示威的聲音。

(明週文化 2019-12-27)

這些充滿感官經驗和具身知識的故事，均指出了比起作為單次、短暫且稍瞬即逝的案件，催淚瓦斯已在跨越尺度、更深遠和廣泛的層面上，持續風化香港的都市環境，讓不同社區的居民有所感知和觸動，甚至親密地捲進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節奏當中。上述催淚瓦斯讓旺角街坊難以入睡、讓兒童、記者和抗議者出現不同類型的身體反應和感受，均表明都市環境本身如何遭遇大氣警戒的風化 — 其大氣物質性受到化學武器改變，城市既有的觸感和肌理消散於空中，取而代之的是催淚氣體持留的物質性與其多樣化的毒害形式，讓

人產生生理反應和感官與情感上共鳴，或是將這些性質體察為不和諧的背景噪音（noise）。這裡的「噪音」一詞，可對應 Navaro-Yashin（2012）對於戰後環境的情動分析，他指出，「環境本身對人類施加了某種力量，或者說空間、物質對象或環境中有某種超出人類想像的東西，這些東西產生了一種情動效應，被人類所經驗。」而「在研究戰後環境時，我探討『迷魅』（*enchantment*）並非作為一種正面倫理充能，而是作為被遷徙社群遺留物件所釋放出的詭異感」，這種詭異感即由環境和物質散發的煩躁不安、刺耳的感受，生成為一個充滿生氣的環境（Navaro-Yashin 17-21）。

我認為，Navaro-Yashin 有關現代廢墟空間具有迷魅性質的觀點，也適用於描述香港都市衝突的空間性質，與「風化」這一概念相通。近來，政治生態學者開始運用「風化」這個詞語，描述這些充滿生氣的環境與身體，如何因應大氣、水源、土壤、社會經濟結構等條件變化而生成和聯動。風化的過程涵蓋了自然與文化面向。在英語中，風化既有自然，也有文化的涵義。《牛津英語詞典》把「*weathering*」定義為「大氣作用或元素對暴露於其影響下的物質所產生的作用；由此作用所做成的變色、解體等」，卻在另一條目指出，「*weathering*」最初被理解為一種文化技術，出現在「諸如放鷹（通過訓練有素的鷹來追逐鳥類或小動物的運動或練習）、家務與農活（晾乾亞麻布、烘乾收割的作物）或手工藝（將黏土暴露於空氣中以製作磚瓦）的各項背景中」（Holzhey & Wedemeyer 2020: 14）。Holzhey（2020）指出，「*weathering*」的多義性，能夠黏合不同領域的異質經驗，並且提出有關能動性的模糊之處、系統動態的穩定、變化、崩解等問題。直到最近，政治地理學者也把對於「*weathering*」的討論和理論化工作，推展到大氣警戒與群眾抵抗的研究之上，例如 Joronen（2024）的案例研究關注以色列政府使用了催淚瓦斯、「臭鼬水（*skunk water*）」等武器實施環境控制與鎮壓，以及巴勒斯坦居民如何感知、調適當地毒害、煩躁不安的大氣/氛圍。風化的視角延伸了我們對於都市大氣/氛圍的批判性考察，即人與環境如何在社會運動的脈絡中聯動、互為改變和轉化。

在中文的語境中，「風」的語義同樣也是多重的，除了描述五行中的自然元素，在傳統醫學中具有轉化人體健康的能力（Kuriyama 1999；Choy 2011），也可以形容個人身處艱難環境的風骨、風度，或涵蓋社會文化層面的風尚（*fashion*）、風化（*reformation*）、風俗、精神（國士之風）等等。在政治思想史上，儒家傳統把風的元素化為一種禮教統治

論述，有吹佛、引導、攪動等意思：「在《論語》中，草和風是說明義政理論的教育性元素。『如果你渴望善良』孔子勸說道，『那麼老百姓就會變得善良。君子之德如風，小人之德如草——當風吹過草的時候，草肯定會彎曲。』後來，聖人教導統治者：『你是風，下面的人是草』，大德以其正直的榜樣來彎曲小德。對草和風的兩種描寫：對政治因果的兩種描寫。一個是風以其正確的力量吹拂著草，另一個是草和風作為兩個元素在一個永恆的和永遠變化的宇宙中一起上升。如此多的世界被吸引到這種大小事物的關係中，從這種關係中可以想像出國家和統治者的興衰」（Zee 2022: 171）。歷史學家王汎森（2014）則把「風」視為一種史學觀念或隱喻，指涉了超越個人的，時代文化的特質和歷史轉變。「風」的思維對歷史的了解有新的可能性。不以簡單線性的因果方式理解歷史。「風」是吹佛的，所以不一定侷限在一個範圍內作用，有可能是跨域的、關係性的、往復無限的運動。風的吹掠不一定有物質直接的接觸，有時是示範性的，彷彿性的作用，例如是制定了新的標準；有時則是「化」、薰習、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空氣」。對他而言，每一件歷史事件裡面都有「風」的情動效應，一個時代存在各種思潮、論述、資源的競爭，「小風」可能轉成「大風」，邊緣與主流的相互競爭是一種「連染」作用，是空氣之間的「感」（王汎森 2014：208-209）。



圖（十六）：「中大保衛戰」期間遭催淚煙霧襲擊的雀鳥
（窩窩 2019；轉載自網民 Mark Mak Facebook 貼文）

《明週文化》繪製的《香港地圖：催淚彈偏地開花》，圖文並茂地收錄和描述了各區出現催淚瓦斯的地理特點和影響狀況（參見圖（十七））。在馬料水，「警方於11月11日起數度圍攻中大，其後學生於校園內拾得共2356枚各式彈頭。事發後，聯合書院陳震夏宿舍的橋上發現藍翅希鵬的屍體，校園內亦陸續發現松鼠屍體。化學工程團隊的化驗結果顯示，無論是泥土還是樹葉樣本內的CS殘留量，都足以令皮膚致敏」；在佐敦，「彌敦道左右主要為商業大廈，內街多為住宅區及食肆。由警方將催淚彈直射到報紙檔起火，貨物與現金盡化成灰燼，檔主損失近50萬元」。在主要居民人口為基層市民和長者的深水埗，「內街樓宇密集，通風不良，還有大量劏房單位。8月1日，一輛的士停泊於桂林街，催淚彈曾擊中其車尾箱，繼而彈入一間粉麵店。8月5日，催淚煙湧入城大動物醫療中心的貓病房，當時留醫的多隻貓因而需要轉移到深切治療部避煙。不少醫護人員感到明顯不適，出現咳嗽、眼睛過敏的情況」；至於在香港西北邊的新市鎮元朗，「7月27日的元朗遊行，警方發射的催淚彈曾落入西鐵路軌，部分射上民居平台，並波及老人院。有短片排得安老院內咳嗽聲四起，職員驚慌失措」（明週文化2019-12-27）這些有關城市物質環境不斷受到毒氣風化的紀錄，均呈現了催淚瓦斯在都市各處——街道、樓宇、大學校園、商場等地方帶來了廢墟，財物和生命的損失、舊有關係的死亡和消散，都市的風化讓親歷者對政府的治理失去信心，對城市生活的前景感到擔憂，在香港形成了破壞與傷痛的地景。

可是，當我們考察那些更貼近抗議運動的大氣/氛圍書寫，似乎也會遭遇到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都市風化形式。「眼淚」在2019年的香港，除了是身體遭受環境刺激的生理反應或從內湧現的情緒表達之外，更是社會上劃分敵我界限或進行政治批判的標記。2019年出版的第59期《突破雜誌》，就以「催淚香港」為題，回顧了入夏以來被催淚煙包覆的城市：「催淚煙也許可以驅散示威，但以無制約的暴力止亂，結果是殺紅了眼，無限蔓延，帶來人不像人的悲劇……我們也探索黎明來臨前，香港人壯麗的连接，再當中察看社會轉化的線索。淚本是要流的，但不是來自化學武器，而是來自每個人為香港經歷之哀，為逝去生命的痛，為青年人、銀髮族、教牧、良心小店、每一個不甘心被噤聲的人的付出」（突破雜誌2019:7）。這種因香港抗議者之間彼此共在（看見權利被剝奪與反抗之苦痛）、集體暴露而留下眼淚的經驗，在後頁被用以對比香港治理者「目中無人的眼」（在其接受記者訪問企圖湧出淚水的表情、面對「警黑合作」的指控給出轉移視線的回答、指責示威

者「have not stake in society（并非社會中的持份者）」的眼神言語）：「催淚煙瀰漫全城，全城眼睛刺痛，特首林鄭月娥的一雙眼，卻是愈發被遮蔽。被傲慢所遮蔽，被自憐所遮蔽，被權力所遮蔽，看不見人了」（突破雜誌 2019：13）。另一方面，因催淚瓦斯攻擊而落淚的民眾，也與警察「殺紅了的眼睛」遙遙相對：「催淚煙瀰漫全城，嗆淚聲中，有一雙雙被敵意和仇恨遮蔽的眼睛。全港唯一合法武裝部隊，本應『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但這暑夏，他們卻在政權的保護下，越來越殺紅了雙眼，開啟了暴力的循環」，雜誌其後附上了一系列紀錄警隊執法時失控、違反最低武力指引，對黑社會襲擊市民視若無睹的時間線（突破雜誌 2019：14）。

在這些敘述當中，催淚瓦斯並非僅是形成破壞與傷痛的地境，而是在人們在毒氣的威脅當中重新找到希望與社群一同受難的複雜共感，例如這篇有關黃大仙社區的報道指出：「合法遊行集會越來越難，市民逐漸習慣如流水般在街頭四散。8月3日晚上，一小隊示威者從油尖旺『轉場』，先到九龍城遊擊、再往黃大仙警署外塗鴉叫囂，隨後又傳出有警察在黃大仙港鐵站無理搜捕市民，引來近千名居民群情洶湧落街聲援。踢拖街坊高呼『收隊』、『唔歡迎』、『放人』，一度迫退防暴隊，有人直指是反送中以來最『治癒』的畫面、『原來無 gear 的街坊先係最勇武』。然而下半夜，從警察宿舍掉落水袋等雜物，警察打長者、趕記者，街坊無口罩下被催淚彈圍攻，一時的喜氣又被憤怒掩蓋」（立場新聞 2019-08-05）。獨立記者和中大新聞系講師譚蕙芸也在其深度報導中，以「後巷共同體與元旦催淚彈」描述年末旺角大街喜怒交集的景象：「2020年和平的時間，只維持了短短幾分鐘。『呼』的一聲，遠處傳來了催淚彈的槍聲，群眾嘩然，從喉頭發出起哄的聲音，聲音裡流露出一種經歷了半年的老練：『果然，會開催淚彈。』不少人沒戴防具，於是爭相走避，記者都爭相湧到路邊，拍攝 2020 年第一枚催淚彈。警車繼續巡邏，有警員喊話：『若不想在羈留室過新年的話，快點走！』但人群還是退到後街，不肯走……以往，每踏入新一年，香港政府都會在凌晨零時零分於維多利亞港放煙花。那一幕象徵香港『繁榮安定』，今年因為反修例運動，不想人潮聚集而取消了。有人說笑，以往元旦的新聞，都會陳腔濫調地報導有媽媽誕下元旦嬰兒，今年零時零七分，香港警察，在旺角的夜空，以催淚彈宣告新一年伊始」（譚蕙芸 2020: 483）。

呼應這些身處大氣警戒中民眾多樣化的情動回應和抵抗敘事，本文認為風化遠遠不只是描述都市的環境和身體被化學物理力量改變的過程，更是涉及到構想不同行動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如何與環境的擾動發生關連。流水革命的動員能力、抗議群眾的情動能力和他們聚集的可能性，會因應大氣/氛圍的物質性和呼吸條件的變化而被增進、轉化或受限。根據 Holzhey (2020) 對風化的語言學分析，風化長久以來被視為一個多義且矛盾的概念，既涉及主動性又包含被動性。例如在 “I weathered the storm as the storm weathers me” (我承受著風暴，風暴也對我施加影響) 這個句子中，風化的概念呈現了主體與環境之間交互卻不對稱的關係性 (我對於風暴的承受，並不等於風暴對我的轉化作用)。對於主體而言，風化的語義多重性除了問題化了他對環境產生的積極影響 (或幻想) 外，也折射了主體在與環境交織而遭受影響的時刻，展現出一種身處曝露中的回應性 (responsivity)。也就是說，風化概念不僅描述了被動的曝露，而是同樣揭示了身體處於曝露狀態所蘊含的回應性潛力：「風化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被動性 這種被動性是在多個時間尺度及不同情況下，對於緩慢而瀰漫的劇變性變遷所進行的紀錄與忍受 (the invocation of ‘weathering’ also means to emphasize a certain passivity which cataclysmic change, often diffuse and slow (according to some time scales), is being registered and endured)」 (Holzhey & Wedemyer 2020: xiv)。社會理論關注這種主體對於風化的忍受，雖然會與傳統上有關能動性、主權、自主的理解保持距離，卻也可能圍繞著韌性和耐受力等概念，形成了新的政治和倫理學思維。

就本文的經驗案例而言，風化的概念能讓我們在催淚瓦斯的大氣警戒、病毒蔓延與抗議氛圍之間，看到都市環境、香港政府與群眾身體複雜且多層次的權力關係。在抗議活動和病毒感染的情境中，催淚瓦斯和新冠肺炎分別成為了大氣曝露性的具體體現，從而讓流水革命參與者的能動性和反應能力受到空氣物質性的影響而被重新定義。經受催淚瓦斯和病毒的風化 (儘管兩者對流水革命的政治影響和倫理意涵仍有差異，我將於本章結尾進行討論)，抗議者不得不面對曝露性所帶來的痛苦和限制，被迫重新適應和組裝主體與環境的互動方式，在種種限制中尋求與新的物理大氣和政治氣候共存 (甚而是通過共同呼吸反過來風化都市環境) 的應對之道。從破裂、消散到凝聚，從傷痛、忍耐到勇氣，這一切的風化如何發生？接下來，本文把焦點轉向論述與都市大氣/氛圍一起生成和轉變，那些寓居其間的抗議身體，追尋各種飄蕩於風中的線索。

4.3. 抗議的身體美學：儀式、疊歌與情感轉化

這裡呈現了一種輪廓 — 一種疊歌（反覆的節奏） — 其中某些令人震驚的事情迅速、毫無預兆地一次次發生。

Bertelsen & Murphie (2010: 143)



在風化中重塑時間和空間，亦即持續地重塑身體與世界之間的表面 (surfacing)。與大氣警戒和都市氛圍一起風化，意味著流水革命的參與者對於都市環境的轉變、社會運動和不停流轉的身體，都有敏銳的感知和覺察。另一方面，從「風化」具有訓練、技巧的意思來看，運動者並非只是被動地抵受國家暴力的壓制和分解，而是儘可能更積極地把對身體有害的化學元素和鎮壓的敵意，內攝、摺疊到隨著時間和抗議事件而變化的運動文化當中，這些身體動作、運動物品的持續湧現和拼裝過程，亦不斷改變著流水革命參與者介入都市氛圍的能力與其界限。以下，我以風化的概念與晚近興起的情動理論進行對話，並分析抗議案件目錄所呈現的社會運動動態之鉅觀變化和較微觀的豐富資料，以加深我們對於流水革命如何與國家暴力一起風化的理解。

女性主義文化理論家 Sara Ahmed 曾在《酷兒現象學 (Queer Phenomenology)》(2006) 中寫道：「畢竟，正是在迷失的狀態下，人們開始思索：究竟什麼是『定向』？我們如何通過與我們所處的地面特徵、環繞我們的天空，或者穿越地圖的虛線對齊，來開始了解或感受我們所處的位置，甚至是我們的去向？我們如何知道應該轉向哪個方向才能到達目的地？」(Ahmed 2006: 6)。若要知曉什麼是定向，或者我們最好是從身體「失去定向」的時刻開始思考。從這些失去方向、感到迷失的情境，我們更能覺察到此前覺得自然而然，現在卻已失去的究竟是什麼。在第三章，我已討論過在流水革命剛剛發生不久的 612 事件中，抗議者如何與催淚瓦斯這種時隔多年再度重現街頭的警戒媒介遭遇並交纏起來。特別是，《中信圍困日記》記述了許多抗議者與市民身處催淚瓦斯的有毒氣霧當中，所感受到的既親密，又疏離的悖論感受。刺激性的化學元素不斷侵襲抗議者的呼吸道和氣管，在身體皮膚內外留下可見與不可見的印記。大氣暴力的風化既是突然包覆並滲入身體，試圖把目標與恐懼綁定的一種逗留的鄰近性 (lingering proximities) (Joronen & Ghantous 2024)，同時也把抗議者他所抵達的歷史和場所中拋開，形成恐懼的時空破裂效果，迫使他們在瞬間成為

無所歸屬的裸命。在這些社會運動當中的惑亂時刻，身體只能暫時屏蔽或調整呼吸，握著同伴的手，彼此緊靠並動起雙腳。群眾通過身體移動和戰略行動，逃避催淚瓦斯和警察的空間封鎖。

通過抗議事件目錄（總共收錄了 1770 則抗議事件）的數據統計和資料研析，我在鉅觀層面上了解到流水革命在抗議實踐的活動類型、地點區域、發起者、參與人數等方面的歷時變化。對這些資訊進行統計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追蹤流水革命的和平 (peaceful)、搗亂 (disruptive) 和暴力事件的分別佔比，或者是在地理層面上，示威者如何將抗議從金鐘、灣仔這些傳統佔領區，漫溢到全港其他新興佔領區的抗議動態。因本研究的篇幅所限，要歸納以上所有數據和媒體資料，繪製出運動全貌，顯然是不可能的任務。在這一章，我將重點講述「身體美學 (somaesthetics)」類型的抗議曲目群集，包括抗議者透過不同方式、媒介、物件，因應不同事件和對象而在都市空間進行藝術、宗教、哀悼等與氛圍調節相關的展演和儀式。通過對這個群集進行考察，我將大致勾勒出流水革命的複雜多變的情感輪廓，捕捉抗議者如何與國家暴力一起風化。流水革命的時空節奏，在特定的環境脈絡下呈現為不同模式的抵抗行動。通過與都市環境、不同對象、物件、媒介和身體的親密接觸，這些情感的抗議實作這些凝聚集體抵抗的動能，重新編織和想像香港這座城市的過去與政治未來。

Shustermann (2008) 指出，身體美學是有關「批判性地培養我們如何經驗和使用活生生的身體，把它作為感官欣賞和自我創造性塑造的場域」(shustermann 2008: 1; 引用自 Diaconu 2019: 39)。Crippen (2019) 將身體美學的概念延伸至慶典和抗議等經驗領域，認為這些身體美學運動展現了圍繞著都市結構的身體和經驗的協調，有著創造性地把傷害轉化為異議勳章 (badges of dissent) 的作用。而且，它們也是圍繞著特定的文化和政治關注而組織起來，這些關注透過身體而具有情感和生理的維度 (Crippen 2019: 89)。這些構想都與 Ahmed (2004; 2006) 的身體現象學不謀而合，即身體在反覆遭遇和接觸其「對象」(不只是指物理和物質性的對象，也涵蓋想像、價值、行為、風格和抱負) 的過程中，逐漸形塑其具有情動意向性的取向。這些取向註記了對象的接近性和遭遇方式，同時進一步塑造了哪些對象會接近身體，那些會被遠離、推開、排斥。被情動黏著的對象，通過在社會上傳遞和流通 (circulation)，累積了其情動價值和道德評價，甚而是從重複的情動遭遇中產生了慣習，塑造個人與社會、身體與世界之間的表面 (surface) 及其肌理。在抗議政治事件當中，

身體行動和取向的建立，也創造了社會運動的方向線 (lines of direction)，這些線條形塑了抗議者與周遭事物的感知和情感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取向是否排列對準 (align)，從而產生具有情動指向性的倫理關係與行動 (Campos Medina & Jaureguiberry Mondion 2021)。



圖（十八）：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

（蘋果日報 2019-06-06）

2019 年流水革命中，身體美學的集群包括抗議者透過不同方式、媒介、物件，因應不同事件和對象而在都市空間進行的藝術、宗教、哀悼等展演和儀式。事實上，在 2019 年 6 月，當流水革命還是處於相對和平的階段 (根據目錄顯示，當月的「和平抗議事件 (peaceful events)」為 59 起，「擾亂性事件 (disruptive events)」為 21 起，「暴力事件 (violent events)」為 0 起)，示威者已經廣泛採用不同的身體美學實踐，向公眾傳達對於香港政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的不滿。社會不同界別的成員以他們特殊的方式走上街頭，例如 6 月 6 日由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連同 20 名法律界特首選委舉辦的「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有約 3000 位律師、法律從業員及市民參與，從中環終審法院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期間遊行隊伍全程靜默，並面向政府總部靜默三分鐘，代表不向政府低頭。參與者當中亦不乏西裝革履之穿著者，以突顯其專業人士和社會公信力的形象，對比香港政府的「失信於民」(蘋果日報

2019-06-06) (參見圖 (十八))。在 6 月 9 日 100 萬人大遊行的前夕，有區議員以騎單車遊行，沿途廣播和派發傳單的方式，為民陣大遊行活動宣傳 (立場新聞 2019-06-05)。其他的宣傳手法也有政治、學生團體在全港各區開街站、集體展示照片組成《集氣民主牆》，以及大專生以身穿囚衣、掛上罪狀及綁上鐵鍊的扮裝遊行到中聯辦，發起團體 (工學同行) 發言人表示「即使不參與政治的人，亦有可能在中國差劣的司法系統下，成為階下囚，沒有人可以在條例中獨善其身」 (蘋果日報 2019-06-09)。

基督徒是當時發起抗議活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團體類別。6 月 9 日當天，大量年青示威者在大遊行後留守金鐘，並與警方發生衝突。至於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則「發起一連三晚的祈禱會，於政總外集合禱告唱聖詩，約 400 名基督徒響應號召 多麼人士亦在連儂牆外唱聖詩，分享經驗，教人用聖經面對反修例」 (蘋果日報 2019-06-10) (參見圖 (十九))。在場觀察的記者描述該集會「秩序良好」，受訪的參與者則認為，參與百萬人遊行後政府仍然倉卒修例，不理會社會聲音，讓他有一種無力感，希望通過唱聖詩來「尋求神的指引」 (蘋果日報 2019-06-10)。6 月 9 日以後，持續有宗教團體和信徒在中西區和北區舉行祈禱會，進行禱告、分發白花、齊唱聖詩。將宗教的話語和結合於抗議的表達，結果是極具創意，且有著轉化情感的作用。中信圍困事件 (見本文第三章) 後一週，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在發生地點附近舉辦了合唱聖詩的祈禱會，協助身處其中的抗議者疏導情緒 (立場新聞 2019-06-19)。6 月 12 日警方在金鐘清場期間，曾有警員「向公民廣場參與祈禱會的信徒作出挑釁，對信徒喊話：『叫你耶穌落嚟見我！[叫你耶穌下來見我]』」 (蘋果日報 2019-06-14)。兩天後，約 100 名信徒隨即自發在添馬公園舉行「叫耶穌落嚟」祈禱會，在草地唱聖詩，祈求「免於恐懼，在絕望中看見希望」，把警察的羞辱轉化為鼓勵持續抗議的憤怒、幽默等情緒能量 (蘋果日報 2019-06-14)。抗議現場基督徒的歌聲也是流動的，甚至感染了其他不一定是信徒的示威者在金鐘的天橋集結、面對警察高唱廣為人知的聖詩《Sing Halleluja to the Lord》。一位匿名的香港基督徒觀察者評論道，「詩歌是基督徒遇強越強的進化曲 是我們在混亂中聽到的號角聲 是我們向惡者宣示耶和華主權的旗幟 詩歌頌唱是最溫柔的抗爭行動之一。」 (Matches 2021: 28) 事實上，我們不用假定唱聖詩的人都分享這種結合靈性思維的抗議主體性 試圖用聖詩「感化警察」。

抗議者在香港的公共空間高唱聖詩的行為，也有其殖民歷史脈絡和務實考量³。在香港的《公安條例》下，任何聚眾集會都要向警方事先申請，為了不被當作違法聚眾，民眾舉辦「宗教活動」是其中一個可以規避警察即時驅趕的例外狀況。



圖（十九）：基督徒政總外集會唱聖詩反對逃犯條例修例
（蘋果日報 2019-06-10）



圖（二十）：615 梁凌杰墮樓前站在太古廣場 4 樓平台外牆
（明報 2020-03-07）

³ 同一時期也有佛教儀式的集會和誦經活動，例如 6 月 15 日的「103 萬遍六字大明咒念誦」和 6 月 16 日的佛教徒集會，皆由網民發起。



圖（二十一）：616「200 萬 + 1」遊行參與悼念梁凌杰活動
（自由時報 2019-06-16）

流水革命中帶有宗教、神話意味的身體美學實踐，也與悲傷、憤怒、哀悼等情緒密切相關，尤其是當運動開始出現政治殉難者的時候。在 6 月 16 日民陣遊行前夕，梁凌杰穿著背上寫著「林鄭殺港，黑警冷血」的黃色雨衣，在金鐘太古廣場的臨時工作平台掛上橫幅（寫著「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其後從高處墮下（香港 01 2019-06-15）（參見圖（二十））。該事件引發廣泛的公眾反應和紀念活動。大批民眾在遊行後到墮樓位置獻花悼念，寫下悼念字句、放下白花鞠躬，在附近肅立，也有市民掛上彩色紙鶴和寫上「God bless」紙牌（蘋果日報 2019-06-16）（參見圖（二十一））。學生團體亦在太古廣場發起悼念活動，「大批市民齊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少經過的遊行人士加入，形成多重唱」（立場新聞 2019-06-16）。

梁的墮樓事件作為流水革命其中一個激發香港民眾強烈反響的情動標記，透過現場圍觀的群眾和大眾媒體的傳播，引發了複雜而強烈的疊歌 (refrain) 效應 (Bertelsen & Murphie 2010)，其隱含的美學意義、不斷增幅的強度與充盈的倫理意涵，在多個層面和具體時空開展出多個新的事件、抗議表達、論述、情緒和感覺，身體觸動與被觸動的能力一交織為新的社會氛圍。6 月 16 日，民陣宣布有「200 萬 + 1」位市民參與遊行，並指當中的「+1 人」是梁凌杰（自由時報 2019-06-16）。就如這個「+1」的符號所顯示那樣，梁的政治影響是隨時間持續疊加和重複的。在這位被稱為「義士」(the righteous) 逝世後的「頭七」、

半週年及其後幾年，均有網民發起或市民前往太古廣場外聚集悼念；作為一個介導和組織群眾情動能量的儀式框架，這些活動會與當時流行的抗議元素疊加起來。例如在隔年的3月7日(梁的「生忌」)，網民發起悼念，約150人參與，「晚上7時陸續有人到太古廣場獻花、點蠟燭、叫口號和唱《願榮光歸香港》，部分人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旗幟」(明報 2020-03-07)。在梁逝世後一週年，肺炎肆虐的香港，仍有大批市民不顧官方發布的「限聚令」和警方現場的警告廣播，在金鐘排隊悼念。「傍晚6時，太古廣場外一帶有數百人身穿黑衣，繫上白絲帶及排隊獻花，人龍延伸至高等法院。連結太古廣場及金鐘廊的天橋亦具滿黑衣人潮，同時有近百人聚集太古廣場中庭叫口號」(明報 2020-06-15)(參見圖(二十二))。據該則報導描述，這些參與者都從梁的事件中獲得了不同的精神啟示。例如有位母親稱「聽到梁凌杰父親發布的錄音，感受到『切腹之痛』，覺得我們更加不可以放棄。她說一年來仍不懂如何向兒子解釋梁凌杰去世，但會陳述事實希望兒子思考，亦會帶他參與示威」(明報 2020-03-07)。一位化名V的示威者則「在梁凌杰的祭壇前，身穿黃色雨衣，戴上V煞面具默站，手上拿著『永垂不朽』的紙牌。他表示去年看直播畫面，心情非常焦急，『所有事都好似只是昨天發生』，自己的裝扮代表會記住梁凌傑；對於日後的抗爭，不想見到有『手足』傷亡，但仍會支持激進示威，『因為這代表反抗精神』。」(明報 2020-06-15)。



圖(二十二)：梁逝世一週年，金鐘太古廣場外有大批市民聚集
(明報 2020-06-15)



圖（二十三）：在台北中央藝文公園，在台港人與台灣民間團體
發起聲援流水革命及悼念梁凌杰活動
（自由時報 2019-08-11）



圖（二十四）：溫哥華民間團體舉辦「催淚彈聖誕樹」及追悼梁凌杰活動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19-12-17）

不同示威者參與悼念活動的自我表述，均註記 (register) 了流水革命各個階段在個體之間具有差異性，卻也共同享有、持續疊歌的悲憤時刻。類似但有些許差異的悼念活動也在海外發生，例如 2019 年 8 月 11 日台灣民間團體和在台港人於台北中央藝文公園舉辦「人體排字」聲援香港，「約 300 位民眾參與，排出 FREE HONG KONG 的英文字，並將悼念香港義士梁凌杰與台灣圖樣排列其中」(自由時報 2019-09-11) (參見圖 (二十三))。同年的 12 月 17 日，加拿大多個民間團體也在溫哥華市中心天車站外舉行梁的追悼活動，期間「播放有關香港抗爭活動和警方濫用暴力執法的影音、鼓勵他們共同參與製作一顆『催淚彈聖誕樹』，公眾與義工一起在聖誕樹上掛起千多個紙製催淚彈，以譴責港警濫用催淚彈和表達對香港抗爭的支持」(加拿大星島日報 2019-12-17) (參見圖 (二十四))。這些例子顯示，在個人和組織參與悼念儀式的事前準備、期間的聚集、默哀、見證、歌唱，與事後共同製作和反饋，均發揮著持久的抗議情感轉化和疊歌作用，讓政治情動的強度在城市之間來回擴散、共振和聯動，把各地的抗議身體、物件、論述等對象，重複性地在類近的情境中彼此組合和對齊。

類似的迴旋動態，也可以在圍繞著 2019 年 9 月的陳彥霖、11 月的周梓樂這兩位年輕抗議者逝世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觀察到。甚至乎，當示威者與警方衝突愈發升溫，防暴警察多次把地區祭壇的拆除、清理的行動，也引發了周邊抗議者、市民的憤怒，指罵在場警員，並在警方離開後重新設立花壇和祭拜 (蘋果日報 2020-01-21)。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地區的悼念活動也經常連帶著周邊街道的堵路、破壞公共設施等行動 (例如 2020 年 1 月的「梓樂逝世兩個月悼念會」)。Bertelsen & Murphie (2010) 指出，這些看似微小的政治事件開啟了一個持續湧現的過程，讓被捲入其中的多個主體產生他們各自的論點、意見和判斷。同時，疊歌也是一種力量的聚集 (gathering of forces)，通過在政治的視界引入新的事件，從而產生挑戰既有形式的政治機會與新的表達方式 (Bertelsen & Murphie 2010: 145)。在香港，「義士」殉難的訊息跨越媒介和空間往社會擴散，也進一步形塑出特定的時間輪廓。市民和抗議者們從突如其來的消息中受到震撼、感到驚訝，隨著時間喚起的悲傷、哀悼情緒，在悼念現場氣氛緊張與輕鬆，憤怒、無聊與平靜的張弛、以及其後綿延的日復一日，嵌入日常生活的祭壇維護、點燭習慣，均在主體經驗與身體之間的微觀層面上，產生持續徘徊、過渡性的情動強度、倫理判斷和再社會化過程 (有關圍繞祭壇的日常維護與衝突，見譚蕙芸 2020: 523-527；立場新聞 2020-03-11)。

當我們談到歌唱和疊歌，也就不得不提及一首在流水革命中冒起，甚至被稱為「香港人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該抗爭歌曲由一群連登網民自發創作，並在網絡和抗議現場廣泛流傳、播放和傳唱。在 Youtube 網站上，我們不難找到同名的不同版本歌曲及影片，例如是創作者(化名 Thomas dgx yhl，下稱 Thomas)以音樂錄影帶(music video)形式上載的《願榮光歸香港》初版(超過 408 萬觀看數目)，配合歌詞剪接了民眾帶花悼念、警察舉槍、遊行「分紅海」、元朗黑幫攻擊示威者、全港人鏈活動、抗議現場的催淚煙等最引人注目和深刻的畫面(Dgx music 2019-08-31)。其它知名版本還有剪接了海外各地撐港遊行等聲援活動的《多國合唱版》(獲得 110 萬觀看數)(Dgx music 2019-09-25)，以及在(模擬)催淚瓦斯氛圍下演奏的《中樂合奏及合唱團版》(由「一群喜愛中樂、喜愛唱歌的真香港人」發佈，獲得 100 萬觀看數)(ChiMusic HONGKONGER 2019-09-30)，以及《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版》(由一群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發佈，獲得 28 萬多觀看數)(BCgame Channel 2019-09-12)(參見圖(二十五))。值得一提，這首歌源自該創作者想要介入街頭運動的抗議美學風格，他感覺「過去社運街頭不時響起的《海闊天空》、《光輝歲月》，不是不動聽，卻總有格格不入。兩首都偏向流行曲，雖然能引起大家共鳴，但旋律上不是很可以配合現場的氣氛」(立場新聞 2019-09-12)。雨傘運動後，一些香港的社運人士對運動中的歌唱行為表達不滿，甚至批判「在社運現場演唱像《海闊》這樣的歌曲是『左膠』行為，音樂行動被貶抑」(楊有仁 2019-09-12)。Thomas 認為，「一首理想的抗爭進行曲，旋律應該類似於古典音樂，對正重拍的節奏感歌唱才配合，」故此他參考了巴洛克時期的古典音樂和一些現代的軍歌與國歌，用兩個月時間創作出一首「簡短、樂句清晰、旋律分句明確、節拍均衡」、易於記憶的曲目，並在訪問中表示：「香港人的民族性，不想俄羅斯戰鬥民族那麼激昂，有一點似英國人的莊嚴，但又沒有他們那種古板，更似是兩者混合，因此《願榮光》開首的旋律較為莊嚴，後面因為公義、自由、民主去發聲，變得較為激動」(立場新聞 2019-09-12)。除了風格、音調和旋律，歌詞的編排本身也具有轉化情感的意圖。據他解釋，第一小節⁴表達了香港繁榮安定的表面之下，對於不公義的揭露和權利的剝奪，以及香港人期望恢復自由、平等、公正這些政治價值的盼望；第二小節⁵形容了反送中運動的概況，「遇到不公

⁴ 「何以這土地淚在流 / 何以令眾人亦憤恨 / 昂首具默沉吶喊聲響透 / 盼自由歸於這裡」

⁵ 「何以這恐懼抹不走 / 何以為信念何以從沒退後 / 何解血在流但邁進聲響透 / 建自由光輝香港」

義的情況，即使流血，甚至有人獻出生命，大家都要站出來」；第三小節⁶歌詞「跟其他特別不同，主題是身處黑暗時期仍要繼續前進」；第四小節⁷則是「展望未來，希望光明重臨香港」（立場新聞 2019-09-12）。



圖（二十五）：《願榮光歸香港：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版》截圖
（BCgame Channel 2019-09-12）



圖（二十六）：中學生參加聯校人鏈活動，以歌聲、裝扮和手勢抗議警方暴力
（自由時報 2019-09-13）

⁶ 「在晚星墜落徬徨午夜 / 迷霧裡最遠處吹來號角聲 / 捍自由來齊集這裡來全力抗對勇氣智慧也永不滅」

⁷ 「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 / 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 / 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 我願榮光歸香港」



圖（二十七）：抗議者於中環地標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商場舉辦歌唱活動
（自由時報 2019-09-13）



圖（二十八）：世足外圍賽香港對陣伊朗隊的比賽中，賽前球場響起中國國歌，
數千名香港球迷轉過身，以噓聲淹沒歌聲，並揮舞代表抗爭的黑紫荊旗
（紐約時報 2019-09-16）

正如 Abu-Lughod (1990) 指出，詩歌作為社群成員表達情感的有力話語，與權力博弈和隨著歷史變遷的社會階層系統運作有關。它們在特定的社會情境被部署，成為一些弱勢群體挑戰社會秩序與政治權威的表達方式。作為一種反抗的論述實踐，《願榮光歸香港》的文字和旋律串連了不少能勾起閱聽人的記憶，以及抗議者身處當下事態能夠意識到的政治符號與政治情感。這首歌曲在八月末於網路和串流平台上發佈後，瞬速跨越空間和媒介，甚至滲入到不同抗議現場，形成凝聚人群共同呼吸的旋律，引起身體間的共鳴共振。翻查抗議案件目錄，在 1158 件和平抗議案件當中，就有 286 項包含唱歌的活動，其中大部分都是示威者以合唱、播放和演奏的方式演繹《願榮光歸香港》。如同上述，抗爭歌曲的傳播，主要透過被眾多身體和媒介（例如是附著於示威者背包的電子廣播器和麥克風，或是在地區的連儂牆、商場以鋼琴、小提琴、二胡等傳統樂器演奏）進行頌唱和記憶，也為抗議參與者的經驗賦予具有情動強度的時間輪廓和可辨識的情感註記，因此在和平類別的活動中極為普遍。

《願榮光歸香港》8 月 31 日經網路發佈後，旋即在一週後於由多間中學、大專學生團體於全港各區發起的「9.9 聯校人鏈活動」中（參見圖（二十六）），開始被部分示威者採用，取代了此前經常出現的《海闊天空》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成為了流水革命裡最受歡迎的歌曲。這首歌曲通常會於其他的身體美學實踐「黏著」起來一同出現，例如在黃昏和夜晚時分，群眾會邊唱邊高舉手機燈光，在街頭營造閃爍的美學效果；也有在學校外圍發生的人鏈活動，一些學生會高舉手勢（例如是高舉五指，象徵「五大訴求卻一不可」、帶上頭盔、豬嘴、眼罩、繃帶、標語文宣等象徵警察暴力和流水革命的抗議物品，在校外組成人鏈，由學生代表宣讀聲明、高呼口號、合唱校歌和《願榮光歸香港》。

根據目錄的統計分析，在 9 月到 10 月之間，無論是整體抗議事件 (251 起) 還是暴力事件數目 (31 起)，皆有顯著的升幅。8 月 31 日的太子站襲擊事件發生後，隨著街頭衝突和警方鎮壓升溫，抗議者也充分運用到香港連結各區住宅和交通的商場空間、球場和地鐵站口，在晚上、假日人流匯集的時刻，進行和平方式的集結和動員。由於網上流傳當天出現了死難者，9 月 10 日晚上，大批市民帶同白色鮮花，聚集在港鐵太子站前默哀，又在鐵閘掛上燈籠、設立花壇、焚燒祭品和撒溪錢，據報道，「有熱心人士印製《願榮光歸香港》歌詞，派發在此市民。踏入 8 時 31 分，現場播放《願榮光歸香港》，在此市民隨音樂高聲和唱。合唱完畢，市民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口

號」(蘋果日報 2019-09-11)。同時，網民一年三日在中環、大埔、將軍澳、黃大仙、馬鞍山、葵芳、上水、荃灣等地區發起商場合唱活動，每地參與人數從數百到兩千人不等(目錄共計算了 22 起)。從當時的新聞報道和 Youtube 上廣泛流傳的現場片段可以看到，活動在多個商場的中庭舉行，記者、歌曲播放者或樂手帶同自製直幡與廣播器材佔據中庭中央，四周擠滿黑壓壓的群眾，圍成一圈並面向彼此(參見圖(二十七))。合唱和微觀的人權也延伸到商場二、三樓面向中庭的廊道上，玻璃欄杆也被臨時掛上大幅的抗議標語和旗幟，與匯聚中庭的群眾彼此可見。這些景象串連成一幅向公眾和抗議社群內部展演的都市奇觀，以 Wall (2020) 的語言來說，這些集體歌唱行動和可視為一些操演「人民權力」的群眾政治技術 (political technologies of staging “the people”)，「群眾抗議具有非常不同的情感動力學。它會產生氛圍，展示即時的橫向身體交流、集體運動、情緒、舉止和節奏」(Wall 2020: 4)。

商場合唱通過群眾身體的重新排列和編排、其情感動力與眾多身體及建築環境的氛圍彼此調音 (attunement)，形成了一股不能低估的感染力量。從殖民到後主權移交時期，供應全天候空調的大型購物商場因全球資本主義而在香港各區興起，擔當奢侈品、零售等經濟產業和大眾交通的樞紐。這些在日常生活裡旨在加速商品和消費風尚流動的資本主義空間，在整個都市都陷入抗議動盪時期而被轉變為「再政治化」的場所。有都市研究者則認為，這些一波波的行動「顛覆了許多約定俗成的城市與社會功能，包括公共空間過往的治與意義……自發性的集會隨機的在一些非典型的公共空間中開展，像是商場、地鐵站，甚至機場，而天橋、地下道，甚至是高速公路的基柱，也都成了連儼牆的畫板；這些在日常生活裡，過渡性或是難以有清晰定位的公共空間，在這場運動裡，反而成為承載集體意見表達、功能強大的交流場域……香港的購物商場也經由公民自發性的行動，被賦予新的角色和功能」(侯志仁 2020-01-10)。

本文同意侯志仁的精闢觀察，但需要補充的是，這些「越界」與「入侵」資本空間的行動，促進市民間進行情感與意見交流的公共性，都是由群眾運動的韻律、情動強度狀態的轉變，以及氛圍的音樂性所觸發。正如人類學家 Time Ingold (2016) 問道：「沒有了氛圍，建築還能存在嗎 (Can there be architecture without atmosphere)?」Ingold 認為，現代的建築學把活生生的人類所呼吸的空氣，反轉為封裝氣體、濃度、溫度、濕度、亮度等數值，由物理學、化學與光學等科學調節的死寂環境。而活的建築 (a living architecture) 必須要回

歸至氛圍的討論，建築除了是固著的結構支架，也是由「空氣、光線、聲音和情緒氛圍所構成的物質性」(Ingold 2016: 163)。在消費主義經濟當中，這些分層化的建築氛圍營造與介入措施，被稱為感官和情動氛圍的工程 (engineering)，旨在通過嗅覺、視覺、聽覺等多感官刺激、耦合和包覆 (envelopment)，配合數位平台上模擬，從而在實體空間引發顧客的情緒反應，進一步增強購物的愉悅感和購買意願。Healy (2014) 指出，商場氛圍和空調技術試圖製作各種新的舒適感性 (comfort sensibilities)，打造讓消費者能夠平滑移動、容易且毫無牽掛地購物的空間。沈浸其中，商場氛圍的舒適感和輕盈感，逐漸形塑出對準商戶櫥窗和商品的購物取向，讓消費者的身體變得不由自主地自願購買 (Healy 2014:39)。由此，這些實體空間、非自願性、感性和消費文化便裝配起來，協同地構成促進商品經濟與資本流通的情動複合體 (variegated affectual complex) (Healy 2014: 40)。

在香港，這些促進消費的建築氛圍介入經常涉及到吸引大量急於競逐的消費者，製造大眾對於商品的期待、稀缺、和需求，群眾在假期和節日蜂擁至特定商戶搶購或消費、門外長長的人龍，經過報導迅速傳播，勾起更多潛在顧客的感覺和慾望。有趣的是在流水革命期間，這些建築氛圍的裝配受到示威們即興的寄生和操作，把在酷熱盛夏也能夠留住人群逗留的空調技術，運用臨時湊合的器材和身體美學，為周遭的群眾疊加上新的感官刺激和氛圍包覆，改變了它們自身被預設和管理的社會功能組織。在這些時刻，商場一個個身體之間的情動力量被轉導 (transduct) 至前所未見的方向，其強度推翻，並轉變了該空間的符號和話語秩序，讓新的生命模式得以重新組織和就位（對於「情動力量之轉導」概念，請參見 Bertelsen & Murphie 2010: 139-140）。

Wall (2020) 指出，社會「動盪的狀態對主權部署來說，是一種界限情境，它是一個使到『受到主權依賴的平和寧靜慣習關係』開始瓦解的時刻。這使得動盪成為一個特別有用的透鏡，方便我們可以看清主權——它讓我們對於那些『被中斷的關係』變得敏感。它引出發我們注意到『主權秩序的平凡情動』、『人們對於主權的慣習服從』，以及『公共秩序』的情動面向」(Wall 2020: 1)。流水革命中反覆的疊歌，在臨時和暫時組織起來的群眾之間按，產生了共同越界的經驗。這些事件構成了國家主權情動秩序當中的痛點 (sore points) 或是轉化點 (conversion points) (Ahmed 2010: 38)。在實質空間中發聲，展演不同的政治行動、姿勢和情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至關重要。這些通過身體共同現身所喚起的

情動轉變時刻，擾亂身體既有、日常經驗的過程「解構了個人信念和習慣性的自信，並有時會引發個人危機，進而創造了一種『認知分歧』的形式：這是一種在我們習慣情境中應用的判斷和分類反射的暫時中止，為迷失方向 (disorientation) 和重新定向 (reorientation) 的可能性打開了大門」(Campos Medina & Jaureguiberry Mondion 2021: 9)。大批群眾聚集每晚在眾多地區的大型購物商場聚集合唱《願榮光歸香港》，正正代表著在警民衝突和警察暴力愈發加劇的背景下，越來越多香港市民被捲進運動的疊歌過程，在這些侵入日常秩序的「民現」情境裡，持續受到觸動、反饋和重複，獲得政治意識的覺醒。主權「平常」的情動公共秩序，被流水革命喚起的另類情動公共秩序所替代。

除了在商場等日常的公共空間，中國的國家主權在公眾場合和典禮上也一再受到示威群眾挑戰。流水革命的浪潮從街頭蔓延至球場，例如在 9 月 10 日舉行的香港對伊朗足球世界杯外圍賽，當大會播放中國國歌時，數千香港球迷「轉過身，用噓聲淹沒了歌聲」(紐約時報中文版 2019-09-16) (參見圖 (二十八))。儘管警方在大球場外「架起大量鐵馬，排出 30 多名警員駐場戒備 大批身穿紅黑衫或港隊球衣的球迷晚上 7 時在港鐵銅鑼灣站出發，沿途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遊行至大球場。他們分別在進場前及開波後高唱一次《願榮光歸香港》，並在中場休息時築起人鏈，以表達對示威者及港隊的支持」(東網 2019-09-10) 正如 Jack (2021) 的狂熱球迷民族誌顯示，群眾行動是實現社會共同體的展演媒介，通過召喚高亢的抗議氛圍，將參與的身體置於直面國家的衝突當中。在主場觀眾聲勢浩大，淹沒其他聲音的聲浪中，呼喊和低音鼓的脈動在肺部之間迴盪，會聚成一些社會化過程和公共表達的「情動—話語」地勢 (affective-discursive terrain of socialization and public address) (Jack 2021: 499)。香港球迷「轉身背離中國國歌」、邊邁步前往球場邊一起高唱《願榮光歸香港》，其政治意圖和意義是極其明顯的，群眾拒絕接受中國國族意識形態召喚為順從的臣屬，把主權的風格類型切換 (switching sovereign genres) (Wall 2020: 32)，讓本該「嚴肅起立」的主權情動氛圍 (也具身化為大球場外監視和遏制民眾行為的警察) 轉變為強烈共鳴的抗議 (漫天的噓聲)，並把現場情緒的強度重新轉導至演繹人民權力 (power of the people) 的群眾展演之上。這些為《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和高唱《願榮光歸香港》的人們，感受到什麼樣的情感？是對於自身與群體的政治權利和政治身分被剝奪、貶抑而產生的憤怒？是對於北京收緊對港控制和對異議聲音加強壓制的蔑視？是作為新生國族的成員，聽到家園呼召的歸屬感與集體自豪感？同樣的戲碼在 11 月 19

日香港對柬埔寨的比賽上再度上演（在場球迷回應了網民發起的「願贏波歸香港」活動）。無論如何，我們從抗議事件目錄的統計中得知，在示威行動極為密集地發生的九月⁸和緊接其後幾個反抗情緒高漲的月份當中，這些群眾合唱的歌聲已深深嵌入到整個抗議動態的韻律，連同其他與之相關的運動風格、物質和媒介，形成一套穩定的情動實踐（affective practice）。作為培養共同呼吸的方式，這些身體美學在特定的場所（例如是商場、街道、球場），組成了大氣警戒之外，異議性的，且具有逗留的鄰近性的空間，持續地促進、形塑流水革命參與者的身體表面與發聲能力。

4.4. 病毒蔓延：持續擾動的都市環境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首次被發現，並在 2020 年初迅速傳播至全球，演變為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疫病。新冠肺炎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 2 型（SARS-CoV-2）引起，該病毒的潛伏期平均為 5 至 6 天，但可變動至 1 至 14 天，偶有病例潛伏期達 24 天。而且，無症狀或輕症感染者仍具有傳染力，這對於政府公衛部門進行大規模人口篩查和控制，均造成巨大挑戰。新冠病毒除人際傳播外，亦可通過被污染的物體表面短暫傳播，大大增加了疫病防控難度。在感染速度方面，相比於以往的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新冠肺炎病毒傳播更快，確診數更是 2003 年 SARS 疫情的數十倍以上。疫情期間，新冠肺炎的病原體經歷了多次變異，傳染性逐漸增強。

隨著疫病的爆發和反覆變化，人們也注意到病毒與人類世的氣候變遷和區域性的天氣條件一起風化，帶來複雜的環境效應。有研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與氣候、天氣變數之間存在某種關連。例如，天氣條件如低溫和高濕度可能增加新冠病毒的存活時間和傳播速率。強風加速了病毒的氣溶膠顆粒在空氣中的擴散（Menebo 2020; Tosepu et. al. 2020; Chen et. al. 2021）。空氣質量和污染也在影響病毒於都市環境傳播的方式。環境污染水平較高的地區，更容易受到疫情影響，污染物如懸浮顆粒可能攜帶病毒，使之在空氣中停留時間更長，增加人群感染和死亡風險（BBC 2020-04-20；Marazziti et. al. 2021; Amnuaylojaroen & Parasin

⁸ 從抗議案件目錄的統計數據中可見，第 29 週（2019/09/02 -09/08）和 30 週（2019/09/09-09/15）為事件數目的峰值，分別為 120 起和 117 起。

2021)。透過空氣傳染的新冠肺炎病毒，也與氣候變遷引起的極端天氣事件產生聯動。長期的地球暖化、氣候乾旱或頻繁的降水變化，可能使病毒更易適應不同環境條件，讓傳染性病毒的演化和傳播更難預測（Ching & Kajino 2020）。疫情期間，空氣污染因人類活動的降低而顯著減少，提供了政策制定者重新審視氣候變遷和污染控制的契機（Rahman et. al. 2021）。不少報導提到了封城在全球各地帶來空氣品質改善和藍天（BBC 2020-03-28 ;2021 ; 06-01）。

然而，新冠肺炎的風化效應並不止於與氣候變遷和天氣聯動的面向，更是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條件與氛圍產生深遠影響。作為易於透過空氣、飛沫傳播的嚴重病毒，它在全球各地產生大規模的空氣震裂（airquake）。在疫症肆虐，確診病例急升的地方，大氣變得極度不確定，危機四伏。例如被媒體描述為新冠肺炎的震央，恍若圍城的武漢（及其後亞洲、歐洲各城市），整個城市的空氣中充斥著不安和焦躁的情緒。中國官方為了控制疫情，在當地建立的地方「方艙醫院」接收全市確診病患，卻遠非患者想像中的諾亞方舟。例如中國文化博覽中心的方艙醫院，最大的區域佔地九千平方公尺，「約有一千張病床整齊地並排著，顯得極為壯觀，也讓到醫院求醫的確診者產生密集的恐懼感」（報導者 2020: 65）。在全球其他受到新冠肺炎重擊的主要城市，堆積如山的病床和屍體溢出了醫院和火化場，挑戰著城市公衛基礎設施的量能。「空蕩蕩的街頭」成為了異常的日常風景，既有習以為常的物質與社會關係被風化而消散（BBC 2020-03-28）。人們被迫改變以往的生活、工作、消費、社交等習慣，戶外移動大受限制，比起面對面接觸，更依賴於線上的交流方式。疫情中，每個城市、社區、家庭也透過隔離設法減少、禁止人員的流動，防止「外來」和「內部」的空氣互相混合，引致病毒交叉傳染。另一方面，疫情期間在密閉空間裡的隔離生活，亦會引發異樣的情感效應，除了激發了人們對於與他人親密性的渴望，也加劇家庭暴力、性別暴力等問題。長時間隔離的經驗也帶來了焦慮、抑鬱和倦怠等感受。新冠肺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的不均衡分布，也反映了既有的種族、階級等社會結構不平等和經濟差距。口罩和消毒物品成為了政府和市場都難以確保足夠供應的稀缺資源。大流行迫使人類重新想像自己身處的世界，審視與彼此和其他物種共存、發展的方式。

新冠肺炎引發全球大流行，至少是暫時地改變了既有的國家內部和國際邊界的連結方式。例如各國曾拒絕多艘受到病毒感染的郵輪停泊，禁止乘客上岸（BBC 2020-0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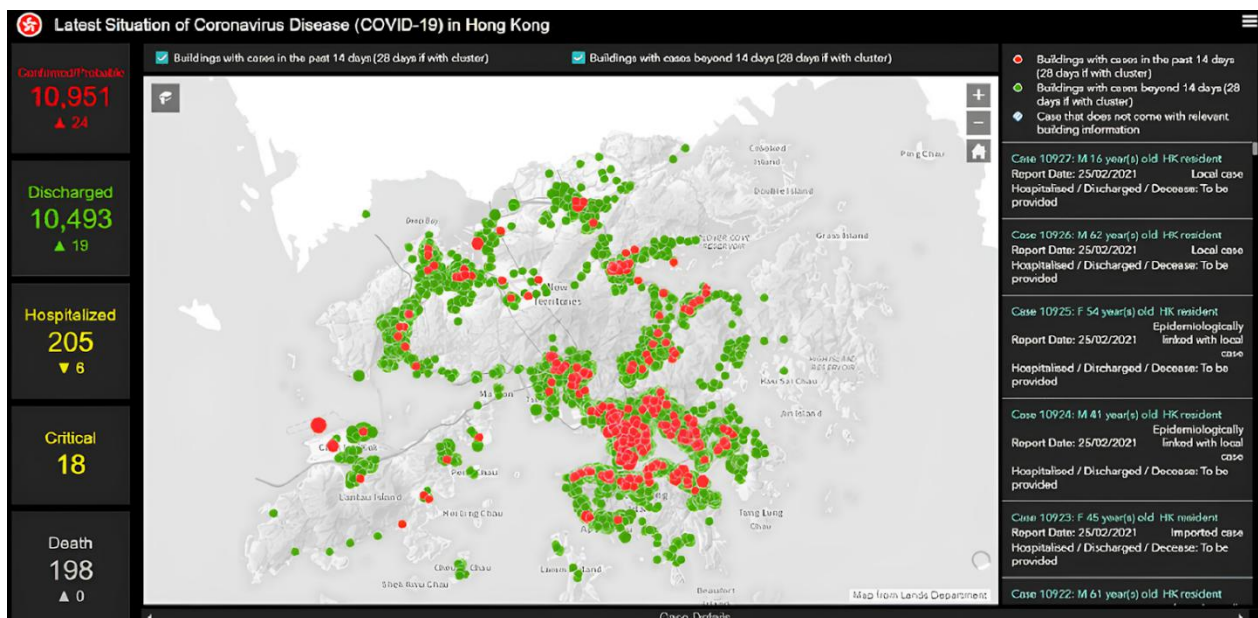
讓這些連結全球的觀光產業產物 成為各自單獨漂浮的孤島 (報導者 2020: 108)。疫情也再度讓世界關注建築空間的空氣問題:「傳染病學者普遍認為,郵輪、學校、老人護理院等關閉式環境十分適合病毒滋長,因為這些地方的人經常有密切接觸..... 在這種密閉的環境,一個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會更容易傳染其他人..... 大量人群長時間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一起生活,共用飲食、梳洗、洗手間等設施,令病毒更容易傳播」(BBC 2020-02-13)。大氣擾動之下,都市的量體環境與空氣物質性的緊密交纏和聯動,再度成為公衛學者和政府的關注所在。新的衛生指引要求建築物和其通風系統需要被恆常地檢視、監測和清洗。面對感染案例的發生和增加,市民日常在機場、大眾交通設施、公共場所、商場和密閉空間的通勤與移動動線需要被重新設計和安排,在確診案例有攀升跡象的日子,都市居民隨時需要做好被公衛部門圍封、強制監測和集體隔離的準備。全球各地的公共衛生專家忙於建立病毒案件數據庫,運用數位技術,配合政府和警察權力強制實施封鎖,追蹤傳播鏈及發生源頭。在確診和死亡人數高居不下,疫苗尚未得到研發的國家和時期,當局甚至會宣布整座城市進行嚴格封城(lockdown),向外界封閉,防止疫情緊隨來往的人群流動而進一步擴大,除了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服務與維護工作,城市活動幾乎停滯,陷入沉寂。

不久以前,人類學家 Lowe (2010) 曾用「雲」(cloud, cloudiness) 這個組織隱喻去理解病毒的本體論、認知論和情動品質。病毒爆發情境激發了一系列生命政治及治理性的風險和推測問題。Lowe 以多雲重組 (cloudy reassortment) 指涉病毒從在地到全球的感染、招募人與非人身體、模糊政治邊界及促進尺度建構之過程。在生物學範疇,病毒是一團多物種雲 (multispecies clouds) — 即多物種的集合體,或物種的倍增器 (species multiplier)。他舉例說, H5N1 形成並制定了它與其他物種的同一性 (forming and enacting its identity with others)。在病毒、動物宿主的免疫系統以及人類及其機構之間的相遇中,多種本體發生了轉變。在病毒的多物種雲籠罩下,物種的集合以尋常節奏或令人驚訝的方式一同轉變。在自然/社會的治理層面,病毒的雲團會偶發地造成公衛危機,跨越尺度地把人與非人行動者的生命及身體、政治論述、實踐、知識和建置都捲入其中。正如在快速變異的「準物種雲」裡,可能出現的基因組集合是異質而且不可預測的,「多物種雲」裡眾多的身體、敘述和政治,都圍繞在病毒此一自然文化事件 (natural-cultural event) 而浮現。另一方面,抗疫不只是醫療技術與病毒傳染的交戰狀態,也是意識形態、全球與在地文化、不同疾病爆發敘事之間的戰場。

在 2020 年初受到新冠肺炎感染威脅的東亞地區，隨著該致命病毒在全球政治板塊夾縫中爆發，讓全體人類身處大規模傳染的不安全、威脅與風險當中，卻並非帶來普世合作、一致行動的契機，而是「掀起了各國新一波的生物民族主義保衛戰」（蔡友月 2020-05-14）。例如對於毗鄰中國和香港的台灣，社會學家蔡友月指出國際防疫組織面對疫情失靈，讓國家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完整的防災啟動機制。除了國民生死攸關的公衛安全需要以外，蔡認為台灣的防疫政策也受到一種國族認同所驅動。而且，政府反過來亦透過「超前的防疫部署」，包括封鎖邊境、「口罩外交」、發展生物科技等政策，結合國族主義的修辭、論述。它們「圍繞病毒形塑了不同國家的防疫共同體，透過國界管制下的身分認定，國家領土內 公民的集體利益，政府抗疫成效所激發人民的榮譽與羞辱，以及配合防疫的公民社會責任，形塑 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連帶感」（蔡友月 2020-05-14）。這種彌漫和滲透全國每個角落的國族情動氛圍，也強化了國家治理邊界的能力。持有不同護照的公民，意味著將會受到不同的公共醫療體制照護。一如以往，領域邊界成為「國族實現的場域」，更是國家施展壟斷性暴力，分辨命運共同體的「我者」和「他者」的排除機制。例如台灣從 2020 年 2 月起便限制曾經入境或居住於中國的旅遊人士入境，更於 3 月將入境限制擴大至全球非本國籍人士，也意味著國家選擇了暫時犧牲全球經濟整合、高速流動帶來的利益，換取時間「動員民眾高度配合政府的生存保衛戰」（蔡友月 2020-0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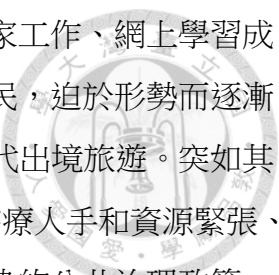
以類似的方式，Kloet et al（2020）觀察到病毒對於生命政治體制的挑戰如何與區域文化環境合流，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國族情感來源。他們在東亞各地（中港台）特殊的政治語境中，觀察到「生命政治」已從一個批判性概念（無止境的例外狀態和限制自由）轉化為各國政府、公民有意追求的抱負（Kloet et al, 2020, p. 639）。隨著疫情日漸嚴重，公民「越來越]想要被控制，而國家則是越來越有效地控制我們，[甚至乎]我們對一些國家沒有做到這一點而感到憤怒和荒謬！現在，地緣政治實體會根據各地防疫治理進行排名（例如是確診 個案數目、感染風險和護理服務方面）。知識分子可能批判，這是一場生命政治的噩夢，但事實上許多人將其稱為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的夢想」（Kloet et al, 2020, p. 637, 639）。公衛國族主義讓公與私領域彼此相互滲透，形成一種仰賴官民共同協作、（強制或自願的）集體行動，配合醫療科技的命運共同體（蔡友月 2020-05-14）。Jauhiainen（2020）則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產生了一系列「生命地緣政治（biogeopolitics）」，例

如在 Lesvos 島的難民遷移案例中，土耳其和希臘兩國政府透過操弄難民的生與死，即與疫情相關的難民跨境、庇護政策，包括規範「非法國境地點」、難民接待中心的日常生活條件，威脅鄰國和國際組織以達成其地緣政治目標（Jauhiainen 2020: 270）。在此，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流動與國家的邊界實踐（開放、收緊邊界，製造、封堵流動出入口，規範身體等等）糾纏混合，成為促進生物地緣政治的額外工具（additional tool）（Jauhiainen 2020: 260）。全球流動的新冠肺炎在不同區域、脈絡下引發了不同的生命地緣政治模態，並且依據不同的社會脈絡，生產了各種殊異的跨國、國族、在地，或多重交織的政治主體性。



圖（二十九）：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互動地圖儀表板
（香港政府 2020；引用自 Mak & Koh 2021）

在香港，從 2019 年暑夏延續到隔年年年初的熾熱抗議氛圍，突然因另一場風暴而冷卻和消散，街頭示威戛然而止。這並不是因為政府讓步，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大氣條件發生突變，持續轉化都市的物質—情動環境。在每一波疫情處於高峰，出現重症和死亡案例的時刻，香港街道空蕩無人，商業活動和交通流量顯著減少，許多公共場所和娛樂設施暫時關閉。城市的活力與繁忙的日常景象被取代為冷清寂靜的空間。隨著疫情



的爆發和防疫措施的實施，許多香港市民被迫改變日常生活方式。居家工作、網上學習成為新常態，外出用餐減少，外賣和網購激增。許多害怕戶外活動的市民，迫於形勢而逐漸適應留在家中進行社交和娛樂，逐以本地度假（**Staycation**）等方式取代出境旅遊。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了香港公共衛生系統長期面臨的挑戰，包括醫療人手和資源緊張、病床和防護設備短缺等問題。同一時間，香港政府加強了控制病毒傳染的公共治理政策，實施了限聚令、強制口罩令等防疫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蔓延，並利用智能手機軟件產生的數據追蹤確診者的接觸史（參見圖（二十九））。就如同許多地區，疫情期間香港也面臨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低收入家庭和基層勞動者受疫情影響更為嚴重。這些群體工作機會減少，收入縮減，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新冠肺炎也改變了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感官經驗。除了參與社會運動的安全原因之外，佩戴口罩成為防範病毒的必須措施；在新冠確診案例難以「清零」的情況下，政府對人口密集的住宅進行圍封檢疫、民眾自主或被迫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也變得愈發普遍。

對於身處都市環境巨大變化的流水革命而言，2020年新冠肺炎的全球爆發，可被視為一次改變都市大氣/氛圍條件的歷史關鍵事件，它產生了政府、警察與示威者新的「運動」遏制與擴散動態（**dynamics of Containment and Diffusion**）。政府的維安目標不只要遏制致命的病毒大氣，也需要遏制仍然熾熱的抗議氛圍，兩者與先前政權以催淚瓦斯座大氣/氛圍控制一樣，本質上均與當局如何治理會移動、聚集的呼吸身體這些問題密切相關。新冠肺炎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還導致了不同規模的情感、環境和政治動盪，甚至改變了抗議者如何繼續與都市氛圍「共同風化」的方式。在病毒爆發期間，（不）配戴口罩的政治正好捕捉到了香港大氣/氛圍條件的劇變（**Ismangil & Lee 2021**）。在運動的高峰期，政府曾使用《緊急法》及《禁止蒙面法》來打擊大規模的運動，阻止人們通過戴口罩來表達異議、躲避警方監控以及抵禦化學暴力。然而，這一形象很快被新冠肺炎的蔓延和緊隨發生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所改變。都市大氣/氛圍及其所涉及的呼吸條件，再度成為抗議者與政府之間的許多爭論和對抗場域。

4.5. 呼吸的維安與政治：新冠肺炎爆發期間的大氣分隔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於 2020 年 3 月 19 日起生效，而俗稱為『限聚令』的，是當中禁止群組聚集的第 599G 章。由起初打算試行 14 天，到政府一直演出生效日期，截止 11 月仍沒未解除。類似限聚令措施在疫情期間獲各國採用，但在香港卻爭議不斷。坊間質疑，警方執行限聚令並非為控制疫情，志在打壓上年六月至今的街頭抗爭。有被票控人士直言，帶有針對性的執法極不合理；有區議員更認為，限聚令牽引出《國安法》、《國歌法》，是令香港社會不能重回往昔的導火線。(疫境記者 2020: 211)

儘管流水革命在疫情爆發初期的動能依然熾熱，但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政府也通過其防疫措施，嘗試打壓異見空間和抗議者的氣焰。其中較顯著的例子是 2020 年 3 月訂立的《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當中禁止群組聚集的第 599G 章（俗稱為『限聚令』），由最初試行 14 天，一直延長至 2022 年年末（政府新聞網 2022-12-28）。在許多例子中，限聚令被指用作針對黃色店家。從抗議案件目錄所見，例如在三月底，港府要求全港食肆每桌只能招待最多 4 名客人，飯桌之間相距至少 1.5 米等措施。其後黃店「光榮冰室」在其 Facebook 專頁表示一日內多次遭警方巡查（蘋果日報 2020-03-30）。另一黃店「龍門冰室」亦指有分店被警方巡查，「稱因為外賣人數多於 4 人，收到舉報要進行驅散」（winandmac 2020-03-30），店主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疫情開始後生意額已下跌兩至三成，限聚令實施後再跌三至四成。翌日蘋果日報亦報導：

「限聚令」要求聚會不能超過 4 人，但警方執法標準不一。有中年人公然多人聚賭，亦有外傭於天橋聚集，警方皆未有驅趕。反之黃店連日遭警方踩場……警方聲稱接獲投訴，指中環的『四季常餐』（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次子黎耀恩開設）餐桌相距不足 1.5 米，於是派出 12 名警員到場，當時店內約有 30 名顧客，警員手持拉尺逐一量度桌與桌之間距離，阻止食客離開並要登記各人身份資料，引起食客不滿。警員稱是擔心有人違反隔離令，有警員逐一檢查食客手

腕有否檢疫手帶。事件擾攘 45 分鐘，警方指座位距離只有 1.1 米，最終只作口頭警告，並無票控餐廳」(蘋果日報 2020-04-01)



「防疫距離不足 1.5 米」，成為不少黃色食肆受到巡查時警方的尋常說詞(立場新聞 2020-04-05；2020 04-15)，而限聚令也迅速成為警方驅散群眾聚集的常用鎮壓工具之一。例如在元朗 721 事件九個月，市民在元朗集會期間，警方截查多名市民，並以限聚令發出告票(蘋果日報 2020-04-22)；在太子站 831 事件七個月悼念集會上，警方也要求被截查市民「五人一排」進行票控，類同的執法風格也發生在多區民眾悼念陳彥霖逝世 7 個月周梓樂離世六個月的集會之上(蘋果日報 2020-04-23；2020-05-09)。另一方面，這些有關病毒爆發風險的公共衛生考慮，同樣被延伸至警方批准示威遊行的裁量之上。例如每年的五一勞動節，民主派政黨職工盟均會發起遊行，雖然該年發起團體已提出以「四人一隊，保持社交距離」的方式遊行，警方卻表示：「經風險評估後，認為集會遊行屬人多聚集的高危活動，相信會增加活動參與者及其他市民感染肺炎的風險，對市民大眾生命健康構成重大威脅，危害公共安全及影響他人權利，因此禁止相關公眾集會及遊行」(香港 01 2020-04-24)。職工盟最後把集會改為在全港各區擺設街站，派發防疫物資，但防暴警察仍然到場戒備，以違反「限聚令」為由截查、驅趕街站成員和市民(立場新聞 2020-05-01)。5 月 6 日，警方再以限聚令為由反對九龍大遊行，主辦團體宣布延期(立場新聞 2020-05-06)。至於每年六月初由支聯會舉辦的悼念天安門事件六四遊行及晚會，同樣遭警方以限聚令不予批准(立場新聞 2020-05-20)，其後警方又呼籲市民在當天(六四三十一週年)「應盡量留在家中」(文匯報 2020-06-03)。由此可見，新冠肺炎疫情為香港政府提供了政治機會，以執行政治性的空氣隔離，如限制公共集會和人員流動，利用數位監控網絡和模糊的日常裁量權來「在空氣中抹去」異議空間 (to atmospherically erase dissenting spaces)。

然而，當城市的呼吸條件變得危險，第一波新冠疫情肆虐香港，大氣中充滿著不確定性時，抗議者並不一定只將新冠肺炎病毒視為不利於運動的負面因素。例如，一位曾參與通信協調 (coordinating communications) 工作的抗議者提到，疫情為流水革命提供了一個重新組織和準備下一波街頭行動的時間。此外，病毒的傳播激發了新工會的形成，這些工會關注邊境封鎖和區域隔離中心等問題。正如他所說，「[疫情]對於運動本身的影響對我來說出乎意料地低，也許是因為運動的『大腦』已經好幾個月不在地面上的了——人們早已

適應了通過網路繼續運動。那些負責計劃的人，仍然在線上進行活動」(Rose 2020-03-23)。
。接下來的部分，我將簡要地總結新冠肺炎在香港爆發後，伴隨城市的風化而出現的各種抗議形式。



早上 6 時半左右，筆架山上懸掛了一幅直幡，黑底白字寫上 “HK CAN’T BREATHE”，直幡約 10 米乘 2 米，九龍塘一帶亦清楚可見，消防員接報到場，極速講它拆走。612 一週年紀念活動中，由防暴警員向外籍記者呼喊 “Black lives matter”、“I can’t breathe” 等反警暴口號，似是嘲諷享有民主自由的美國同樣面對警暴。警方事後承認有警員使用與其職務無關的字眼，表示關注，聲稱已訓示相關人員需注意各人言行及提升敏感度。(蘋果日報 2020-06-17)



圖（三十）：香港抗議者在筆架山上懸掛了一幅直幡，
黑底白字寫上「HK CAN'T BREATHE」

(蘋果日報 2020-06-17)

本文查詢的抗議案件目錄詳細記錄了流水革命在此時期的演變和轉向。自 1 月 22 日香港確診首宗新冠肺炎病例 (香港政府 2020-01-22)，示威者旋即在翌日前往西九龍高鐵站 (確診者經由廣深港高鐵入境香港) 抗議，要求政府立刻實施封閉站口、停止中國自由行來

港，關閉陸路口岸、停飛來往武漢航班等措施。在醫院公廁、深圳灣口岸甚至出現炸彈，傳達迫使醫護罷工和政府封關等訴求。1月28日開始，多區醫院醫護人員發起「集體請病假」，翌日亦有網民發起「抗議黎明行動」(包括靜坐、堵路、阻塞地鐵路軌、破壞月台設施等行為)重申訴求。新工會之一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則由2月3日開始，一連五天發起兩階段罷工，參與人數超過9000人。東涌、天水圍、美孚、荃灣等住宅區，也有民眾聚集和遊行聲援(參見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罷工醫護前往醫管局大樓遞交請願信，
要求政府全面封關
(蘋果日報 2020-02-05)

政府在鄰近民居設立的病毒檢疫指定診所，同樣也受到民眾激烈反對。示威者認為這些措施增加了社區傳播的風險。早於1月26日，粉嶺便有民眾集會和堵路反對政府徵用暉明邨作為「隔離營」(quarantine center)。其後整個2月，觀塘、美孚、堅尼地城、火炭、西貢、天水圍、香港仔、西環等地區亦相繼有民眾發起遊行，抗議政府徵用公共設施為檢疫中心。這些不受官方批准的示威活動，遭到防暴警察驅趕、發射胡椒噴霧、催淚彈回應。儘管政府在1月31日起實施局部封關(關閉6個口岸，暫停高鐵班次等，2月3日

增至十個口岸)，卻未有接納罷工醫護「全面封關」的訴求，亦沒有撤回檢疫中心選址的決定。2 月底醫管局向罷工醫護發信，表示將跟進員工缺勤狀況，保留追究權利和扣減工資（疫境記者 2020：32），向他們施加壓力。警方亦在 3 月初首度表明香港抗議出現「本土恐怖主義」，又指「暴徒為表達對社會及政府不滿，而選擇傷害市民大眾及引起社會恐慌」（蘋果日報 2020-03-03）。

除了有新的動員主題隨疫情一起爆發以外，也有一些是延續了流水革命「共同呼吸」的抗議曲目，例如是政治悼念 (political mourning)（參見本文 4.3 一節）。在 2019 年 721 的「元朗站白襲擊事件」和 831 的「太子站警暴事件」後，每個月的 21 日和 31 日都有大批民眾重返現場進行悼念和抗議，示威者也會設置連儂牆和展板，播放相關新聞片段。在太子站外，市民會到場默哀、獻花，播放和高唱運動歌曲《願榮光歸香港》。至於另一些悼念活動則針對因抗議喪生的示威者，例如每月在將軍澳、觀塘、金鐘等地方舉辦的悼念活動，民眾會為這些「義士」設立祭壇、獻花、點蠟燭、默哀等等。一些悼念活動 (流水式集會) 亦會轉化為堵路、攻擊警處等更為激烈的行動。

Tang & Cheng (2022) 指出，流水革命產生了極其多樣化的政治參與，而其中的重要面向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根據他們的訪談結果，流水革命的參與者大都認知到日常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密切交纏，示威者和同情運動的民眾透過政治性消費 (political consumption) 及數位行動 (digital activism) 等方式，嘗試在香港政治環境日漸趨向威權化的時期，持續提出異見政治主張、促進抗議相關的資訊流通，以及獲取在地與海外更廣泛觀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在社區層面，Whitworth & Li (2023) 也提到遍佈香港各區的連儂牆這一強而有力的抗議曲目，在流水革命期間再度成為公民表達意見、分享資訊、爭取與動員民眾支持運動訴求的重要場所。當一些與抗議運動相關的事件或現象發生後，連儂牆隨即作為一種關鍵的溝通媒介，讓示威者 (與其對手) 建構現實，爭議或為其經驗賦予意義。他們認為，這些框構與反框構的過程也「產生了新的集體性，創建或重新定義了行動的多重意義，且加強了政治行動的正當性和情感共鳴」(Whitworth & Li 2023: 4)。與數位行動主義不同的是，連儂牆除了具有持續產製運動圖像、論述之框構與逆反框構的功能以外，也是一些挨近住宅社區、交通樞紐的物理公共空間 (physical public space)。就此而言，連儂牆既是民眾由下而上地重新挪用都市公共空間的實踐，也是一個接通在地脈絡，極具創意，且充滿爭議的

場所：支持運動和反對運動的論述、文宣和口頭交流，每天在這些連接社區的樓梯、隧道和牆壁前上演，創造出鼓勵草根民眾作政治表達和討論社區事務的氛圍。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Ismangil & Lee (2021) 指出流水革命的參與者在視覺圖像和口號的使用方式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政治異議與社區抗擊疫情的行動結合在一起。運動的標誌性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已被當局標籤為分裂主義和危害國家安全）與『康復香港，時代抗疫』一同出現：許多抗議標誌和口號經常出現在牆壁、欄杆、人行道、天橋、地下通道等地方。許多臨時 DIY 的『連儼牆』出現在當地社區、校園和市中心，人們用簡單的便利貼傳遞支持民主的信息，而路人則會停下來閱讀、書寫或拍照。在這個過程中，普通的空間被轉化為『自發且集體形式的公共交流空間』（Ismangil & Lee 2021: 18）。他們也指出，「隨著政府通過警察逮捕和疾病控制規定限制公共集會，加大「止暴制亂」的力度，抗議運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19），例如是在《動物森友會》等數碼媒體和電子遊戲進行顛覆行為，舉辦線上的抗議記錄片放映會。疫情持續蔓延下，小規模，在地區和受限空間 (more confined space) 舉辦的「和你唱」(singing flash mob)、「和你 lunch」等集會活動仍然頻發出現。從抗議案件目錄所見，這些活動經常在商場、商業大樓出現 (正如「和你 lunch」對應上班族的午飯時間)，將商業空間轉化為政治抗議的場所。數十至數百示威者會在商場內掛起橫額、展示文宣和畫作，高叫抗議口號，有些集會也會向市民派發防疫物資，以「自救」的論述批評政府未有向市民派發口罩。在防疫物資緊拙的疫情初期，不少政黨團體、藝人和港人從海外搜購大量「自救口罩」回港，轉交民主派區議員協助發售或轉角弱勢社群，可見疫情當中，我們也看到「黃色經濟圈」持續演變，同樣嘗試以口罩連結支持者，獲得更廣泛的公眾支持。對此，Li & Lee (2023) 寫道，「相較於台灣政府在 2020 年 3 月迅速決定封閉邊境，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完全封閉與中國的陸地邊境，被視為將香港防疫自主權讓給中國政府的行為……雖然特區政府最終在 2020 年 2 月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了隔離措施，但香港人強調通過保持社交距離和戴口罩來『自救』的重要性。對政府的深切不信任以及將中國視為 COVID-19 鬥爭和抵抗中的敵人這一看法，推動了這些自我維安化的做法」（Li & Lee 2023:4）。

作為流水革命其中一個重要的日常生活政治化的面向，黃色經濟圈 (yellow economic circle) 是指流水革命支持者以政治取態區分店家的經濟行動，在消費時優先光顧政見及理

念相似的食肆或商家(黃店)，同時杯葛中資、「親共」、支持修例或支持政府、警察的店家(藍店)。店家通常會在門外或店舖內部貼上文宣、設置連儆牆，表示對運動的支持，而有些店舖甚至會派發食物或捐獻予示威者。早於 2019 年 8 月，有網民已開發行動電話應用程式，整合香港各區罷食餐廳資料和位置 (Unwirehk 2019-08-23)，其後陸續有其他民間自發的團隊發布更多應用程式和網上地圖，例如是在 Facebook 擁有逾十萬讚好的專頁《終極黃藍地圖》(其 google map 於 2020 年 7 月因國安法生效而下架)。根據 2020 年初明報的民意調查顯示，多達九成受訪者表示會參與黃色經濟圈 (明報 2020-01-02)。在疫情期間，民間亦因應不同主題，發起了支持黃色經濟圈的行動，例如有「黃店聯盟聯同手足自製端午粽發售」(蘋果日報 2020-04-22)「會計手足義助黃店申請政府的抗疫基金」(蘋果日報 2022-05-07)，以及運動著名的 telegram 群組香城 Online 呼籲市民在五一黃金週到各區光顧黃店，振興黃色經濟圈 (香港 01 2020-05-01) 等等。

誠如上述，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香港政府試圖通過其防疫措施和禁令，嘗試打壓異見空間和抗議者的集結能力。然而，香港政府及警察如此限制民眾「共同呼吸」的作為，在疫情放緩期間未必受到主辦團體以外的行動者接受和尊重。尤其是，流水革命以「無大台」、去中心化的組織形式聞名，所謂的主辦單位很多時候只是負責事務性地提出申請，並無實際約束且指揮群眾的權力。而「無大台」發起的抗議行動，亦十分具有創意地與執法單位進行周旋。例如 5 月 10 日旺角、觀塘、荃灣、沙田、屯門等多區均有民眾聚集，以「母親節行街」的名義聚集叫喊口號和唱歌，引來防暴警察闖入商場發射胡椒球彈驅散，亦引發示威者於旺角彌敦道堵路，逾百人被拘捕 (立場新聞 2020-05-10)。六月四日當天，雖然支聯會的集會申請沒有受到批准，改為在網上直播維園悼念，但示威者顯然沒有應警方的呼籲留在家中。

在警方部署 3,500 名防暴警察戒備、裝甲車和水炮車候命的威嚇之下，多區均有民眾「遍地開花」舉行悼念活動，擺設街站，向途人派發蠟燭、舉辦放映會、默哀、唱歌，高叫口號等等，示威者亦借此表達反對國安法、香港獨立等訴求 (蘋果日報 2020-06-04) (參見圖 (三十二))。端傳媒亦報導：「逾萬名市民不理會警方反對，如往年一樣手持蠟燭進入維園自發集會。在維園現場，警方多次播放『禁止多於 8 人聚集』的限聚令訊息，但未有作進一步行動，氣氛大致和平。晚上約 9 點，各區集會陸續散去。旺角街頭現零星衝

突」；警方當晚則表示「理解六四維園集會對部分市民有標誌性歷史意義，但基於『限聚令』，不能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會以容讓和溫和手法處理今晚維園的悼念活動」(端傳媒 2020-06-04)。



圖（三十二）：逾萬名市民不理會警方反對，
進入維園自發參與悼念六四集會
(端傳媒 2020-06-04)

這顯示，警方試圖通過定義安全的大氣/氛圍，以限聚令這類法律和氛圍技術確保都市公共秩序的實踐，並非如他們聲稱一樣一定有效，或者會按照警方的想像方式運作。這些技術總是需要依據不同情境和情勢變化而有彈性地施為，有其「雲霧般」的含糊性。另一方面，正如警察試圖通過氛圍技術干預來控制人群和空間，抗議者也發展了多種曲目來對抗那些對他們產生影響的情動力量，或破壞這些力量 (Wall 2019)。

可是，隨著病毒進一步在社區傳染和被捕人數增加，示威者 2020 年 3 月之後的動員能力和人數均有顯著下降的趨勢。在大規模動員漸漸陷入窒息之際，無法參與集體抗議的

民眾，也試圖通過「隱身」的方式試圖從政府防疫的大氣/氛圍中撤離 (withdrawing from the atmosphere)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2016)，把「運動」帶到如交通 (不乘搭「黨鐵」)、吃飯 (光顧黃色經濟圈，或為了不使用「安心出行」而選擇到戶外野餐) 等日常生活的決定和慣習之上 (「香港安心野餐」群組，見獨立媒體 2021-12-25)。至於部分行為更激進的示威者，也會以刻意違反防疫規定 (確診新冠肺炎而不向政府通報和不配戴口罩)，移動到敵對陣營的「藍店」餐廳進行「播毒」行為等方式 (法庭線 2022-07-05)，把都市環境理解為「打擊敵方的地勢」：

28 歲男技術員被指今年 2 月下旬，經快速抗原測試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後，連續多日乘公共交通工具外出，光顧富臨皇宮、元氣壽司等「藍店」後，圖文並茂上載至 Facebook。他早前承認 11 項「使其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險」罪，周二 (5 日)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囚一年。裁判官梁雅忻直斥，被告行為卑劣，除針對性地乘車和前往某些餐廳，亦在網上公開行蹤，令閱覽者感到恐慌，案情「非常非常嚴重」。梁又強調，被告接連犯案，「唔係肚餓落街食飯」如此簡單，非但沒有盡公民責任，更於艱難時期火上加油。(法庭線 2022-07-05)

新冠肺炎疫情於城市各處爆發蔓延，讓香港的抗議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病毒在社區的傳播擴大和被捕人數的增加，抗議活動的動員能力和參與人數顯著下降。然而我們也看到，流水革命的參與者並未放棄，而是通過其他貼近生活的方式與日漸威權化的病毒大氣/氛圍進行著風化，在持續的社會壓力和環境變化中進行調適、表達異議和抵抗因病毒而變得普遍的大氣治理。一些抗議者轉向了「隱身」策略，將街頭的抗議行動融入日常生活中，形成新的交通、消費、飲食習慣和生命的時空節奏。另一些人則採取了更為激進的手段，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從都市大氣/氛圍的角度來看，這些行動進一步複雜化了城市空間的政治和情感動態。抗議者與政府之間的交鋒，不僅僅是物理上的衝突，更是牽引到臟器 (visceral) 和情動上的相互觸碰、感染和角力。都市大氣/氛圍作為一種控制和抵抗的媒介，繼續成為了各方勢力角逐的戰場。現在，這股抗議氛圍如同燭火般晃動不定，若隱若現 (Lin 2022)。它不僅僅與集體行動一同存在，更表現在看似微小的個人日常行

為和選擇中，展示出抗議者在一個政治氣候迅速變化的城市中，如何不斷調整自己的呼吸節奏和身體移動，持續抵受大氣警戒的壓力。



4.6. 小結：都市大氣/氛圍與身體的風化政治

身體是風暴中心，是坐標的起源，是所有經驗鏈中持續的壓力點。一切都圍繞著他，並且從它的視角感知

William James (1905: 9)

我們總是與天氣同在，總是感受它，總是被它影響，也總是與它共同風化

Susannah Clement (2020:54)

在風化中重塑時間和空間，亦即持續地重塑身體與世界之間的表面 (surfacing)。與大氣警戒和都市氛圍一起風化，意味著流水革命的參與者對於都市環境的轉變、社會運動和不停流轉的身體，都有敏銳的感知和覺察。另一方面，從「風化」具有訓練、技巧的意思來看，運動者並非只是被動地抵受國家暴力的壓制和分解，而是儘可能更積極地把對身體有害的化學元素和鎮壓的敵意，內攝、摺疊到隨時間、抗議事件而生長的運動文化之中，同時，都市環境和呼吸條件的急劇轉變，亦時刻改變著流水革命參與者能夠施展什麼動作，或介入都市氛圍的能力與其潛勢與界限。對應於這些理論取態，Neimanis & Walker (2014) 提倡風化的概念能夠挑戰「自然」和「文化」、「主體」與「客體」的二分理解，強調身體與環境交織的內互作用，有著共同生成和轉化的政治潛力。身體不僅僅是「置於」空氣中，像被放入容器一樣，而是與處於不斷變動中的天氣世界持續交互接觸 (Neimanis & Walker, 2014, p. 561)。風化強調了身體與天氣之間的連續性、模糊性，以及它們的相互滲透和構建時空的共同作用。身體與周遭空氣幾乎是不可分割的：「我們的身體充滿了環繞我們的水分、氣體和聲音，它們是某種『鮮活的卷軸 (living scrolls of sorts) 』。在我們細胞和染色體的纖維內部，書寫著我們與環境交織的記錄」(Neimanis & Walker, 2014, p. 569)。

都市大氣 — 或天氣 — 並不外在於身體，也不是容納我們身體的容器。考慮到抗議者如何與城市大氣一起風化，意味著要注意到其中的跨身體性以及它們交纏的厚重時間

(entangled thick time)。沒有任何身體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斷與其周圍的物質和能量進行交換和交纏。身體的邊界是流動的，其表面不斷在內外兩方面被觸碰和滲透。天氣世界中的物質，如化學物質和污染物，不斷進入並影響身體，而每一次呼吸也與天氣交織，構成了天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風化的厚重時間呈現了一種將過去、現在和未來交織在一起的時間維度，強調了時間的多重性和層層摺疊。身體不僅存在於時間中，它們也是時間的創造者。天氣世界的變化總是受到過去和現在事件的塑造。我們的身體、行動和思想不斷與大氣/氛圍一起創造和重塑時間與空間。

流水革命的抗議者身處大氣警戒的風暴和「失去定向」的狀況，正正並非只是受制於知識/權力的客體，而是更為親密、具身地棲居在這些惑亂時刻的強度之中，反覆地湧現出眾多與抵抗大氣警戒和其他警治鎮壓方式的新向度。本章呈現了香港的都市居民和示威者生活在大氣動盪中，如何通過處於湍急變化的空氣和圍繞這些空氣的一系列社會物質技術，感知政治衝突的物質性和危機的情感強度。對此，Lo (2023) 追隨了 Whitehead (2011) 的觀點，使用「大氣自我」這一概念來理解抗議者在持續的大氣監控、監視和治理規範下如何發展出特定的自我意識。他指出：「隨著大氣監控、監視和政府對公共行為的規範日益增多，形成了『大氣自我』，這種自我置身於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治理中」(Lo 2023: 323)。對空氣中各種「危險」的警覺性，使得抗議者在面對催淚瓦斯等大氣控制手段時，能夠更有策略地進行自我保護和參與集體行動。儘管「大氣自我」和「具身」等概念強調了「自我」作為呼吸的身體如何在特定大氣條件和權力規範下運作，我們也需要注意到，這些術語往往有著把身體描述為封閉的個體的危險，而非具有活力、向著交纏和開放運動的存在。正如人類學家 Tim Ingold (2013) 所指出的：「身體不是一個包裹，也不是——引用另一個常見的類比——一個讓沉澱物沉積的水槽。它更像是一種動盪的，不斷處於展開狀態的活動 (it is rather a tumult of unfolding activity) (Ingold, 2013, p. 94)。女性主義和新物質主義的觀點也告訴我們，城市大氣並不僅僅是身體行為和價值投射的背景，也不只是與個體或集體行為者互動的「非人類力量」。抗議者在回應和面對政府試圖控制不斷變化的大氣時，展示了更複雜的動態。引用 Barad (2007) 的術語，這種身體與環境的親密聯結方式，可描述為不同元素之間的內在互動、重疊和交纏的時空物質化過程。

當香港人習而為常的資本主義都市布幕落下，露出其威權、充滿暴力、赤裸裸的獠牙之時，滑行於權力和武力極度不平衡的斜面，參與流水革命的抗議者們還抓住了什麼（take hold of）？我在上一章已經提到，不同的日常生活用品、物質和技術如何在與國家暴力的遭遇當中/之後，被納入抗議者身體親密可及的空間當中。根據現象學有關身體與對象關係的觀點，我們與那些「吸引我們注意、與我們互動」的對象，構成了「我們的近域」或「核心領域」。這是一個實踐行動的領域，一個人能夠透過身體運動達到 (reach with my kinestheses)，而且可以通過視覺、觸覺等方式，最佳地進行感知的事物領域（Ahmed 2010: 31-32）。為了應對各種形式的國家化學暴力和警察鎮壓，抗議者發展了多種抵抗方法和抗議策略，不斷地開拓出包含各種抗議方式、對象、話語和物質的近域。隨著運動的擴散和演變，許多日常工具、醫療產品和運動設備被「流水革命」的參與者重新用於抗議場景中的具體功能（參見本文第三章）。在這一章，我進一步討論了示威者各種於都市各處呼喚氛圍的身體美學與情動實踐。在群眾反覆為運動中逝去的生命哀悼、以集體現身和疊歌的姿態，挑戰中國主權的時刻，我們看到流水革命如何有節奏地召喚出強烈的抗議氛圍，創造了一種替代性的情動公共秩序。抗議者的遭遇和行動進一步塑造了包覆個體與社群的層層新皮膚 (new skins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這些過程促使某些身體彼此對齊，同時反對著其他身體（Ahmed 2004），如防暴警察和其他國家及其大氣警戒代理人。在這些相互風化的過程當中，都市大氣/氛圍不僅是抗議政治的背景，而是作為活的情動環境與身體聯動和交纏起來，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應。

新冠肺炎疫情底下，香港抗議者利用與呼吸條件直接相關的議題，如香港與中國大陸邊境的開關、地方醫療資源的分配以及區域隔離中心的設立，發動罷工、縱火和示威。這些行動有助於維持社會運動的勢頭，聚集並維繫抗議者的共同呼吸/共謀（conspiration）。此外，在病毒蔓延的社會中，口罩的政治意涵也正在演變，它已轉變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緊急狀態的象徵。面對政府支持不足和政治動盪，香港市民採取了自我維安化措施來進行身體和情感上的防範。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實施的防疫措施，如施打中國製造的科興新冠肺炎疫苗、推廣疫苗護照和健康碼，可能被一些抗議者視為反映政治與生活需求之間緊張關係的有爭議決策，甚至被更激進的抗議者視為威權主義的象徵。延續流水革命的抗議時間節奏與運動日常，圍繞病毒和感染政治的這些話語和實踐，進一步激發了不同的主體

性、集體身份和政治想像。它們展示了都市居民和示威者如何在大氣緊張關係中重新調整、經歷衝突、適應和忍耐。香港民眾對於病毒傳染的多樣化回應方式，強調了疫情、抗議政治和日常生活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在本節結尾，我希望藉著比對催淚瓦斯和新冠肺炎，點出其大氣物質性的差異對於流水革命的抗議主體性和倫理關係的迥異影響。本章一開始把催淚瓦斯毒氣和新冠肺炎病毒并稱為大氣擾動事件，試圖以空氣作為兩者的共同媒介，追溯這些大氣/氛圍動蕩狀態與社會動蕩狀態的連續性和交織關係。可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這兩種毒氣各自對都市環境和社會運動起到的具體物理與政治效應并非等同。面對流水革命的浩大聲勢和群眾大規模動員上街，我在 2019 至 2020 年的香港觀察到兩種大氣警戒方式。從 2019 年 6 月到隔年 1 月，催淚瓦斯重現香港街頭，涉及到國家主動地運用技術化的手段去工程化和武器化空氣，小規模製造出如政治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 (2008) 所描述的例外狀態 (state of exception)。警察企圖在群眾聚集的（戶外或室內）公共空間中展開具有特定時空範圍的毒氣球域，剝奪民眾呼吸和抗議能力，從政府定義的維安區域中驅除出去（而那些被驅除的人經常被執法機構指認為「暴徒」）。然而在現實情況中，這種國家工程化大氣創造警治氛圍的舉動遠非無懈可擊，而是充滿孔隙的。抗議者身處毒氣中仍然能夠以各種方式互相照護、串連和反擊，以緩解或轉化催淚瓦斯對身體的傷害和觸動，打開更多群眾集體行動的空間。催淚瓦斯作為黏附並長時段存留於都市地景和居民身體的化學氣霧粒子，既引起香港民眾廣泛的擔憂和悲憤，也作用於情感的意向性層面，把一些身體（防暴警察）和另一些身體（身處不同運動位置的抗議者）吸引或推離開來。

如果說催淚瓦斯在香港的都市大氣/氛圍與居民的呼吸條件當中，震烈出一條區分抗議政治敵我陣營的斷層線，那麼新冠肺炎在隔年初春爆發，也就把這條具有情感指向性的線條進一步分殊化和複雜化。新冠肺炎引發的是一種深入到所有社會組織和居民生活世界的危機。儘管香港政府在第一波疫情初期因拒絕完全關閉中港邊境而引發大規模醫護罷工和民眾示威，隨著城市因（高感染性和致命率的）病毒傳播而進入緊急狀態 (state of emergency)，政府卻能以確保民眾生命安全和維護公眾健康等理由，以法律秩序、技術手段、時間和空間的佈置安排，從更為精細 (meticulous)、深入市民身體臟器和日常節奏的方式，對社會運動進行收編並限縮其聚集空間。另一方面，對於流水革命而言，運動支持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尚且能夠在致命病毒爆發的不安陰霾下，重整其動員能力和抗議

論述，在中港封關議題、社區層面（防疫物資籌措和消費經濟）上集結力量和彼此支持，但隨著病毒感染範圍擴大和政府制定的嚴密防疫規定，抗議群眾於公共空間現身的可能性被進一步縮減。根據抗議案件目錄，從 2019 年 12 月到隔年 4 月，抗議案件數目有顯著下跌的趨勢⁹。從目錄的「第一次手法出現」統計來看，流水革命抗議曲目的創新變化也在新冠肺炎爆發後陷入瓶頸。相比起 2019 年 6 月到 10 月新手法不斷湧現的時期，2020 年 1、2 月分別只有 1 個（「招募新工會成員」）和 2 個（「派發防疫物資」、「恐嚇警方（如不明郵件或未引爆炸彈）」）新的曲目出現。

疫情也引發了新的倫理考量。在這段時期，民眾佩戴口罩除了此前的政治表達（如在口罩上印刷象徵流水革命的顏色或抗爭標語）和避開警方的監控識別之外，也展示了佩戴者保護自己與他人（無論是親密的家人、朋友，還是在街上、公共載具上共處的陌生人）免受病毒侵害的渴望。新冠肺炎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尚不明確，而脆弱群體、慢性病患及易罹患重病者面臨的高風險，使香港及東亞地區的都市居民普遍在病毒威脅下更加警惕。在感染個案飆升的時期，外出走動和與旁人共享大氣變得不再自然而然。在家屋管理的層面，人們採取了限制出門人數，改變個人的日常社交規律、戶外移動路徑和逗留時間等應對措施。此外，確診個案往往連帶影響與患者接觸或共同生活的人，這些（潛在）傳播鏈的端點需接受醫學檢測和隔離。人與人之間的身體距離因病毒感染而被重新界定，既可能捆綁彼此，也可能變得更加疏離。大部分抗議者對於健康的警惕與必要的調適，使到他們在集體現身與自我隔離的道德要求之間產生張力，而對大規模群眾聚集活動產生負面影響。這些大氣物質性、呼吸條件和倫理考量的變化，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疫病期間，激進抗議者試圖將都市大氣武器化的行為（例如刻意散播病毒），未能在流水革命支持者之間獲得廣泛模仿或情動共鳴。

然而，這些挑戰並未完全消弭民眾對社會公義和政治權利的追求。在群眾集體現身的政治與健康風險過高，個體呼吸和行動均大受節制的時刻，具有政治異議性的情動力更多地被點綴於日常時刻的萌動，被平凡生活（ordinary lives）所內攝、延續和重新表達（Das 2006）。例如在香港人類學家鄭詩靈（2020）述說的故事中，我們看到政治動蕩的暴力和人們參與抗爭的複雜情感，如何被親身經歷和見證這些關鍵事件的孩子，銘記和表達於其

⁹ 根據我對抗議案件目錄進行的統計，2019 年 12 月的抗議案件數為 168；2020 年 1 月為 84 件；2 月為 63 件；3 月為 24 件；4 月則只有 9 件。

日常生活的平凡、微小行為之上。當一家人在街頭目睹警察對發起和平遊行、人鏈活動及商場內唱歌的示威者發射催淚煙，並以警棍暴力驅散後，作者年幼的女兒回到家中創作了一幅名為《皮卡超的眼淚 (Pikachu's tears)》的畫作，表達了他對香港抗爭中的恐懼與希望。畫中，展露堅毅神情的皮卡超（一隻廣受孩子歡迎的日本卡通角色）留著眼淚，它身後的背景畫著抗議口號、死亡的意象和象徵希望的獅子山亮光。這副畫作揭示了兒童通過創造性的方式處理創傷（因曝露在危險和暴力當中而引起）的能力，以及其獨立於父母教化之外的道德反思過程。新冠肺炎爆發以後，即使作者認為「家長向孩子解釋新近的抗議活動、政府的壓制和城市的未來走向變得更加困難」（Cheng 2020: 225），他也在女兒選擇的生日蛋糕角色設計（同樣極受孩子歡迎的《角落小夥伴》）裏面，閱讀到「更多」符應香港疫病時期的政治意涵：抗議者在被疫情分散的角落，面對政府的貶抑依然持續反思與批判。香港民眾對公義的真切追求、在抗爭中展現的強烈尊嚴感，亦難以被威權及疫情的雙重挑戰完全遏制。

表（三）：與催淚瓦斯和新冠肺炎一起風化

成問題的空氣	催淚瓦斯 (Tear Gas)	新冠肺炎 (COVID-19)
國家風化抗議者	國家通過化學暴力法律禁制去攻擊和驅散抗議者	國家的防疫規定、限聚令控制民眾的呼吸和移動
毒氣風化抗議者	催淚瓦斯的毒氣黏著在皮膚上或被器官吸入，產生身體變化	病毒（多物種雲）一波一波地傳播，感染身體
抗議者抵受毒氣的風化	抗議者長時段的暴露、忍受後，對催淚瓦斯產生「熟悉」關係	面對病毒傳染的自救、借題發揮，改變既有的抗議和日常生活方式
抗議者風化環境	市民承受、忍耐國家化學暴力，互相照顧，通過身體美學和拼裝物品創建抗議氛圍	對於生物政治維安的多元回應：例如是持續集體動員（借題發揮）或個體的「播毒」行為

綜合而言，本章以風化的概念，探討催淚瓦斯毒氣、抗議氛圍和病毒的傳播，如何構成了當其時香港特殊的都市環境條件，在多個層面上塑造穿行其間的身體、空間與抗爭的動態，以及身體回應環境政治災害的能力。在以上提到的眾多例子裏，「成問題的空氣」（problematic air）成為了連結國家暴力、群眾抗議和病毒傳播的關鍵元素。國家透過化學暴力鎮壓抗議者，並以防疫規定與限聚令管控公眾行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催淚瓦斯的毒氣滲透皮膚與呼吸器官，帶來身體的直接影響；而病毒作為一種「多物種雲」，以波浪式傳播的方式感染人群，大規模且深入臟器地改變城市的日常生活節奏（參見表（三））。

沉浸於有毒的都市環境，流水革命參與者經歷了雙重的風化過程。他們一方面在長期暴露與適應中，逐漸對催淚瓦斯產生某種熟悉與耐受的身體關係；另一方面，面對病毒威脅，則採取自救措施，改變生活方式以應對疫情。同時，抗議者承受著來自國家化學暴力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壓力，卻也在相互照顧中建構出抗爭的文化空間。他們透過身體美學與拼裝抗爭物件，創造出持續的抗爭氛圍，並在疫情期間靈活調整策略，例如借題發揮國家防疫政策的矛盾，或以實際行動挑戰限聚令的約束。這顯示，「風化」不僅僅是身體與有毒空氣進行物理調適或呼吸的交換，更是抗議者面對國家壓迫的政治覺醒，試圖讓運動持存的堅韌象徵。風化的過程體現了一種身體與環境聯動的政治轉化：抗議者通過忍耐、聚集、改變策略與參與多種創造世界（world-making）的情動實踐（Stepnisky 2020），既對抗國家製造的維安或壓迫性的空氣體制，也重新塑造了個體的政治意識，在彼此的一呼一吸之間孕育出共同體的未來想像。

都市大氣/氛圍親密地形塑或斷裂了社會運動的軌跡，一方面限制了集體集會和群眾共同現身、協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促進了流水革命以其他形式的持續發展。這種限制與促進的雙重效應表明，病毒作為一種新的大氣擾動因素，影響了社會運動的變革軌跡，甚至是重新定義了其政治界限。抗議者通過圍繞催淚瓦斯和國家暴力使用抗議物資、宣傳和話語，面對新一波的大氣擾動，並產生了一系列具爭議性的、意識形態的和情感性的技術與物質。例如，口罩作為抗議表演的一種形式，將催淚瓦斯創造的例外狀態與新冠肺炎的緊急狀態經歷串聯起來，揭示了日益威權化的城市進程中的獨特情動動態。對於香港市民，尤其是政治異議者來說，日常的呼吸與政治表達都伴隨著一定程度的風險。這些與呼吸密切相關的新技術和物質不斷重塑抗議者如何與不斷變化的都市氛圍共同風化。它們也展示

了政治異議和抵抗如何通過不斷調適和那些與大氣/氛圍共同生成的呼吸身體而持續。每一次呼吸都為未來重新注入了新的可能性。



第五章 結論



你說你不想遠離 煙霧的滋味 / 已看不到距離 勝利的日期 / 朦朧的希冀 時代
的奧秘 / 你看到煙已霧起 靈魂已準備 / 誰願有這勇氣 與肉體分離 / 無謂的
黑旗 窒息的空氣

My Little Airport 《煙》 (2020)

身陷絕境，感官放大，格外清晰的，是氣息。催淚圍城，街巷戰役之間，隔著豬嘴的侷促難耐；棍棒之下，錄入攝影機直播全城共同親歷其境的喘息；在分秒之間，作出生命中最重要抉擇之前，深深吸入、貫徹全身的一口氣。正是這樣的共同經歷，讓我們願意克服恐懼衝上前，願意信任素未謀面的彼此，願意不計成敗與代價，只為再向前一步。痛苦打通了我們心的隔閡，但唯有行動與反抗，才真正將我們連結成一體。我們都見證過，體制徹底崩塌下的真實，也見識過同行者的勇氣，在前線，在社區，在每日最微小的堅持當中。最激進的行動，背後是最純粹、最溫柔的期許。生而為香港人，當我們拒絕活在虛擬的繁華之中，奮起對抗此城無法自主的宿命，浮城便終於落地，真正屬於我們的「香港」，便存在於一呼一吸之間，我們不顧一切去反抗的一刻。

何桂藍 (2020-05-07)

呼應日益增長的大氣地理學與氛圍研究，本文主張，政治主體性與社群的形成，是通過大氣動態和其中的身體動作和情動實踐所中介的。不同的大氣動態及其物質和情感影響促進了各種關係性的生成 — 例如空氣與呼吸的自然文化意義，或政治社群、公共論述和氛圍的出現或消散 — 創造了一系列異質關聯的空間，並由不同類型的大氣/氛圍主體在其中穿行和交織。

反思 2019 至 2020 年間的香港，我們觀察到大氣/氛圍的擾動或危機與社會運動緊密交織。示威者面對著國家通過大氣和氛圍控制進行的壓制，發展出了一種高度警惕的狀態和自我意識。對於 Lo (2023) 來說，獅子山下與山上空氣質量的鮮明對比（污染空氣與清

新空氣)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涵,也象徵著抗議精神。在「流水革命」期間,面對極受催淚瓦斯毒害的都市大氣,示威者會藉由登山來恢復空氣與自我的政治主體性(rejuvenate air and the self):「登山這一具象化的實踐是自我與特定景觀的交織,這片景觀被指定為群眾在艱難時期希望重新燃起並堅持信念的核心……攀登者的自我與景觀的交織超越了主觀感知的物理限制,擴展了視野,並提升到一個超越人類的更高層次,以面對無限的、變化的、無法衡量的世界」(Lo 2023: 329)。

從 2019 年到 2020 年初,香港政府使用催淚瓦斯和其他化學武器,以及其他大氣/氛圍技術,以壓制流水革命,試圖營造充滿恐懼、敵意和暴力的情動氛圍,並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和集體抵抗。大氣擾動及其相應的政治動態需要被視為「跨身體性」的厚重時間。例如,抗議者將本地材料與過去行動的靈感、警察的策略、緊急法例和《反蒙面法》結合,這些都喚起了「殖民」時空關係,並影響著當前不穩定的抗議氛圍。我們必須關注不同的抗議者身體如何與都市大氣共同風化,在不斷變化的城市環境中持續適應並進行個體抵抗或集體抗議。這是一個不斷調整和轉變自我與他者的過程,回應身體與城市周圍政治、情動和物質條件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

在第三章,本文通過近距離觀察流水革命爆發之初,群眾遭遇催淚瓦斯的事件中,注意到由大氣警戒與抵抗所織就的政治時空。警方在抗議現場決定使用催淚瓦斯和其他控制工具,不僅僅是對當前局勢的干預,或是說服或鎮壓的措施,還基於過去積累的警察策略和實踐經驗。這些經驗和情感動態影響了警方面對抗議者時的行為,也同時塑造了抗議者的反應和策略。在層層交疊和交織的時間維度上,每一次催淚瓦斯的釋放不僅僅是一個瞬間事件,還呼應著其歷史前例,並對未來行動和預期產生潛在影響。大氣/氛圍警戒不僅僅是控制物理空間,還包括調節不同時間性和節奏下的感知和情感。催淚瓦斯的使用在空間上壓制了抗議者的行動範圍,也在時間上影響了他們的情動狀態和適應能力。抗議者與城市大氣/氛圍一起移動,讓他們的身體成為化學暴力的記錄,同時他們的話語和行動痕跡反映了過去的經驗和未來的抗議潛力。每一次面對催淚瓦斯的抗議行動和延伸策略,不僅是對當前局勢的反應,也是對未來可能性的探索。這些行動共同塑造了後續抗議的潛力和方向,使未來變得動態且尚不確定。如果像催淚瓦斯這樣的警察技術旨在將湍動且黏合的群眾分裂成「身處他處、脫離時間的個體」(out of place and out of time),那麼「流水革命」

的參與者 — 與警察/抗議的氛圍一起移動，集結身體、動作、物質和話語的運動 — 可以被視為參與了一個「時空共同創造」的過程。面對日益受到政府控制的氛圍，抗議者變得更加警覺，保護自己和同伴。他們還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抵抗，並在這座風雨飄搖的城市中共同前行，創造出強大的抗議氛圍。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創造、收集並重新組裝了大量物資（連同對應的身體行動和各種暴力與非暴力抗議行動），維持了運動的持續。看似普通的物品散佈在城市各處，然後根據社會運動的戰略需要被抗議者利用，改變其社會功能和意義，使它們成為高度政治化的「抵抗物質」(Feigenbaum, 2014)。這些抵抗物質不僅靜置於那裡，沉默無聲，它們註記著抗議者抵受大氣警戒的印記（impressions），其穿行都市的獨特姿態和運動軌跡，也展示了他們的身體、情感與主體性如何隨著城市大氣的變化而發展、增長和衰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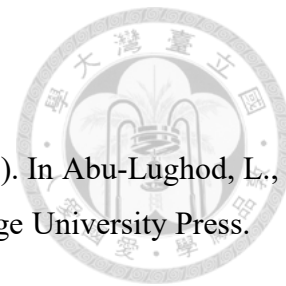
呼應 Ahmed (2004) 和 Neimanis & Walker (2014) 等女性主義論者的觀點，我主張抗議行動不僅僅是抗議者與環境或其他主體之間的互動或回應。這些行動也建基於不同的身體與都市大氣/氛圍進行聯動和彼此風化，共同建構物質現實及其意義領域的過程。風化的概念超越了傳統社會理論對於互動過程的理解，表明實體在互動之前並不存在，而是通過內在互動而具體化並共同構成。在風化中重塑時間和空間，亦即持續地重塑身體與世界之間的表面。在充滿催淚瓦斯的抗議現場，抗議者通過實質的運動和身體動作，也與大氣控制共同風化，建立了臨時的「去除毒氣基礎設施」。他們創造性地使用日常物品（如雨傘和口罩）來保護自己和同伴，甚至使用球拍將催淚瓦斯罐擊回防暴警察。這些實踐表明，抗議者不僅能夠在威權大氣壓力下形成一個相對穩固且持久的「大氣自我」，也能跨域個體的邊界，在更廣範和深遠的社會層面上轉化城市大氣的物質組成和意義。抗議者彼此照護、結伴同行，在毒氣中呼吸引發了身體之間的共鳴，既促進在集體行動的當下和之後的倫理關懷，也持續地將抗議者的身體、政治身份和情感聯繫在一起。

在第四章，本文則梳理了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陰影下，疫情防控措施及其相關的呼吸條件成為抗議者與政府之間大氣緊張和衝突的領域。病毒為香港政府提供了一個政治機會，使其能夠獲得一種緊急狀態的權力，並實行更加嚴格的大氣控制。這包括無限期限限制公共集會，並將防疫措施武器化，用於對異議者進行微觀鎮壓。通過引用疫情帶來的緊急狀態，香港政府試圖重新控制氛圍，管理公共空間，以大氣方式抹除異議聲音。

從這些圍繞都市的感染與衛生狀況、公共秩序和呼吸條件的爭議當中，我們看到大氣/氛圍不僅僅身體身處其中的物理空間；它們同時也是社會控制和政治鬥爭的媒介，其中身體與其他身體、物體、建築環境來回地進行共振，不斷改變著群眾情動及被觸動的能力與界限。2020 年初，流水革命的參與者面對病毒大氣的動盪，展現了堅韌的適應力和倫理回應性，並持續抵抗著政府的大氣/氛圍警戒與抹除。正如流水革命之前圍繞催淚瓦斯、水炮和其他國家暴力進行動員時，抗議者通過抗議物資、政治宣傳和情感話語進行回應，新一波的大氣擾動中，出現了一系列有爭議的、意識形態的和情感性的技術與物質（如醫用口罩），都一再改變著抗議者與政府之間的共處與對峙關係。如果說抗議者與大氣氛圍共同風化，他們就不僅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展示了香港流水革命的靈活性，創造性地在城市空間中現身，利用物資並策略性地調整對大氣控制的適應，積極地重新定義和構建城市本身。

對於反對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Pavoni & Tulumello (2023) 如此描述：「通過這種[對殖民不公、分離和反抗的身體體驗]的跨個體化過程，身體經歷了從恐懼和受紀律約束的個體身體到賦權和反抗的共同體的轉變」(239)。進一步而言，「集體政治主體並不是在這一時刻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而是通過動員其過度潛能進行殖民大氣的內在再造過程中出現的。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殖民地的大氣暴力被打破，將殖民暴力轉化為革命暴力，這是一項同時具有政治性、情感性和美學性的任務」(244)。在香港流水革命的案例中，我們觀察到社會運動的抗議主體性、新湧現的文化和共同體，如何與極其政治化的大氣/氛圍一起凝聚、運動和轉變，示威者與都市大氣/氛圍一同風化，通過持續的調適、穿行、抵抗與技術介入其周遭的情動呼吸條件來重組社會，形成一股席捲全城的集體情動漩渦，既讓抗議現場現身的某些身體結盟，對抗其他身體，也在論述和網路空間上形成逆反的呼吸公眾，例如是反對催淚瓦斯傷害的大氣抹消的敘述、再現和網路檔案庫，讓流水革命綿延為持久的，共謀與抵抗的多重時空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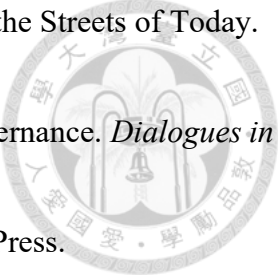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 Abu-Lughod, L. (1990). *Shifting politics in Bedouin love poetry* (pp. 24-45). In Abu-Lughod, L., & Lutz, C. A. (e.d)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dey, P. (2014). *Air: Nature and Culture*. Reaktion Books.
- Adey, P. (2015). Air's affinities: Geopolitics, chemical affect and the force of the elemental.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5(1), 54-75.
- Adey, P. (2017). *Mobility*. Routledge.
- Adey, P. (2021). Afterword: Breath-taking—ethical impulses for breath studies. *The Life of Breath i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Medicine*, 527.
- Agamben, G. (2008). *State of excep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hmed, S. (2004). Collective feelings: Or, the impressions left by other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1(2), 25-42.
- Ahmed, S.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Routledge.
- Ahmed, S. (2006). *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hmed, S. (2010). Happy Objects. In Gregg and Seigworth,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I. K. (2020). Thinking with a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of Air-and-breathing-bodies. *Body & Society*, 26(2), 79-105.
- Amnesty International. (n.d.). Tear gas: A global perspective.
<https://teargas.amnesty.org/#incident-map>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23)
- Amoore, L. (2018). Cloud geographies: Computing, data, sovereign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2(1), 4-24.
- Amnuaylojaroen, T., & Parasin, N. (2021).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VID-19,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662499.
- Anderlini, J. (2019). Hong Kong's "Water Revolution" Spins Out of Control. *Financial Times*, 2.
- Anderson, B. (2009). Affective atmosphere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2), 77-81.
- Allen, I. K. (2020). Thinking with a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of Air-and-breathing-bodies. *Body & Society*, 26(2), 79-105.
- Asher Ghertner, D. (2021). Postcolonial atmospheres: air's coloniality and the climate of enclosur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11(5), 1483-1502.

- BBC (2020-03-28). Coronavirus: Lockdowns continue to suppress European pollution.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2065140> (Accessed October 29, 2024)
- BBC (2020-04-20). Air pollution linked to raised Covid-19 death risk.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health-52351290> (Accessed October 29, 2024)
- BBC (2020-06-01). Then and now: Pandemic clears the air.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7149747> (Accessed October 29, 2024)
- Barad, K. (2007).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ertelsen, L., & Murphie, A. (2010). Félix Guattari on affect and the refrain.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138-156.
- Bille, M., & Simonsen, K. (2021). Atmospheric practices: On affecting and being affected. *Space and Culture*, 24(2), 295-309.
- Bille, M., & Hauge, B. (2022). Choreographing atmospheres in Copenhagen: Processes and positions between home and public. *Urban Studies*, 59(10), 2076-2091.
- Castells, M. (2015).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John Wiley & Sons.
- Catucci, S., & De Matteis, F. (2022). The affective city: Spaces, Atmospheres and Practices in Changing Urban Territories (Vol. 88). LetteraVentidue Edizioni.
- Campos Medina, L., & Jaureguiberry Mondion, J. (2021). The march as a safe space and dynamics of resocialization. *Space and Culture*, 12063312211040202.
- Chan, E. Y. Y. et. al. (2019). Use of tear gas for crowd control in Hong Kong. *Lancet* (London, England), 394(10208), 1517–151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2326-8](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2326-8)
- Chen, S. et. al. (2021). Climate and the spread of COVID-19. *Scientific Reports*, 11(1), 9042.
- Cheng, E. W., Lee, F. L., Yuen, S., & Tang, G. (2022). Total Mobilization from Below: Hong Kong's Freedom Summ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1.
- Cheng, S. (2020). Pikachu's Tears: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Violence in Hong Kong. *Feminist Studies*, 46(1), 216-225.
- Cheung, G. K. W. (2009).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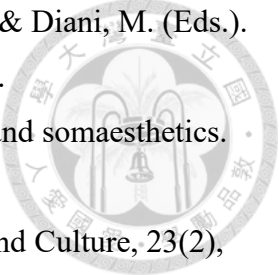
- Ching, J., & Kajino, M. (2020). Rethinking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fter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4), 5167.
- Clement, S. (2020). Walking with the rain: Sensing family mobility on-foot. In *Weather: Spaces, Mobilities and Affects* (pp. 51-66). Routledge.
- Chow, K. (Director). (2021).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Film]. Haven Productions Ltd.
- Choy, T. (2011).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In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oy, T., & Zee, J. (2015). Condition—suspens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2), 210-223.
- Crippen, M. (2019). Body politics: Revolt and city celebration. In *Bodies in the Streets: The Somaesthetics of City Life* (pp. 89-110). Brill.
- Das, V. (2006).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de Certeau, M., & Mayol, P. (199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iving and Cooking*. Volume 2 (Vol. 2). U of Minnesota Press.
- de Larrinaga, M. (2016). (Non)-lethality and war: tear gas as a weapon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9(3), 522-540.
- Deleuze, G. (1992).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Porta, D. (2016). Where did the revolution go?: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Porta, D., & Fabbri, M. (2016). Producing space in action. The protest campaign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l Molin military base.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5(2), 180–196.
- Diaconu, M. (2019). The weather-worlds of urban bodies. In *Bodies in the Streets: The Somaesthetics of City Life* (pp. 38-59). Brill.
- Duyvendak, J. W., & Jasper, J. M. (2015). *Players and arenas: The interactive dynamics of protest*.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Elden, S. (2021). Terrain, politics, history.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11(2), 170-189.
- Engelmann, S. (2015). Toward a poetics of air: sequencing and surfacing breath.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0(3), 430-444.
- Engelmann, S., & McCormack, D. (2021). Elemental worlds: Specificities, exposures, alchem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6), 1419-1439.
- Feigenbaum. (2014). Resistant Matters: Tents, Tear Gas and the “Other Media” of Occupy.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11:1, 15-24.

- 
- Feigenbaum, 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Verso Books.
- Feigenbaum, A., & Kanngieser, A. (2015). For a politics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5(1), 80-84.
- Fligstein, N., & McAdam, D. (2012). *A theory of fiel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gonese, S. (2017). Affective atmospheres, urban geopolitics and conflict (de) escalation in Beirut. *Political Geography*, 61, 1-10.
- Furuhata, Y. (2022). *Climatic media: Transpacific experiments in atmospheric control*.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andy, M. (2017). Urban atmospheres. *Cultural geographies*, 24(3), 353-374.
- Gerbaudo, P. (2012).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Pluto Press.
- Gukelberger, S., & Meyer, C. (2020). Creating space by spreading atmospheres: Protest movements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In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22, No. 3).
- Healy, S. (2014). Atmospheres of consumption: Shopping as involuntary vulnerability.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0, 35-43.
- Holzhey, C. F. E. (2020). Weathering ambivalences. Between language and physics.”. In C. F. E. Holzhey, & A. Wedemeyer (Eds.), *Weathering. Ecologies of Exposure* (pp. 3–40). Berlin: ICI Berlin Press. https://doi.org/10.37050/ci-17_02
- Holzhey, C. F., & Wedemeyer, A. (Eds.). (2020). *Weathering: Ecologies of Exposure* (Vol. 17). ICI Berlin Press.
- Iaquinto, B. L., Barber, L., & Yu, P. S. (2023). Grounding Mobility: Protest Atmospheres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13(4), 933-948.
- Irigaray, L. (1999). *The forgetting of air in Martin Heidegger* ; translated by Mary Beth Mader. (1st ed.). Athlone Press.
- Ingold, T. (2010). Footprints through the weather-world: walking, breathing, know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 S121-S139.
- Ingold, T. (2013).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Routledge.

- Ingold, T. (2016). Lighting up the atmosphere. In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pp. 163-176). Routledge.
- Ingold, T. (2020). On breath and breathing: A concluding comment. *Body & Society*, 26(2), 158-167.
-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 (2019-10-12). Hong Kong, 6/2019 -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kN744Q6qY> (Accessed October 29, 2024)
- Ip, I. C. (2019).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Routledge.
- Ismangil, M., & Lee, M. (2021). Protes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rime, Media, Culture*, 17(1), 17-20.
- Jack, M. (2021). The Crowd in Flux: Atmosphere and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Affects at FC Union Berlin. *Ethnomusicology*, 65(3), 497-518.
- Jackson, M., & Fannin, M. (2011). Letting geography fall where it may—aerographies address the elementa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9(3), 435-444.
- Kwok, C., & Chan, N. K. (2022). The making of contentious political sp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s Victoria Park. *Space and Culture*, 25(4), 615-632.
- Joronen, M., & Ghantous, W. (2024). Weathering violence: Atmospheric materialities and olfactory durations of 'skunk water' in Palestin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25148486241226923.
- Kenner, A., Mirzaei, A., & Spackman, C. (2019). Breathing in the anthropocene: Thinking through scale with containment technologies.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5(2), 153-171.
- Kloet, J. D., Lin, J., & Chow, Y. F. (2020). 'We are doing better': Biopolit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COVID-19 virus i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635-640.
- Kuriyama, S. (1999).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2006). Air. Sensorium: Embodied Experienc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Art. MIT Press, 9780262101172. fflhal-02057246f
- Lee, N. K. (2009). How is a political public space made? The birth of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olitical Geography*, 28(1), 32-43.
- Leitner, H., Sheppard, E., & Sziarto, K. M. (2008). The spatialitie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3(2), 157-172.

- Leff, J. R. (2021). Expanding feminist affective atmosphere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1, 100844.
- Li, E. C. Y., & Lee, P. H. (2023). The geopolitics of disease prevention: Military analogies against COVID-19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beyond. *Media, Culture & Society*, 01634437231216444.
- Lin, W. (2022). Atmospheric conditioning: Airport automation, labour and the COVID - 19 pandemic.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7(1), 214-228.
- Lo, K. C. (2023). Crowd Control and Mobilization with Nature in the China–Hong Kong Context. *Cultural Politics*, 19(3), 318-332.
- Lowe, C. (2010). Viral clouds: becoming H5N1 in Indones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4), 625-649.
- Mak, H., & Koh, K. (2021). Building a Healthy Urban Environment in East Asia (No. 1). Report.
- Malabou, C. 2012. *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Mankoo, A. C. (2019).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eargas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1925-196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Marinucci, L. (2019). Japanese atmospheres: Of sky, wind and breathing. *Atmosphere and Aesthetics: A plural perspective*, 93-118.
- Martin, D., & Miller, B. (2003). Space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8(2), 143-156.
- Marazziti, D. et. al. (2021).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VID-19 pandemic and mental health.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73, 145182.
- McCormack, D. P. (2008). Engineering affective atmospheres on the moving geographies of the 1897 Andrée expedition. *cultural geographies*, 15(4), 413-430.
- McCormack, D. P. (2017). Elemental infrastructures for atmospheric media: On stratospheric variations, value and the comm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5(3), 418-437.
- McCormack, D. P. (2018). *Atmospheric things: On the allure of elemental envelopment*.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Menebo, M. M. (2020).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ssociate with Covid-19 new daily cases: A correlation study between weather and Covid-19 pandemic in Oslo, Norwa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37, 139659.
- Navaro-Yashin, Y. (2012). *The make-believe space: affective geography in a postwar po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Neimanis, A., & Walker, R. L. (2014). Weather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thick time” of transcorporeality. *Hypatia*, 29(3), 558-575.
- Nieuwenhuis, M. (2016). Breathing materiality: Aerial violence at a time of atmospheric politics.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9(3), 499-521.
- Nieuwenhuis, M. (2019). Porous skin: Breathing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holey body.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33, 100595.
- Outka, E. (2019). *Viral modernism: the influenza pandemic and interwar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voni, A., & Tulumello, S. (2023). *Urban violence: Security, imaginary, atmosphere*. Rowman & Littlefield.
- Philippopoulos-Mihalopoulos, A. (2016). Withdrawing from atmosphere: An ontology of air partitioning and affectiv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4(1), 150-167.
- Pile, S. (1997). Oppositio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spaces of resistance in S Pile and M Keith (eds.) *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 Routledge, London, 1, 32.
- Rahman, M. et. al. (2021). COVID-19 pandemic, dengue epidemic, and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in Bangladesh: Scenario assessment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92, 110303.
- Rose (2020-03-23) “Coronavirus and the Hong Kong protest movement” *Lowy Institute* :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oronavirus-hong-kong-protest-movement> (Accessed October 29, 2024)
- Routledge, P. (1994). Backstreets, barricades, and blackouts: Urban terrains of resistance in Nepa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5), 559-578.
- Routledge, P. (1997). Space, mobi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dia's Naxalite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12), 2165-2189.

- 
- Routledge, P., (2015) Geography and Social Movement. In Della Porta, D., & Diani, M.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move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usterman, R. (2008).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pnisky, J. (2020). Staging atmosphere on the Ukrainian Maidan. *Space and Culture*, 23(2), 80-97.
- Sloterdijk, P. (2009). Airquak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1), 41-57.
- Squire, R. (2016). Immersive terrain: the US Navy, Sealab and Cold War undersea geopolitics. *Area*, 48(3), 332-338.
- Tarrow, S. (2011). *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g, T. Y. T., & Cheng, M. W. (2022). The poli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he 2019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Protests on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4(1), 128-148.
- Theophanidis, P. (2013). Caught in the cloud: the biopolitics of tear gas warfare. *The Funambulist Papers*, 42.
- Tilly, C. (2000). Spaces of conten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5(2), 135-159.
- Tominaga, K. (2017).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rotest camps: openness and exclu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apa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3), 269-282.
- Tosepu, R.et. al. (2020). Correlation between weather and Covid-19 pandemic in Jakarta, Indonesi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25, 138436.
- Urry, J. (2012).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 Wacquant, L. J. (2004). *Body & soul: Notebooks of an apprentice box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l, I. R. (2019). Policing atmospheres: Crowds, protest and 'atmotechn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6(4), 143-162.
- Wall, I. R. (2020). *Law and disorder: Sovereignty, protest, atmosphere*. Routledge.
- Weizman, E. (2012).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Verso books.
- Whitehead, M. (2011). *State, science and the skies: governmentalities of the British atmosphere*. John Wiley & Sons.
- Whitworth, K., & Li, Y. T. (2023). Visual framing: The use of COVID-19 in the mobilization of Hong Kong protest. *The China Quarterly*, 253, 19-34.

Zee, J. C. (2022). *Continent in Dust: Experiments in a Chinese Weather System* (Vol. 10).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艾迪 (Peter Adey), 徐苔玲、王志弘譯 (2013), 《移動》, 台北: 群學。

諸多香港藝術家 (2020), 《傘下存志: 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文宣作品集》, 香港: Umbrella Uprising。

端傳媒 (2020), 《2019 香港風暴: 端傳媒反修例運動報導精選》, 台北: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中信圍困團隊 (2020), 《中信圍困日記》。香港: 玻璃樹文化有限公司。

楊威利修 (2023), 《香港祕密行動》, 臺北市: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

譚蕙芸 (2020), 《天愈黑, 星愈亮 — 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香港: 突破出版社。

韓麗珠 (2021), 《半蝕》, 臺北: 衛城出版。

王汎森 (2014), 《執拗的低音: 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 允晨文化。

疫境記者 (2020), 《口罩下的香港人》, 香港: 白卷出版社。

報導者 (2020), 《世紀之疫: 揭開 COVID-19 下, 人性、病毒、新世界的深度紀實》, 臺北: 商周出版。

諸多香港藝術家 (2020), 《傘下存志: 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文宣作品集》。香港: Umbrella Uprising。

沃草 (2019) 我係香港人: 2019 反送中催淚彈下的一國兩制 沃草網站。網址:

<https://watchout.tw/projects/hongkonger/> (2023.01.04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6-05) 「周五單車巡遊宣傳 6.9 遊行 周日遊行前宗教團體辦祈禱會」 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94973>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6-13) 「盧偉聰: 「暴動」已拘 11 人 發射數枚橡膠彈 150 催淚彈 僅「低殺傷力武器」」 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95471>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6-16) 「反送中男太古廣場墮樓亡 家長、陳淑莊、吳靄儀獻花悼念」。

立場新聞網站。網址: <https://shorturl.at/R4cTq>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6-19) 「辦聚會助『中信幸存者』疏導情緒 發起人: 如感困擾, 切忌獨自面對」。立場新聞網站。網址: <https://shorturl.at/53rYf>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8-05)「踢拖抗暴 — 當催淚彈蔓延至長者社區」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98853>(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2019-08-24)「示威者拉倒智慧燈柱 警偉業街施催淚彈、德福平台射胡椒彈」聞

庫網 站。網址:<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00132> (2023.01.04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9-12)「《願榮光歸香港》創作人：音樂是凝聚人心的最強武器」HRIC。

網址：

<https://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ya-guo-xiang-gang-zhi-ge-dan-sheng-yuan-rong-guang-gui-xiang-gang>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09-19)「無負少年時 萬千學子人鏈發聲」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00991>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11-06)「K Kwong：點解最近啲催淚彈咁多煙同咁高溫？」聞庫網站。網

址：<https://shorturl.at/ziiY0>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19-11-09)「衛生署發布催淚煙健康資訊 承認可致持續影響 教關窗、洗眼、

換衫」聞庫網站。網址：<https://shorturl.at/5jvNS>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20-03-11)「不忘・不散 — 祭壇前的尚德街坊」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2992>：(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20-05-01)「被指違限聚令 工黨社民連 8 人五一請願遭票控 麥德正拒出示身

份證被捕」聞庫網站。網址：<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7239>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20-05-06)「警方以限聚令為由 反對周日九龍大遊行 主辦團體宣布延期」

聞庫網站。網址：<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7648>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20-05-10)「13 歲學生記者被警帶走 警員斥童工、非法暴徒」聞庫網站。網

址：<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7940> (2024.10.29 取用)。

立場新聞 (2020-05-20)「支聯會 531『毋忘六四』遊行 警方以限聚令為由反對」聞庫網

站。網址：<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8762>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13-11-16) 「暴力抗拆遷 1999 年香港都有過」蘋果日報。網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203060928/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31116/51894875>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19-06-06) 「歷年最高 3,000 人黑衣靜默遊行 郭榮鏗促撤回修例：法律界不低頭」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AEZ3YPOGSGIIH55ZEBZIVT6JMQ>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19-06-09) 「大專生綁鐵鏈 到中聯辦請願」長青網。網址：
<https://www.e123.hk/zh-hant/news/469053>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19-06-14) 「信徒『叫耶穌落嚟』聚會回應警」LIHKG。網址：
<https://lihkg.com/thread/1245192/page/1>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19-06-10) 「400 基督徒政總外集會 唱聖詩撐反送中」。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J22G4URXURN3C2KJYKHZ3NEZFI>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2019-09-02)「中學勇武仔傾家蕩產買裝備:做大學生前先做有良知嘅人」問庫網站
網址:<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GJMYIE3OUTCYCIM6564A42XLHM> (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 (2019-09-11) 「8:31pm 默哀 高唱香港之歌」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ZL7UU5JAMGBQDL4QRZF35OBYTY>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19-09-12) 「全城大合唱 越夜越響亮」LIHKG。網址：
<https://lihkg.com/thread/1562249/page/1>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2019-09-24)「火魔法師之煉成『只守不攻避免傷人』」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5B5QW4NGBP6ILO2D26ABSSFXLI>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1-18)「TG 戰場 理大山埃濃度超標五倍」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IMVSTT6TPBUUYZLDWCDG4H5U5Q>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1-21)「催淚彈遺害 兒童爆出疹潮」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Q4EZIZUM2HYTHJE2HZS4QDN3OQ>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1-27)「團隊驗山埃揭港人『吸毒』」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QLOCR7CUTXCY43NEEY2TNKC5IA>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1-28)「港人硬食 10,000 枚催淚彈」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MQZCEDLRM24LDAGRITS7N2BN5E>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2-07)「港淪毒氣倉 市民吸 TG 屙血」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OEX5DCBXXKBQR7BIZLLNLCW2DJ4>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2-07)「旺角催淚彈放題 劊房單親媽咳黑塊 與 5 歲出疹兒有家不敢歸」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3PH7RFQB2NRREDEWQANP2QL5GQ>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2-27)「TG 射屋 枕袋洗五次仍致敏」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IBMVBQMU7IK3QKCWVD5O7LRQY4>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2-27)「CS 飄 400 米 16 樓單位關窗也中招」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6GRQ2UCTLX36CC3GDDHELF5COU>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2019-12-27)「滅火隊手套含可變山埃物質」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6YCRHDG25RA5WUW2CQIB5HF6JQ>
(2023.03.06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1-22)「50 警凌晨拆彥霖梓樂祭壇」問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BFGKAKSY3NEEGCWPSTW73GUMI>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2-05)「7,000 醫護罷工 今登門促林鄭對話 Dirty Team：犧牲都要有意義」
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HDLF2UB2S4SBF5CLDTO4DHRBPE>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3-03)「警方首度表明香港抗爭現『本土恐怖主義』 議員斥政府極端高壓
管治所致」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SCSEEEAKKBJT5N22O57DAD4MHY>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3-30)「新措施首 24 小時食環發 280 次勸喻 光榮冰室半小時內兩遭警掃場」
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LJDCNSHPM3UJ54PTRMXCZYKNRM>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4-23)「83 黃店聯盟 手足有工開 有糴堅持 20 萬 Thx」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Ry4SCH725Q4IEQUNW43RYYJXBU>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4-23)「警拆祭壇以限聚令恐嚇記者 惡警：『攞多個過嚟咪夠囉』」聞庫
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PZMCJ7O62AUVYS63P5EZA3ERRA>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5-08)「會計手足義助黃店申抗疫基金」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A7VFP5LDNQI542YKPGXO7NGCMY>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5-09)「多區悼梓樂『港人未放棄過你』」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BPIYY7KQVGQULX2BPT7ZQKRXQA>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6-04)「多區遍地開花 全城燭光悼六四」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5GRFJPA36BWGUWKQ5L4N46QDZ4>
(2024.10.29 取用)。

蘋果日報 (2020-06-17) 「筆架山上直幡『HK CAN'T BREATHE』」聞庫網站。網址：

<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7LHG4J3PQEJ3VRTLKQCDP7H5BU>

(2024.10.29 取用)。

明報 (2019-08-24) 「港九新界獅山人鏈延綿 60 公里 公布逾 21 萬人參與」明報新聞網。

網址：<https://shorturl.at/R9kju> (2024.10.29 取用)。

明報 (2020-01-02) 「九成撐黃色經濟圈 市民倡擴大」LIHKG。網址：

<https://lihkg.com/thread/1807549/page/1> (2024.10.29 取用)。

明報 (2020-03-07) 「市民太古廣場悼念 6·15 墮斃梁凌杰」明報新聞網。網址：

<https://shorturl.at/xZmux> (2024.10.29 取用)。

明報 (2020-06-15) 「大批市民太古廣場悼念梁凌杰 警方警告人群離開」明報新聞網。網

址：<https://shorturl.at/tzT89> (2024.10.29 取用)。

明報 (2019-08-31) 「獸醫界集會 抗議催淚煙傷害動物」明報加東網。網址：

https://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90831/HK-gad3_r.htm (2024.10.29 取用)。

明周文化 (2019-12-27) 「香港地圖：催淚彈遍地開花」明周文化。網址：

<https://shorturl.at/G7XTe> (2024.10.29 取用)。

明周文化 (2019-12-27) 「個案記錄 市民吃催淚氣體的日子」明周文化。網址：

<https://shorturl.at/zNjdf> (2024.10.29 取用)。

香港 01 (2019-06-15) 「催淚煙困中信大廈 中年男憶千人『生死一刻』」香港 01 網站。網

址：<https://www.hk01.com/突發/341093/逃犯條例-催淚煙困中信大廈-中年男憶千人-生死一刻> (2023.03.06 取用)

香港 01 (2019-06-15) 「反修例黃衣男太古廣場危站五小時墮地 送院不治」香港 01。網址：

https://www.hk01.com/article/34101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24.10.29 取用)。

香港 01 (2019-06-23) 「記錄 612 衝突瞬間，重組示威者警方攻防時序」香港 01 網站。網址：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43590/逃犯條例-多圖-記錄 612 衝突瞬間-重組示威者 警方攻防時序> (2023.03.06 取用)

香港 01 (2020-04-24)「五一勞動節 警方禁止及反對職工盟遊行和集會申請」香港 01。網址：

https://www.hk01.com/article/46530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24.10.29 取用)。

香港 01 (2020-05-01)「五一黃金周 多區『黃店』食肆現人龍」香港 01。網址：

https://www.hk01.com/article/46784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24.10.29 取用)。

香港 01 (2020-07-01)「港版國安法：警方首次舉「紫旗」警告港獨又號 盤點警 7 種顏色旗」
香港 01 網站。網址：[https://www.hk01.com/突發/492660/港版國安法-警方首次舉-紫旗-警告港獨又號-盤點警 7 種顏色旗](https://www.hk01.com/突發/492660/港版國安法-警方首次舉-紫旗-警告港獨又號-盤點警7種顏色旗) (2023.01.04 取用)

香港 01 (2020-11-27)「警方 6 月至今用約萬枚催淚彈 11.12 中大及多區衝突單日最多佔
兩成」香港 01 網站。網址：<https://shorturl.at/c2CFy> (2023.01.04 取用)

香港電台 (2019-09-11)「研究指催淚煙化學物質可殘留 2 至 3 星期飄離約 250 米」。Yahoo
新聞。網址：<https://shorturl.at/VvH0o> (2024.10.29 取用)。

眾新聞 (2019-09-11)「化學工程師：催淚彈化學物殘留在社區 3 周」。Yahoo 新聞。網址：
<https://shorturl.at/bEV2w> (2024.10.29 取用)。

大學線 (2019-12-21)「催淚煙霧裏 動物也自危」。U-Beat Magazine。網址：
<https://ubeat.com.cuhk.edu.hk/145-pet/> (2024.10.29 取用)。

窩窩 (2019-11-18)「烽火連天，香港抗爭下無處可逃的動物們」。WUOWUO。網址：
<https://wuo-wuo.com/report/issue/1066-pray-for-hk-animals-191118>
(2024.10.29 取用)。

獨立媒體 (2021-12-25)「拒用『安心』堂食 港人 FB 組團野餐：小事先要堅持，唔合理就
唔好做」。獨立媒體網站。網址：<https://shorturl.at/d4HTs> (2024.10.29 取用)。

法庭線 (2022-06-14)「涉染疫後往『藍店』播毒 男子認 11 罪還押候判 警查 Fb、安心
出行紀錄偵破」。法庭線網站。網址：<https://shorturl.at/nEAEJ> (2024.10.29 取用)。

轉角國際 (2019-06-17)「反送中的「抗爭背包」：香港示威者的街頭物資清單」轉角國際網
站。網址：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876893(2023.01.04 取用)

轉角國際(2019-12-31)「被遺忘的報導:香港「反送中抗爭」，後來呢?」轉角國際網站。網址: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4259558(2023.01.04 取用)

晴報(2019-06-20)「示威者用水淋熄催淚彈揚威國際 外媒讚簡單有效 或致警方升級」晴報網站。網址: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 (2023.01.04 取用)

加拿大星島日報(2019-12-17)「溫市『催淚彈聖誕樹』掛黃雨衣悼港示威者」星島新聞網。網址：
https://www.singtao.ca/googleamp/amp.php?region=toronto_hk&cat=52&post_id=3983627 (2024.10.29 取用)。

東網(2019.09.10)「修例風波：香港對伊朗世盃外圍賽 逾百球迷高歌撐港隊」東網。網址：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0910/bkn-20190910191310997-0910_00822_001.html (2024.10.29 取用)。

東網(2019.11.27)「修例風波：調查指逾千童對催淚煙有不良反應」東網。網址：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1127/bkn-20191127173858088-1127_00822_001.html (2024.10.29 取用)。

文匯報(2020-06-03)「警方呼籲市民避免群組聚集 明日盡量留家」文匯快訊。網址：
<http://news.wenweipo.com/2020/06/03/IN2006030095.htm> (2024.10.29 取用)。

紐約時報(2019-09-16)「《願榮光歸香港》：屬於香港抗議者的『國歌』」紐約時報中文網。網址：<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916/glory-to-hong-kong-anthem/zh-hant/> (2024.10.29 取用)。

自由時報(2019-06-17)「遊行人數 200 萬+1 人創奇蹟！民陣：+1 是為了...」自由時報網站。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24437> (2024.10.29 取用)。

自由時報(2019-06-17)「聲援香港！『FREE HONG KONG』人體排字震撼台北」自由時報網站。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81122> (2024.10.29 取用)。

自由時報(2019-08-24)「反送中網球王子是你？示威者拿球拍回擊催淚彈」自由時報網站。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95131>(2023.01.04 取用)

自由時報(2019-09-13)「港多地自築人鏈唱和反送中」自由時報網站。網址：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317574> (2023.01.04 取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11-20) 「無文獻顯示催淚煙致二噁英中毒」政府新聞網。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1/20191120/20191120_170959_237.html(2024.10.29 取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12-04) 「立法會十八題：催淚彈殘留物對健康的影響新聞公報」。
網址：<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2/04/P2019120400259.htm> (2024.10.29 取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0-01-22)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輸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高度懷疑個案」新聞公報。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2/P2020012200924.htm> (2024.10.29 取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2-12-28) 「社交距離措施取消 僅維持口罩令」政府新聞網。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22/12/20221228/20221228_164708_966.html
(2024.10.29 取用)。

端傳媒 (2020-07-27) 「重磅影片：超過 16000 枚催淚彈，給香港留下了什麼？」端傳媒。
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28-hongkong-video-live-with-tear-gas>
(2024.10.29 取用)。

端傳媒香港組 (2020-06-04) 「不一樣的六四集會：燭光遍佈全港，人們為香港抗爭而歌」
Yahoo 新聞。網址：<https://shorturl.at/NaxaQ> (2024.10.29 取用)。

報道者 (2019-11-12) 「香港中文大學成煙硝戰場：港警衝入校園射催淚彈，全日至少 51 傷」
報道者。網址：
[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12-november-protests-in-cuhk-c
ampus](https://www.twreporter.org/a/hong-kong-extradition-law-12-november-protests-in-cuhk-campus) (2024.10.29 取用)。

華僑日報 (1991-02-28) 「因賭債問題講數成導火綫 白石營船民兩度廝殺 施放八十催淚
彈鎮壓 防暴警察奉召增援徹夜搜營」華僑日報。網址：
<https://archive.org/details/NPWK19910228> (2024.10.29 取用)

楊友仁 (2019-10-20) 「《願榮光歸香港》何以動人？一個音樂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端傳媒。
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1-hongkong-glory-to-hk-song> (2024.10.29 取用)。

劉細良(2019-08-26)「智慧燈柱倒下 政府公信力崩潰」聞庫網站。網址:<https://collection.news/appliedaily/articles/XULHAQBWCTMZHC2AOYZG2K37DM> (2023.01.04 取用)

侯志仁 (2020-01-10)「Be Water 如水一般的公共空間：向香港反送中運動學習」眼底城事。網址：<https://eyesonplace.net/2020/01/10/13585/> (2024.10.29 取用)。

蔡友月 (2020-05-14)「想象的病毒共同體：全球 vs 台灣生物民族主義之戰」報道者。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covid-19-imagined-communities> (2024.10.29 取用)。

何桂藍 (2020-05-07)「同呼吸 共命運」何桂藍臉書專頁。網址：<https://shorturl.at/RZV0A> (2024.10.29 取用)。

沃草 (2019)「我係香港人：2019 反送中催淚彈下的一國兩制」沃草網站。網址：<https://watchout.tw/projects/hongkonger/> (2023.01.04 取用)

羅淑敏 (2010)。「從報章標題看越南船民在香港的歷史(1975-2000)」嶺南大學電子文庫。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proj_data/1 (2023.01.04 取用)

香港舊照片 (2014-10-14)「催淚彈使用的歷史統計」香港舊照片網站。網址：<https://oldhkphoto.com/lachrymatorybomb/> (2023.01.04 取用)

BBC News 中文 (2019-09-15)「《願榮光歸香港》成反送中歌曲 創作人：讓運動重拾活力」Youtube。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FeAsS5FNE> (2024.10.29 取用)

BBC News 中文 (2020-03-28)「肺炎疫情：BBC 記者眼中的歐洲各國抗疫與隔離」BBC。網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064479> (2024.10.29 取用)

BCgame Channel (2019-09-12)「《願榮光歸香港》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版 MV」Youtube。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A12IAoOmE> (2024.10.29 取用)。

Black & White (2019-09-14)「願榮光歸香港 912 各區大合唱」Youtube。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nwRtqnf8> (2024.10.29 取用)。

ChiMusic HONGKONGER (2019-09-30)「《願榮光歸香港》中樂合奏及合唱團版 MV」Youtube。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OZuIO5G2s> (2024.10.29 取用)。

Dgx music (2019-08-31)「《願榮光歸香港》初版」Youtube。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7yRDOLCy4Y0> (2024.10.29 取用)。

Dgx music (2019-09-25) 「《願榮光歸香港》 多國合唱版」 Youtube。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y5JOd7jWqk>：(2024.10.29 取用)。

Matches (2021)，「未有忘記音樂敬拜者的身分」，收錄於王少勇主編 (2021)，《無能的同在》(頁 26-30)，加拿大：Vancouver Christians for Love, Peace and Justice。

now 新聞(2020-06-30)「警方去年 612 中信大廈外放催淚彈司法覆核第二日聆訊」now 新聞網站。網址：<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96222> (2023.01.04 取用)

Unwire (2019-08-23)「港人開發《WhatsGap》地圖 App 找出附近罷食餐廳位置」Unwire

網址：<https://unwire.hk/2019/08/23/whatsgap/software/android-app/> (2024.10.29 取用)。



附錄



一、訪談大綱

香港流水革命的都市遊走經驗與運動身體感

Urban Wayfaring and Sensing in Hong Kong's Water Revolution

訪談前言：

你好，我是國立台灣大學地理所的學生梁皓晴，你可以叫我皓晴/Ronex。因碩士論文的緣故，今日的訪談，是想藉由訪談 2019 年香港流水革命的參與者，了解社會運動下，都市居民的移動經驗和身體感的變化。

社會運動不僅是公民推動社會變革和捍衛權利的事件，同時也關乎如何使用身體，理解和遊走於都市環境。尤其是，「be water」的口號呈現了 2019 年運動參與者不固守一地，而是在城市四處流動和游擊的特質。不同的抗爭行動，例如「佔領立會」、「和你塞」、「和你 sing」、「流水式集會」等等，也大幅改變了參與者和市民如何感受都市空間（地鐵站、商場、行人隧道），以及日常交通、生活的方式。

因此，本研究嘗試通過以下五類的問題，讓受訪者反思參與「運動」的獨特體驗：

- (1) 參與者於運動期間的位置、角色、身分認同和組織關係
- (2) 參與者於運動期間/之後，於城市遊走、交通的方式及考量
- (3) 參與者如何觀察現場形式和吸收地理資訊
- (4) 參與者如何採購、製作、使用或變換各式抗議用品
- (5) 參與不同種類抗議運動的情感和身體感

訪談資料將用來撰寫台大地理所碩士論文，而且在最後的論文裡，任何足供辨認您個人身分的資料都會被改寫。在訪談期間，我會進行錄音，以方便紀錄和討論。如果您感到不舒服，也有拒絕繼續訪談的權利。我會把作業成果寄一份給您，希望您能接受我的訪談。

訪談問題：



1. 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系科/現居地點等相關背景)
2. 參與者的身分、位置和角色
 - 2.1 你如何理解運動當中的不同角色？請描述一下你在運動中的位置，期間有出現變化，或成為任何「角色」嗎？
 - 2.2 請問你的身分認同是？有支持什麼政治理念嗎？運動期間/之後會不會有所變化
 - 2.3 請問你運動期間，通常會與什麼人一起行動？有參與過什麼組織或小隊嗎？
3. 都市遊走經驗
 - 3.1 在運動期間，你是如何得知抗爭行動發生的地點？(資訊來源)
 - 3.2 你或朋友參與抗爭/發夢之前，有什麼需要準備的呢？
 - 3.3 你會如何決定衣著，或者是決定帶/不帶什麼裝備（gear），為什麼？
 - 3.4 你會如何前往抗議地點？途中有什麼地方或情境是需要注意的？
 - 3.5 出外發夢時，你會限定參與抗爭的時間嗎？通常會在那裡休息或換衣服？
 - 3.6 離開抗爭現場時，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你會如何逃走和安排交通？
 - 3.7 地鐵和地鐵站是當時比較受爭議的交通工具，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驗在這裡發生？
4. 觀察抗議現場、行動和使用實時地理資訊
 - 4.1 去到抗議現場時，你會如何觀察現場的狀況和形勢？做出什麼行動？
 - 4.2 在現場，你與其他參與者會有交流嗎？有什麼行動的原則和規範？
 - 4.3 運動期間，你有使用 telegram 等通訊軟件的習慣嗎？資訊對抗爭者有幫助嗎？
 - 4.4 不同區或地形的抗爭地點，是否需要不一樣的知識？(例如逃生路線)
 - 4.5 初期參與抗爭的經驗，如何影響或改變後期的參與？
 - 4.6 是否可以描述一下抗爭者之間，以及抗爭者與警察互動的經驗？

5. 抗議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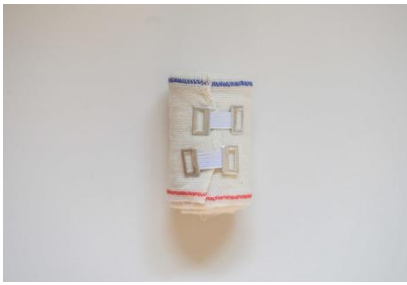
- 5.1 請問你帶去發夢的裝備，是如何獲取或採購的？有什麼東西是需要現場獲取/自行準備的？
- 5.2 面對警察的鎮壓武力，例如催淚瓦斯、水炮或橡膠子彈，你會如何保護自己？
- 5.3 你有在現場組裝抗議物品 (e.g. 滅煙雪糕筒) 或設路障的經驗嗎？
- 5.4 製作、使用這些物品時，有沒有產生什麼感覺？(身體感 — 窒息？熱？亢奮？)
- 5.4 你會如何處理帶去現場/從現場獲取的抗議物品和衣服裝備？

6. 運動情感及身體感

- 6.1 參與抗議活動時 (例如遊行集會、唱歌、悼念、勇武抗爭)，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心情？
- 6.2 沈浸於現場衝突的氛圍，會有什麼感受？
- 6.3 請問運動期間，你有沒有生理/心理上受傷的經驗？有後遺症嗎？
- 6.3 你會如何描述運動參與者之間的情感和關係？(e.g 對於手足、兄弟爬山的看法)
- 6.4 你認為 “be water” 表達了什麼意思？這個詞語會貼近你參與運動的方式和感受嗎？
- 6.5 運動有沒有改變你對於居住城市和社區的看法/感受？有沒有什麼特別有感覺的地方？
- 6.6 運動有沒有改變你的日常生活、消費、交通習慣？

二、 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轉角國際 2019-06-17）



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		
裝備	用途	圖片事例
頭盔	在難以預料情勢發展的街頭運動中，雖然催淚彈、胡椒水等屬於非致命武器，但仍可能造成嚴重傷害。像是此次港警使用催淚彈，透過催淚彈槍發射，便擊中了包含《香港電台》外派司機、其他街頭示威者等人，直接造成傷害。而遭遇催淚彈與胡椒水朝頭部攻擊時，頭盔可大幅降低頭部的衝擊性傷害以及皮膚灼熱等症狀。	
繃帶	警民衝突激化時，醫護人員不足、反應不及的情況下，用繃帶來處理緊急傷口，以防傷口感染、大量出血等。	
運動飲料	在街頭抗爭中，長時間遊行、甚至可能歷經激烈衝突之下，香港隨處可買得的運動飲料，能讓示威者在大量流汗過後，迅速補充人體所需的水份與電解質，恢復戰力。	
濕紙巾	當遭遇催淚彈時，大量煙霧會使人出現流淚、流鼻涕、眼睛疼痛、噁心、嘔吐、咳嗽甚至是窒息感、皮膚灼傷...等症狀。對於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眼疾患者來說，風險尤其高。濕紙巾則可以適度摀住口鼻，暫時抵禦煙霧衝入呼吸道。	

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		
雨衣	無論催淚彈或胡椒水，皆會對皮膚造成傷害（如灼傷、出疹等），在最外層穿著雨衣，不只能在風雨中遮擋，且能較全面地保護暴露在空氣中的皮膚，避免與高劑量化學煙霧直接接觸。	
醫療用口罩	在面對催淚彈、胡椒水襲擊時，口罩能在第一時間減緩呼吸道的傷害，降低更嚴重的支氣管急症發生。同時口罩也讓示威者的身分，不易被警方或有心人士輕易識別，預防「秋後算帳」、「查水表」的情況。	
塑膠束帶	因其取得容易且難以輕易破壞的特性，在反送中抗爭中，也被廣泛用以繫緊路障，將路障串聯起來，作為示威者與警方間的簡易護欄，建立防線與緩衝地帶。	
能量補充小零食	應對大量耗費體力的抗爭過程，示威者隨身攜帶的高能量零食，快速補充體力與熱量。	
防風防水連帽外套	與雨衣功能相似，避免皮膚與催淚彈、胡椒水直接接觸而造成灼傷、出疹等症狀。對於徹夜留守的反抗者來說，也有保暖功效。	

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		
智慧型手機與充電設備	街頭抗爭情勢瞬息萬變。身處前線，手機不只讓示威者隨時掌握最新資訊、與各界串連，且能保持與外界聯繫、報平安。行動電源與充電線，則是保證電力的必備裝備之一。 比較特別的是，在 612 的遊行之後，示威者用來聯絡的加密軟體 Telegram 被來自中國的駭客攻擊，群組一名管理員也因資料外洩被捕。因此 616 黑色大遊行前就有專家提醒，刪除手機中的臉部、指紋解鎖等個資，且關掉自動定位功能，若需藉 Telegram 聯絡，最好使用預付 SIM 卡，或在網路上用外地、外國號碼註冊加入群組，以免被警方追蹤行動。雖然警察搜索手機，原則上於法須有搜查令，但香港過去曾有手機搜查的司法案例在前，且法律存在模糊地帶，因此警察若強勢取走手機並解鎖，仍可避免過多個資外洩。	
雨傘	對於街頭運動來說，雨傘不僅有防雨遮風的功能，面對警察使用催淚彈、胡椒水時，也能有防禦作用，且是最有效、極易取得的防護工具。除此之外，自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以來，雨傘之於香港街頭運動的意義，不只是一把可攻可守的抗爭物品，更帶有「撐香港」的精神意義。	
退熱貼	除了感冒發燒，自 9 日爆發反送中示威遊行以來，香港氣溫多落在攝氏 25-32 度間，儘管時而有雨，但在天氣炎熱與人群擁擠的環境，易引發中暑，退熱貼能有效降低過高的體溫。	
沐浴乳	被催淚彈、胡椒水擊中時，塗抹在皮膚上，有效舒緩皮膚不適的效果。	

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		
爽身粉	爽身粉的主要功能為鎮痛、止癢、消炎、殺菌，能有效舒緩被催淚彈、胡椒水擊中時，皮膚灼傷、出疹等不適的情形。	
哮喘用吸入劑	在催淚彈的大量煙霧之下，示威學生用來減緩可能引發的支氣管炎、肺氣腫或哮喘發作等呼吸道不適情況。	
衛生棉	女性示威者在遊行期間也可能不巧遇上生理期。除此之外比較特別的是，在街頭運動中，前線抗爭者也可以用衛生棉，在危急時協助緊急止血。	
礦泉水	水除了是補給必備，在衝突高峰的12日直播或照片中，能看到示威者在中了警方發射的催淚彈、胡椒水後，互相協助沖洗眼睛、身體，以降低被刺激與傷害程度。	
護目鏡	在預期警方多採取催淚彈、胡椒水等方式驅離示威者之下，街頭示威者於遊行過程多配戴護目鏡，以隔絕眼睛的刺激與傷害。	

香港示威者基本裝備		
手套	在混亂的街頭，用手套保護雙手，可以預防被碎玻璃等利器割傷。	
保鮮膜	除了最外層的雨衣、中間層的防水防風外套，示威者可用保鮮膜包裹手腳等身體部位，抵禦警方的胡椒噴霧對皮膚造成傷害。	
消毒紗墊	若不幸受傷，第一時間消毒、包紮的必備小物，以免傷口的後續感染、惡化。	
泛得林 (Ventolin) 哮喘 定量噴霧劑	若被催淚彈、胡椒水襲擊並不慎吸入，除呼吸困難，嚴重可能導致急性哮喘發作。當發作時需即時使用此噴霧劑緩解症狀。	
攜帶型生理食鹽水	作為緊急傷口消毒與眼部清洗所用。	